袁中郎

中道題



旋就枕帶郁澗聲眠

萬曆己酉十一月望

司功郎袁宏道中郎題





今知社叢書第一種

袁中郎

中道題



彼公之信其果必以我爲
誑言也夫

石公袁宏道撰





旋訖枕帶都澗
聲眠
萬曆己酉十一月望
司功郎袁宏道中
郎題





敝篋集卷之上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西陵陳以聞無異閱

青驄馬

青驄馬九尺強百金買千金裝雙蹄不着地影滅如飛翔借問冶遊郎何為在他鄉下馬立青梧手提碧珊瑚千喚不知人盡眼盻當壚當壚豈不冶褰衣愁曉露五步一停驂十步一回顧客從遠道來贈我青鸞帶交頸復同心白石青

書影一

明刊 袁叔度刻

袁中郎合集

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之一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樂府

青驄馬

青驄馬九尺強百金買千金裝雙蹄不着地影滅如飛翔借問冶遊郎何爲在他鄉下馬立青梧手提碧珊瑚千喚不知人盡眼盻當壚當壚豈不冶褰衣愁曉露五步一停驂十步一回顧客從遠道

書影二

明刊 袁小脩刻

袁中郎全集

書影三

明刊　鍾伯敬定

袁中郎全集

袁中郎全集卷一

公安　袁宏道　著

景陵　鍾惺　定

鼎水　曹勳　閱

序

敘陳正甫會心集

世人所難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態雖善說者不能下一語唯會心者知之今之人慕趣之名求趣之似於是有辨說書畫涉獵古董以為清寄意玄虛脫跡塵紛以為遠又其下

書影四

明刊　梨雲館類定

袁中郎全集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卷之一

廣陵王[illegible]閱

仁和何偉然欽仙閱

公安袁宏道中郎著

古歙吳從先寧野

擬古樂府　附錄篇

南雍周文煒如山鐫

樂府之不相襲也自魏晉已然今之作者無異拾瀋使李杜元白見之不知何等呵咲也自中無事漫擬數篇詞雖不工庶不

書影五——

明刊

繡水夏氏刻

中郎十集

（此「狂言」袁小脩認爲僞作）

袁中郎狂言卷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甫著

繡水夏蔣徵君錫甫校

三教圖引

三教之說從來爭執無定以其有異有同也余以爲彼既得其究竟之同便不必問其取途之異譬如往京師東人往南人往西人亦往其取途雖異而至京師則同也此非余之臆見也彝倫嘗有之矣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書影六——

明刊

袁中郎遺稿

序

陝西鄉試錄序

臣竊歎昔之士以學爲文而今之士以文爲學也以學爲文者言出于所解而辭傳于所積如雲族而雨注泉湧而川浩故昔之立言難而知言易也以文爲學者拾餘唾于他人架空言于紙上如貧兒之貸衣假姬之染黛故今之立言易而知言難也夫文章與時高下今之時耗格卑而意近若于世無損益而風行景逐常居氣機之先蓋天下之精神萃焉故臣每

書影七——

明刊

中郎逸稿珊瑚林

珊瑚林上卷

古鄣門人張五教纂
錢唐後學馬　貞校

明公安袁宏道中郎　著

大學所謂格物乃徹上徹下語紫陽謂窮至事物之理此徹下語也殊不知天下事物都是知識到不得者如眉何以竪眼何以横髪何以長鬚何以短男女精血何以成人此等可窮至乎此徹上語也求知物理如蛾趨明轉爲明燒且下孤燈亦復何益

書影八——

同治本

袁中郎全集附編

袁石公遺事錄

袁石公遺事錄一　從孫照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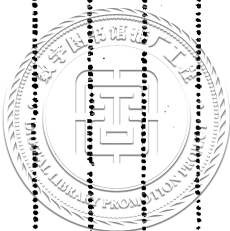
著作

公兄伯修白蘇齋集與陶石簣書云岑寂中讀家弟諸刻如籠中鴝鵒忽聞林間鳴鳥之音傚不即掣條裂鎖與之偕飛家弟書云石簣無日不禪間一詩弟無日不詩間一禪禪則不論詩可錄數篇教我

又寄大人書云二哥有書來正同陶石簣遊齊

袁中郎目次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次

蔡中郎

明末的新文學運動（代序）

周作人

民國以後的新文學運動，有人以爲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胡適之先生在他所著的白話文學史中，他以爲白話文學是文學唯一的目的地，以前的文學也是朝着這個方向走，只因爲障碍物太多，直到現在才得走入正軌，而從今以後一定就要這樣走下去。這意見我是不大贊同的。照我看來，中國文學始終是兩種互相反對的力量起伏着，過去如此，將來也總如此。

要說明這次的新文學運動，必須先看看以前的文學是什麼樣。現在我想從明末的新文學運動說起，看看那時候是什麼情形，中間怎樣經過了清代的反動，又怎樣對這反動起了反動而產生了最近這次的文學革命運動。更前的在這裏只能略一提及，希望大家自己去研究，得以引申或訂正我的粗淺的概說。

晚周，由春秋以至戰國時代，正是大紛亂的時候，國家不統一，沒有強有力的政府，社會上更無道德標準可言，到處只是亂鬧亂殺，因此文學上也沒有統制的力量去拘束牠，人人都得自由講自己願

講的話，各派思想都能自由發展。這樣便造成算是最先的一次詩言志的潮流。

文學方面的興衰，總和政治情形的好壞相反背着的。西漢時候的政治，在中國歷史上總算是比較好些的，然而自董仲舒而後，思想定於一尊，儒家的思想統治了整個的思想界，於是文學也走入了載道的路子。這時候所產生的作品，很少作得好的，除了司馬遷等少數人外，幾乎所有的文章全不及晚周，也不及這時期以後的魏晉。

魏時三國鼎立，晉代也只有很少年歲的統一局面，因而這時候的文學，又重新得到解放，所出的書籍都比較有趣一些。而在漢朝已起頭的駢體文，到這時期也更加發達起來。更有趣的是這時候尚清談的特別風氣。後來有很多人以爲清談是晉朝的亡國之因，近來胡適之顧頡剛諸先生已不以爲然，我們也覺得政局的糟糕絕不能歸咎於這樣的事情。他們在當時清談些什麼，我們雖不能知道，但想來是一定很有趣味的事。世說新語是可以代表這時候的時代精神的一部書。另外還有很多的好文章，如六朝時的洛陽伽藍記，水經註，顏氏家訓等書內都有。顏氏家訓本不是文學書，其中的文章卻寫得很好，尤其是顏之推的思想，其明達不但爲兩漢人所不及，即使他生在現代，也絕不算落伍人物。對各方面他都具有很眞切的了解，沒一點固執之處。水經註是講地理的書，而裏邊的文章也特別好。

其他如六朝文絜內所有的文章，平心靜氣地講，的確都是很好的，即使叫現代的文人寫怕也很難寫得那樣好。

唐朝，和兩漢一樣，社會上較統一，文學隨又走上載道的路子，因而便沒有多少好的作品。這時代的文人，我們可以很武斷地拿韓愈作代表。雖然韓愈號稱文起八代之衰，六朝的駢文體也的確被他打倒了，但他的文章，即使是最有名的盤谷序，據我們看來，實在作得不好。僅有的幾篇好些的，是在他忘記了載道的時候偶爾寫出的，當然不是他的代表作品。

自從韓愈好在文章裏面講道統而後，講道統的風氣遂成為載道派永遠去不掉的老毛病，文以載道的口號雖則是到宋人才提出的，但他只是承接着韓愈的系統而已。

詩，是唐朝新起的東西，詩的體裁也在唐時加多起來，如七言詩，絕句，律詩等都是。但這只是由于當時攷詩的緣故。因攷詩所以作詩的加多，作品多了自然就有很多的好詩。然而這情形終於和六朝時候的創作情形是不相同的。

唐以後，五代，自宋初，通是走着詩言志的道路，詞雖是和樂府的關係很大，但總是這時期新興的一種東西。在宋初好像還很大胆地走着這條言志的路，到了政局穩定之後，大的潮流便轉入于載道

方面。陸放翁，黃山谷，蘇東坡諸人，對這潮流也不能抵抗，他們所寫下的，凡是我們所認爲有文學價值的，通是他們暗地裏隨便一寫，認爲好玩的東西。蘇東坡總算是宋朝的大作家，胡適之先生很稱許他，明末的公安派對他也捧的特別厲害，但我覺得他絕不是文學運動方面的人物，他的有名，在當時只是因爲他反對王安石，因爲他在政治方面的反動。（我們看來，王安石的文章和政見，是比較好的，反王派的政治思想實在無可取。）他的作品中的一大部分，都是摹擬古人的，如三蘇策論裏面的文章，大抵都是學韓愈學古文的。只因他聰明過人，所以學得來還好。另外的一小部分，不是正經文章，只是他隨便一寫的東西，如書信題跋之類，在他本認爲不甚重要，不是想要傳留給後人的，因而寫的時候，態度便很自然，而他所有的好文章，就全在這一部分裏面。從這裏可以見出他仍是屬於韓愈的系統之下，是載道派的人物。

清末有一位汪瑔批評揚雄，他說揚雄的文章專門摹仿古人，寫得都不好。好的，只有酒箴一篇，那是因爲他寫的時候隨隨便便，沒想讓牠傳後之故。這話的確不錯。寫文章時不擺架子，當可寫得十分自然，好像一般官僚在外邊總是擺着官僚架子，在家裏則有時講笑話，自然也就現得很眞誠了。所以，宋朝也有好文章，却都是在作者忘記擺架子的時候所寫的。

元朝有新興的曲，文學又從舊圈套裏解脫了出來。到明朝的前後七子，認爲元代以至明初時候的文學沒有價値，於是要來復古。不讀唐代以後的書籍，不學杜甫以後的詩，作文更必須學周秦諸子。他們的時代是十六世紀的前半。前七子是在弘治年間，爲李夢陽何景明等人，後七子在嘉靖年間，爲李攀龍王世貞等人。他們所生時代雖有先後，其主張復古却是完全一樣的。

對於這復古的風氣，揭了反叛的旗幟的，是公安派和竟陵派。公安派的主要人物是三袁，卽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人，他們是萬歷朝的人物，約當西歷十六世紀之末至十七世紀之初。因爲他們是湖北公安縣人，所以有了公安派的名稱。他們的主張很簡單，可以說和胡適之先生的主張差不多。所不同的，那時是十六世紀，利瑪竇還沒有來中國，所以缺乏西洋思想。假如從現代胡適之先生的主張裏面減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響，科學，哲學，文學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張了。而他們對于中國文學變遷的看法，較諸現代談文學的人或者還更要淸楚一點。理論和文章都很對很好，可惜他們的運氣不好，到淸朝他們的著作便都成爲禁書了，他們的運動也給乾嘉學者所打倒了。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這是公安派的主張。在袁中郎（宏道）叙小修詩內，他說道：

……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以爲未能盡脫近代文人習氣故也。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於秦漢，詩則必欲準於盛唐，剿襲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爲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準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惟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則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

這些話，說得都很得要領，也很像近代人所講的話。

在中郎爲江進之的雪濤閣集所作序文內，說明了他對於文學變遷的見解：

……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於怨，不騷不足以寄也。後人有擬而爲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於騷之中也。至蘇李述別，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制皆變矣，然不謂之眞騷不可也。……

後面，他講到文章的「法」——即現在之所謂「主義」或「體裁」：

……夫法因於敝而成於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飣餖之習者以流麗勝，飣餖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於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奇則境必狹，而僻則務爲不以根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於物無所不收，於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法唐，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

對於文學史這樣看法，較諸說「中國過去的文學所走的全非正路，而只有現在所走的道路才對」要高明得多。

批評江進之的詩，他用了「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八個字。這八個字可說是詩言志派一向的主張，直到現在，還沒有比這八個字說的更中肯的，就連胡適之先生的八不主義也不及這八個字說的更得要領。

因爲他們是反對前七子的復古運動的，所以他們極力的反對摹倣。在剛才所引中郎的雪濤閣集序內，有着這樣的話：

……至以剿襲為復古，句比字擬，務為牽合，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有才者絀於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才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於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倡億和，優人騶從，共談雅道。吁，詩至此亦可羞哉！……

我們不能拿現在的眼光，批評他的「優人騶從，共談雅道，」為有封建意味，那是時代使然的。他的反對摹倣古人的見解實在很正確。摹倣可不用思想，因而他所說的這種流弊乃是當然的。近來各學校攷試，每每是以「董仲舒的思想」或「揚雄的思想」等作為國文題目，這也容易發生如袁中郎所說的這種毛病，使得能作文章的作來不得要領，不能作的更感到無處下筆。外國大學的入學試題，多半是「旅行的快樂」一類，而不是「關於莎士比亞的戲曲」一類的。中國也應改變一下，照我想，如能以太陽或楊柳等作為作文題目，當比較合適一些，因為文學的造詣較深的人，可能作得出好文章來。

伯修（宗道）的見解較中郎稍差一些。在他的白蘇齋集的論文中他也提出了反對學古人的意見：

今之圓領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何也？古

人之意期於飽口腹蔽形體，今人之意亦期於飽口腹蔽形體，未嘗異也。彼摘古人字句入己著作者，是無異綴葉於衣袂之中，投毛血於殽核之內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於達，而今人之文專期於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論文上）

……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而欲強笑，亦無可哀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曾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曾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圖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鉅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溺，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編，抹去古語陳句，幾不免曳白矣。……然其病源則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苞塞於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兔起鶻落，猶恐或逸，況有閒力暇晷引用古人詞句耶？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論文下）

這雖然一半講笑話，一半挖苦人，其意見卻很可取。

從這些文章裏面，公安派對文學的主張，已可概見。對他們自己所作的文章，我們也可作一句總括的批評，便是：「清新流麗。」他們的詩也都巧妙而易懂。他們不在文章裏面擺架子，不講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只要看過前後七子的假古董，就可很容易看出他們的好處來。

不過，公安派後來的流弊也就因此而生，所作的文章都過于空疏浮滑，清楚而不深厚。好像一個水池，汙濁了當然不行，但如清得一眼能看到池底，水草和魚類一齊可以看清，也覺得沒有意思。而公安派後來的毛病即在此。於是竟陵派又起而加以補救。竟陵派的主要人物是鍾惺譚元春，他們的文章很怪，裏邊有很多的奇僻的詞，但其奇僻絕不是在摹做左馬，而只是任着他們自己的意思亂作的。其中有許多很好玩，有些則很難看得懂。另外的人物是倪元璐，劉侗諸人。倪的文章現在較不易看到，劉侗和于奕正合作的帝京景物略在現在可算是竟陵派唯一的代表作品，從中可看出竟陵派文學的特別處。

後來公安竟陵兩派文學融合起來，產生了清初張岱（宗子）諸人的作品，其中如瑯環文集等，都非常奇妙。瑯環文集現在不易買到，可買到的有西湖夢尋和陶菴夢憶兩書，裏邊通有些很好的文章。這也可以說是兩派結合後的大成績。

那一次的文學運動，和民國以來的這次文學革命運動，很有些相像的地方。兩次的主張和趨勢，幾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許多作品也都很相似。胡適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個水晶球樣，雖是晶瑩好看，但仔細的看多時，就覺得沒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廢名兩人，他們的作品有時很難懂，而這難懂卻正是他們的好處。同樣用白話寫文章，他們所寫出來的，卻另是一樣，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須費些功夫才行。然而更奇怪的是俞平伯和廢名并不讀竟陵派的書籍，他們的相似完全是無意中的巧合。從此，也更可見出明末和現今兩次文學運動的趨向是相同的了。

——載中國新文學的源流

袁中郎的評傳

一　袁中郎的生平（任維焜）

溫暖的春早已來了，但在極北的燕都，仍然是冷酷異常，西直門外的楊柳，還沒有吐露出牠的綠芽；二月十二日的晚上，相傳爲花朝之夕，天空中的月色格外皎潔，冷風同剪刀一般割着人的皮膚，就在這個時侯，東直門外的道上，有兩條黑影很迂緩的出了北安門到了藥王廟，四外冷清沈寂，他們走



到御河岸上，就踔立在那裏，呆對着那一望皓白還沒有融解了的冰皮，同清輝的月色相映曆的寒光發怔，後來好像他們也禁不住了那刺骨的寒冷的襲擊，於是就不得不走進附近的一個古寺中去，寺內也很淒涼寥落，簷前鐵馬的叮噹聲，同野外的犬吠聲，斷斷續續互相應和，殿上的題額同古碑上的刻字，都朦朧模糊的可以辨別。他們很有興致的用手拍撼那院內的老樹，想驚醒那宿棲在巢內的老鴉起來伴他們賞玩那月夜的美，但是樹雖然是[illegible][illegible]的響着，小枝也微微的在空中顫動着。可是那老鴉仍舊是一聲不響的在裝睡，末了他們憤憤的拿石子擲進巢裏去，可是依然的沒有絲毫動靜，這時他們都以為老鴉一定要凍僵了，於是就要打算走，猛不防一陣冷風，吼吼的從簷邊吹下，陰沙同霧一般撲面而來，在他們趕忙拿手蓋着臉，很倉皇的跑進禪堂裏去，但是這已經是把他們凍得上牙打着下牙，發着澀澀的聲音了。讀者試猜前邊所寫的是那兩位癡客所幹的事？那就是目下本文所要介紹的名高一代秀出一時的袁中郎他同他的三弟小修，在深夜衝寒踏月，逛遊御河，探訪崇國寺的遺事。

說起袁中郎，他在那明代晚葉的文壇上，真不啻是黃沙連天的戈壁中的一個綠洲，更不啻是深冬酷寒荒草枯枝蓋遍了的山原上的一樹寒梅。同時呢，他又好像是在血戰之餘，士卒困疲後的一枝異軍突起，他的作品的秀麗，不僅給當代的文壇上一鬱香澄澈之感，則歷幾百年後，到了我們這個時

代，還依然保持着他原來的風姿。既然他在當時文壇站如此的地位，那麼自然是有把他詳細的正確的介紹給現在一般愛好文學者的目前的必要。

·

袁宏道（一五六八——一六一〇）字中郎，號石公，在明代隆慶二年十二月六日生於湖北公安縣的一個以耕讀為業的家裏，他的父親名士瑜，號七澤公，為邑諸生，雖說以後文戰屢屢敗北，可是他的學識倒是非常的篤實，中郎生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裏邊，固然師承方面不怎樣高明，但是因為他的天分很高，所以在事業上終竟有着卓越的成就。

中郎平生最大的不幸，就是在他剛剛能離了母親的懷抱時，他的母親就拋棄了他而永久別人世了。中郎同母兄弟三人，這時他的哥哥伯修，比他大九歲，他的弟弟小修比他小二歲，伯修是可以自立啦，而他同他的弟弟都被撫養於他的庶寡母詹氏，才算漸漸成人。中郎的情深多感，在童年都已流露了出來，在他的傳中說他「少時卽具倍年之覺，母卒，先生不數哭，一哭卽痛絕，人以是知其有隱慧焉。」這話很可以說明中郎的天性是如何的特別了。十五六歲的時候進了鄉校，於是就組織研究文學的團體，自己作團體中的領袖，同社中有不少年齡比他大的，但是都很尊重他，沒有敢於違背他的

約束的。關於中郎的學識，這時很受了一點別人的影響，我們是不能不注意的，據伯修的送夾山舅母之往太原序云：

「宗道兄弟三人，遊於都門，得與海內士大夫往還，二三名流俱不以髫齔庸碌見棄，推而附之大雅之林，其友之相習者！戲謂南平一片黃節白葦，何得出爾弟兄三人？蓋謬疑開闢蓁蕪自我兄弟，而不知點化鍾鑄，皆舅氏惟學先生力也。先生少從方伯出宦四方，獨取異書秘文以歸，歸偕駕部弟閉門讀書，公得雋後，先生結茆城南，號曰陽春社，一時入社講業者如余不肖兄弟亦其人也。自有此社，始知程墨之外大有書帙，科名之外大有學問，」

從這句話，我們可以曉得中郎是如何的受着他的舅父龔惟學的影響了，在以前只知帖括應舉是學問，不知另外還有眞正的學問者在，在以往只知闈墨八股是典籍，而不知另外還有所謂經史子集一類眞正的典藉者在。但是從此以後，已經跨進了門，而從事於眞正學問的探討，這眞是中郎在學問的途程上的一個轉變，而且是他後來之所以能夠有所成就的最大關鍵。

萬曆十四年伯修舉進士，後爲翰林院編修，這時，中郎已十九歲了，他的詩作得很有風致，病中短歌中云：

「吁嗟我生已十九，頭髮未長頰已朽。病寒三月苦沈吟，面貌如烟載露肘。羸枯博得妻兒憐，七尺浪為鬼神有。篋裏殘書別故人，几上龍鍾門老叟。無情莫問囊中錢，有枕還開牀下酒。蟲臂鼠肝彼何人，磋來子桑眞我友。」

次年（十五年）夏天，伯修以宮詹告歸，從此他們弟兄聚首，終日研討學問，未及一年，中郎舉於鄉。伯修亦入都。又六年登進士第，不久就同伯修先後出都返里。

中郎返里後也不急急於作官，於是就淹留故鄉，過他的很痛快的浪漫生活。這時同他來往的，除了他的大哥同三弟外，還有他的外祖父龔大器，舅父惟學，惟長，有時他們到二聖寺去講論性命之學，有時到江中划船，或者飲酒唱和。他們父子甥舅，組織了一個詩社，起名南平社；社員是袁氏昆仲同龔氏父子，而社長則是中郎的外祖父。有一次中郎兄弟同他的舅父去逛石湖，因為中郎的外祖父上了年紀啦，所以沒有告訴他就偷偷的出發了。他們剛剛到了目的地，大家正要拾石子比着誰扔的遠的時候，忽然從對面的雪浪中飄一葉小舟，同飛一般的撑來，裏邊坐着一位清臞的老頭兒，指揮江山，大有旁若無人之概。這時他們都很懷疑，想着那裏會有這樣逸興高致的人呢？誰知仔細一看，是中郎的外祖父。當船靠近江岸的時候，他就大聲吠喝道：「為什麼你們把老子撇下了呢，」於是登岸舞拳數

道，表示他還不老，大家都大笑，一直逛到黃昏時分才回去了。臨行各人分韻，作詩紀遊，這位老先生回去後也不休息，就在燈下把詩寫成，用蠅頭小楷謄了一遍，次日天剛明就打發人把詩送給他的外孫同兩個孩子，誰知他們都累得什麼似的，尙高枕而臥沒起牀呢。詩自然不用說沒顧得作啦，及至一見這位老先生的詩，都不禁大爲驚訝。這是一個極有趣的故事，即此也就可以想像到他們平日生活的情況了。中郎有歸來詩，敘述他們兄弟的生活道：

「歸來兄弟對門居，石浦河邊小結廬。
可比維摩方丈地，不妨揚子一牀書。
蔬園有處皆添甲，花雨無多亦留渠。
野眼科頭常聚首，院家禮法向來疎。」

同時小修的遊居柿錄中也說道：

「壬辰中郎成進士，與伯修同請告歸，伯修市一居與余一小宅臨，住河西，中郎住河東，予外王龔春所公及諸舅俱居河東，朝夕聚首，譚禪賦詩爲樂。」

這裏邊的話很可以爲中郎的「歸來兄弟對門居，石浦河邊小結廬」等句作註脚。

當時王李文學已瀰漫天下，文壇上呈一種奇特之現象，一般文人極盡鄙陋拙笨之能事，中郎在此時已對之表示不滿了，他答李子髯一詩中道：

「若問文章事，應須折此心，中原誰崛起，陸地看平沈。
矯矯西京氣，洋洋大雅音，百年推屈指，幾許當詞林？
草昧推何李，聞知與見知，機軸雖不異，爾雅良足師。
後來富文藻，詘理競修辭，揮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
模擬成險狹，莽蕩足世機，直欲凌蘇柳，斯言無乃欺？
當代無壺字，閭巷有眞詩，却沽一文酒，携君聽竹枝。」

「百年推屈指，幾許當詞林；」「當代無文字，閭巷有眞詩。」這是罵盡了當代奉模擬爲規律的肓從的下流作家，而這首詩眞也不啻是對復古派的文豪們所發的一個宣戰的通牒。中郎的卓識與精神，眞可以說是超越一代啊！

萬曆二十一年，伯修到黃州龍潭問學，中郎小修也一塊兒去了，他們所訪問的人是當代有名的人物李龍湖先生。李氏天才高出一代，而對於道又深有研究，中郎兄弟受他的影響很大，中郎復尊之

爲師，在思想上同作品上，可以說中郎見了他這才立定了自己的脚步，關於這一點，我們是應該注意的。

他們是四月中出發的，到了五月初間，即抵龍潭，盤桓約有旬餘，才回來了。臨行中郎有別龍湖詩八首，龍湖亦有答詩，俱見於敝篋集。

從龍潭歸來，仍照舊的過着他們往日似的生活，但是因爲種種關係的逼迫，一則爲的朝廷方面假期已滿，再則家中老父的催促，到了次年十二月，不得不進京謁選，結果被任爲江蘇吳縣的縣令，次年二月，中郎在春寒料峭中，別了他的大哥同三弟由京往江蘇進發了。一路經過蘆溝良鄉涿州，——到滕縣，遂坐船從水道到了吳縣，到後就接任了。中郎是一個疏放不羈的詩人，現在呢，居然衣冠楚楚的作起縣令了，結果一切的麻煩呆板，都足以使他苦惱，所以在他給師友的信中，沒有不是發牢騷的。與沈博士書云：

「作吳令無復人理，幾不知有昏朝寒暑矣。錢穀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風影，過客積如蚊蝱，官長尊如閻老。以故七尺之軀，疲於奔命，十圍之身，綿於弱柳。每照鬚眉，輒而自嫌。」

又與毛太初書云：

「弟已得吳令，甚煩苦，殊不如田舍翁飲酒下棋之樂也。」

可是人沒作官時，覺得官是很痛快的，但是真正官拏到手裏了，反而覺得累贅不舒適了。遠過一千餘年前的陶彭澤，恐怕也是因爲「縣令不如田舍翁飲酒下棋」之樂，所以才掛冠而去的吧。

中郎在宦場中的生活，與一般的官僚大異其趣，除了聽折訟獄辦理錢穀應付上官以外，閒時就與二三友人下棋吟詩，一位落魄的名士方子公就是他這個時候的食客，同時他的至好的朋友江進之陶石簣也到那裏去訪他，見了以後，總是一塊兒去逛逛附近的名山勝地。本來吳越山川，原來就很秀媚，「如少女時花，婉約可愛，」中郎本有山水癖，所以就是在這很忙迫的環境中，像那虎丘上方西洞庭靈巖虎山橋天池天平諸地，還絕不了他的足跡，而且從這些遊覽中，很使他產生出不少優美絕妙的小品文，同清澈得不染一塵的新詩，中郎的作品，到此時已足自成一家，而且對於當代的昏庸的作家，已經大肆攻擊，他的諸大家時文序，小修詩序，與丘長孺書諸篇，激烈的宣戰式的文章，都是在這個時候作的，同時他在當代文壇上的地位，也是在這一個時期中奠定了的。

中郎到吳後，不久小修就從水道自京來吳，所以兄弟聚首，也頗可以消去一點衙中寂寞。他與他的舅父龔惟學書中很說了一點他的生活的情況：

『令吳只得個苦忙耳，無他受用。去歲曾一涉太湖，觀七十二峰絕勝處，眞非人境；今歲一過天池硯石諸山。甥嘗謂吳令苦樂皆異人，何也？過客如蝟，士宦若鱗，是非如影，其他錢穀案牘無論，即此三苦誰復能堪之？若夫山川之秀麗，人物之色澤，歌喉之宛轉，海錯之珍異，百巧之川湊，高士之雲集，雖京亦難之，今吳已饒之矣。洋洋乎固大國之風哉。今之稱吳令者，見樂而不見苦，故每譽過其實，而其任吳令者，見苦而不見樂，又不免畏過其實。甥意都謬謂不然，故雖苦其苦，而亦樂其樂，想尊者聞之，必大有當於心矣。』

這的是中郎眞情實地的自白。

中郎令吳後之第二年，得到他的庶祖母的病耗，於是決意辭職，於三月上乞歸表，但朝廷沒有照准，並令他勉力從事。他心仍不死，不久又二次上表，終究又歸失敗，因之鬱鬱，到了秋天竟染上瘧疾，一直到初冬時候才少為好一點。因為急於辦公，不料舊病復發，輾轉牀第，連綿不已，竟然害了五個多月，又一度上表乞歸，仍然沒有發生效力。中郎在病中還很詼諧，他與吳山羅書云：

「走病瘧幾無復人理，倏而雪窖冰霄，倏而礫石流火，南方之焰山，北方之冰國，一朝殆遍矣。夫司令所以罰此下士者，正多，何必瘧也？毒哉！」

又與朱司理書云：

「走病實不堪勞頓，勞發則頓性命敢作兒戲乎？數日內聞赴閻王之召者數人，王子聲李丹陽亦死矣，病吏那得不求去也！」

這眞是苦趣橫生，愁味十足的文字啊。

病魔也眞害人不淺，不但「冷了人宦情，」而且爽了友人之約。在去年（乙未）陶石簣從京返里道經吳縣的時候在酒席上同中郎相約後會的時期，當時正吃着橘子，於是石簣就說道「等橘再熟時，我就可以來這裏同你去遊洞庭。」誰知到了今年，中郎又一再給石簣去信，請他務踐所約，及至園橘漸黃，石簣果然來了，不料偏偏不巧，中郎正在發瘧子呢。於是算是在榻前談了幾天，很掃興的走了，洞庭之遊，也算是無形中作罷了。因之中郎求去的心更堅，與羅隱南書云：

「瘧來四月，連牘乞歸，尙不得請，微幸已十痊其五六，終日說官苦，不知病更苦，說做官難，不知求去更難。自入秋來，見烏沙如糞箕，靑袍類敗網，角帶似老囚長枷，進退狼狽，實可哀憐，不知丈何以見策？」

又與朱司理書云：

「走蕭散無用人也，一入吳縣，如鳥之在籠，羽翼皆膠，動轉不得，以致鬱極傷心，致此惡病。大抵病因於抑，抑因於官，官不去，病不痊，今聞上官有不予假之命，是活埋我也，死無日矣。」

有如此之決心，所以終覺朝廷拉不着他，末了只得把他放了。到了次年春，他才算很清閒的脫離了吳縣，他臨行時的心情，此地有詩為證：

「擬將心事寄烏籐，料得前身是老僧。
病裏望歸如望赦，客中聞去似聞陞。
尊前濁酒憨憨醉，飽後青山處處登。
南北宗乘參取盡，龐家別有一枝燈。」

與張幼于書

「擲却進賢冠，作西湖蕩子，如初出阿鼻，乍升兜率，情景不可名狀。自今以往，守定丘壑，割斷區緣，再不小草人世矣！」

自官衙出來，中郎從此開始了他的飄泊流浪的生涯，在那「柳色漸舒枝漸齊，流鶯澁澁美春暉

山」的時光中，中郎同他的食客方子公踏上了他們的旅途了。他們從吳縣出發，是在二月十日，春之神早已把江南妝點得十分妖嬈濃艷了。他們在那絲絲的楊柳輕拂人頭，滿野的菜花香氣亂撲人鼻的路上徜徉着，如痴如醉的欣賞着這樣的過了嘉興，不數日可到了杭州。

「山上清波水上霞，唐時花月宋時春，」滿貯着希望的熱情，打算一睹西子湖的姿容的中郎，當他從武林門向西走，剛剛望見那突兀層崖中的保叔塔時，他的心已不覺早飛到湖上了。到了中午，他們到昭慶吃杯茶，略一休息，就買舟去逛起來。這時的中郎眞是沈醉在西子湖的懷抱中了。看着那青翠得同蛾眉似的山色，艷麗得同面靨似的花光，輕拂着那如酒似的溫風，飄浮在那如綺縠似的波紋之上，眞是不知道如何是好了。簡直同一位痴人，徒然遇見了一個妙絕一代的美女子似的使他馬上舉措都爲之不安起來。他同幾位朋友一直逛了一天，晚上從六橋岳墳去找他的老弟小修曾經住過的僧房作爲暫且歇足的所在。

中郎到西湖後，就去函邀他的知友陶石簣兄弟：

「病夫竟解官矣，至湖上矣，君家兄弟幸如約早過一譚。病夫此來攜得有二十斗珠璣，當與君家兄弟共之。」

誰知他們眞個不久也來了，於是他們就在西湖索性的玩個痛快。

西子湖對他們這些放蕩的冶遊者，好像是特別垂靑似的，在這一個春天，梅花因爲冷的緣故，開得很晚，於是同桃杏相次放蕊，因之更顯出一種特殊的景色，在濃艷中有着淸淡，好像一位靚妝的女郎，從富麗中透出一段冷如霜雪的風韻似的。由斷橋至蘇堤，一眼望去「綠烟紅霧，瀰漫二十餘里，」一同時一些佳人名妹，公子王孫們的遊踪，更給湖山添一派豪華的氣象。不過像這種風光，雖然爲中郞所稱道，但幷不是他衷心所愛好的景色，他所愛好的乃是淸晨的朝日剛剛出來，或傍晚夕陽才落的時候，那種靑翠的湖光同奇麗的山嵐，眞使他不禁爲之陶醉。此外更足以使他顚倒的，乃是當夜闌人散一輪明月當空的時候，所以他常常在晚上同他的友人們在湖上徘徊，去領略那一般人所不注意而領略不到的湖山的美。

「雨橫風狂三月暮，」中郞到西湖不覺已從二月到三月了。寒食過後，風雨凄凄，一天中郞就對他的朋友說道：「這是給西子湖洗去臉上胭脂的雨，我們應當趕緊去同桃花作別。」於是他們踏泥到了六橋，只見落花狼藉堆積寸餘，他們相對感傷了一陣，後來疲倦了，就躺到地上飮酒，酒令是誰的臉上落花多者飮酒，少者唱歌，鬧了一陣。忽然見從遠遠的花叢中現出一隻小艇，仔細一看原來是二

位僧人送茶的，他們各人飲了一杯，就坐上這隻艇子，一方面蕩着，一方面唱着曲回去了。回去後，作詩一首，記這次的遊踪道：

「流鶯舌倦語初歇，畫槳微點梨花雪，

茶葉白抽四五旗，竹孫斑裹兩三節。

芒草如綿陷歸轍，霧骨雲魂冷蒼鬣，

落紅雨過更愁人，六橋十里猩猩血。」

中郎在西湖逛了月餘，所謂名勝的地方，如孤山西陵橋飛來峰北高峯等處，也都一一的尋訪了不知多少次，到最後只得離開那裏。臨走還說些「不忍題歸去，終難滯許時，眼前雖別去，只恐病相思，一類難割難捨的話，可見他對於她（西子湖）是如何的眷戀了！

別了西子湖，就又同陶石簣過江去遊湘湖。而遊湘湖的目的，則是爲的吃蓴菜，中郎的記中說：

「其品可以寵蓮嬖藕，無得當者，唯花中之蘭，果中之楊梅，可異類作配耳。」

可見蓴菜之美了。不過這次遊湖到非常的不湊巧，湖在蕭山城外，四周都是山，他們探湖的時候，不幸湖水被漁者所盜，波面很狹，舟行不多遠，就索然的回來了。以前向中郎誇耀湘湖的陶周望同汪

靜虛這時都不禁爲之啞然。

離了蕭山，他們就去探禹穴，弔六陵，在那「蕭騷岑寂，」碑碣荒斷，老松橫道，杜鵑花滴血滿山的古蹟之旁，不禁令他們感慨悲歌，泣數行下，從六陵到鑑湖，依然是「荒草綿芒如烟，蛙吹如哭」的淒涼境地。這時中郎忽然憶起「不惜金龜擲酒爐」的賀鑑湖來，就喟然同陶石簣說道：「你之狂不勝季眞，飲酒不勝季眞，只有兩隻眼睛，同季眞還差不多。」陶石簣於是就問道：「怎見得？」中郎於是就又說道：「季眞識謫仙人，你識吳縣令，眼力還算不好麼？」旁人聽了他這話，心中都覺得他眞是在發瘋。

在鑑湖住了整整十天，又穿上他們的芒鞋，從山陰道經過諸暨去逛五泄，五泄離諸暨縣城七十多里地，一路盡是些平平無奇的頑山，幾乎連一片石可以看得上眼的都沒有，中郎這時大有倦意，想着跑到數百里外來看山，緻舟羸馬，苦得什麼似的，現在看着這些拙笨平凡的山容，怎能夠償還這次的路債呢！陶石簣以前也曾誇讚過五泄，但他同中郎一樣沒有去逛過，這時他就同他的老弟說道：「以前我們未免太誇讚五泄了，現在是這個樣子，也無怪乎中郎來揶揄了。」可是汪靜虛到深以爲不然，他們說話不及，可到了青口，於是就進了那狹道而曲折的山巷中，拐了許多灣子，才走到另外一個

世界，潭裏邊的水貼着山壁，冷冷流下，山完全是石頭堆起的，峯稜怒立，在一面峭壁上有一株老樹，據說是沈香樹，一年開一次花，就是猿猴也到不了。那個地方映白紅很多，有一丈多高的，紅白青綠，燦爛得同錦繡似的。他們於是就相對大叫，說道：「眞怪呀！有這巳足抵償我們的辛苦了，不怕中郎再說那些像彈子似的譏諷的話了！」這時汪靜虛說道：「這算得什麼！你們遇見這些小小的景色，就這樣的張皇。要是明天你們見是五洩，還不知你們要怎樣的發狂呢！」中郎同周望（石簣）聽了這話，眞是高興極了，於是在沙石上跑着跳着，及至到了五洩寺，日已偏西了。茶畢，他們到前潮去洗脚，看着奇詭的山勢，同清澈的潮泉，周望就問中郎道：「這比西湖如何？」中郎答道：「這簡直是仙姝，那能同那冶淫者相提並論呢！」在溪的兩旁，天竹成林，將到白龍井，遇見一位老人，說前山有虎，這時他們很害怕，於是就從舊路回來了。

從山門向右轉，是一石路，走不多遠，就聽了一陣疾雷似的聲音，中郎心中很驚訝，僧人說：「這是瀑布的吼聲。」於是他們就很快的跑起來。過了一個石洞，就看見前邊的青壁削立，瀑布自天而挂，撼山掉谷，同噴雪一般，打着那下邊的巖石，又同虹一般，忽卷忽掣，千態萬狀，變幻不已，眞是奇觀啊！他們靠着巖石坐下，最初那些飛沫打到臉上，同披絲一般，漸漸又同飛雨一般的吹來，然而他們還不忍走．

直等到日暮，才離開那裏。

在五洩又留連了幾天，才從玉京洞歸來，又到西湖。結果領了第二批的遊客，去登天目，在天目住了五天，離開那裏，又到新安爲他的友人陳正甫所留，一直縱談三天，才從巖鎮到潘景升家，於是大聚四方名士，終天飲酒聽歌，恣情放浪，不久又從新安江順流而下，又到杭州。這次的遊歷，經時三月有餘，同中郎始終一塊的是陶石簣，他們到最後算是在新安作別了，臨別時，陶石簣作有別詩七章，其第三云：

「朝停富春郭，夕泊釣台下，遙途漸以窮，離懷不可舍。
來潮接去水，白浪白如馬。君行往建業，我復下江陵。
良友更誰共？名山還幾登？前行路初迢，秋風夜作濤。
錢塘與揚子，兩處隔風潮。金陵猶自可，江陵正愁我。
將心比暗潮，不送潯陽柁。誰謂今日酸，卽是昨日歡？
江魚行逆水，勿使尺書難。」

歇菴集卷二

我們在拿這首詩聊且作爲他們這次遨遊的尾聲吧。

中郎回到無錫後不久就携眷到眞州他給江進之的信中說道：

「弟暫棲眞州城中房子寬闊可住，弟平生好樓居今所居房有樓三間，高爽而淨，東西南北風皆可至，亦快事也。又得季宜爲友江上柳下，時時納凉賦詩享人世不肯享之福，說人間不肯說之話，事他人不屑爲之事，頗覺受用。過陶元亮王無功日子，天蓋見弟兩年喫苦已甚，故用此相償，不然，何故暴得淸福如此。」

這也可以看到他的生活的一班了。從遨遊歸來過着淸閒的日子，沒事同友人談談天，或者出去逛逛，或者讀一點書，再不然發發牢騷，都是很愉快的在這一年中他給張幼于同江進之的信中，對於當時的文壇更是攻擊得體無完膚，讀着眞令人痛快煞也。

本年的秋天，小修從家中來，從此他們兄弟聚首，有時同他們朋友方子公去逛棲霞同攝山，無念和尚也一度到這裏，但不久就走了。總之，中郎在眞州這一段生活，是很恬靜安適的，我們從他的詩的風格可以看到他的心情是如何的平淡了，在他的丁酉十二月初度詩云：

「幽窗朝起日焚牋，收拾從頭舊簡編。

文字少無隔宿約，橐囊充有過年錢。
花前沃雪呼家妓，醉入虔心學老禪。
拋却吳官令一載，青泉白石幾高眠。」

這眞是帶着十足的隱者風味。

次年得伯修自京來函，促他入都，於是他就匆匆的一人別了小修，踏上了他的征途了，臨行有詩云：

「搔手幾日見新絲，二月河橋上馬時。
長短官街驚夢鼓，高低楊柳脊腸枝。
江烟一擠充行李，流水三叉各路歧。
北地南天千萬里，青巾白恰幾人知。」

經揚州高郵徐州德州坐坐船，又坐坐車，最後才算到了京都。抵京，春色已將暮矣。不過在春風竊臨較遲的北方，這時正是梨花盛開的時候，所以中郎還可以有同伯修月下賞梨花的韻事。

到此不久，就補順天校官，住在東直門內，這時中郎的家眷還在眞州，不幸他的孩子開美殤了，他

非常的悲痛，作詩云：

「官程屈指兩年餘，頗怪冀州消息疏，
七月始傳江令字，道兒亡在杪春初。」

就在七月小修送中郎的家眷來京，小修到後就入國學肄業，（見小修外集）從此他們兄弟三人又聚一處了。加之他們的朋友有許多都在京中供職，所以他們就在城西的崇國寺結社，名曰蒲桃社，裏邊的社友除他們兄弟三人外，還有黃平倩方子公鍾君威謝在杭等，常常在閒暇的時候，大家聚在那兒飲酒賦詩。在這時候可以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中郎在以前雖然很譏諷當代的作家，同時黜唐而伸宋，然而那不過是僅僅對於宋人的幾家有相當的心得罷了。這時呢，因爲生活的安定，事務的清閒，因之得以從容的欣賞，從容的創作，他給陶石簣的信中道：

「弟近日始遍閱宋人詩文，宋人詩長於格而短於韻，而其爲文，密於持論而疏於用，裁然其中實超秦漢而絕盛唐者，此語非兄不以爲快也。……弟比來閒甚，時時思想西湖樂事，毎得一景一語，卽筆之於書，以補舊記之缺，書成，可兩倍舊作，容另致之。」

一個作家一定得在某一個時候去找詩文的資料，那麼就非去放浪湖山，或者去入海中打一個

滾，換言之就是捨去你的平淡的生活，而找你的新生活同新的刺激，然後才能夠多所獲得，多所領悟。但是這種富於刺激的生活也不應永久持續下去，在他過一陣很繁富的生活後，還應當休息一下，借此可以盡情把自己內心中所蘊蓄的完全傾洩出來。中郎呢？在他盡情的遊歷了四個月左右，一直到現在才算生活安定了，那麼已往的一切，自然要賴這個清閒的時候，去淋漓盡致的發抒了。

己亥，仍留居京師，生活極有秩序，有時城外去逛逛，平常大都枯坐齋中讀書，或創作。在嚴酷的冬天，不能出門，於是就開始寫他的廣莊，所謂「廣」者，乃是推廣其意，自爲一莊的意思，同春秋的左氏易經的太玄一般。廣莊寫成後，又繼之而作瓶史，裏邊所寫的無非是種植花木的藝術一類的話。至於他的刻苦讀書的精神，說來也眞好笑，在他給王以明信中，他說他性不耐靜，常常一部書沒讀完，就騎着他的瘦馬同別人出去閒逛去了，更是遇着山水明媚的地方，每使他流連徘徊，竟日乃歸，所以他認爲這樣的讀書太難長進了，於是就叫一個丫頭，來監視着他，每逢稍一困倦了就提他的耳朵，敲他的頭，或者搔他的鼻子，叫他赶快的醒，這樣子才算漸漸的養成了耐性的習慣。有時對古人之意略有領悟，就叫號狂跳，同渴鹿奔泉似的高興。這樣的生活一直到次年（庚子，）又補禮部儀制司主事，但沒停幾個月，就告假返里了。

庚子年八月六日，中郎別了伯修，從京都起程取道河南月秒抵家，不幸抵家後，不久詹大姑即逝，同時伯修的噩耗也傳來了。（按伯修名宗道，生於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卒於萬曆二十八年十月，享年四十一歲，著有白蘇齋集）中郎眞是悲不自勝，從此灰心絕意仕進，決計隱居田園，於是就城南的一片低地，築堤種柳，號柳浪湖。湖上的風光，小修的柳浪湖記說得異常詳盡：

「郭外西南柳湖與斗湖一湖也。長堤間之，爲大道，達於南門，其內爲柳浪，柳浪匯通國之水，穿橋入於斗湖，實柳浪湖也。田之，然常浩浩焉，獨其中高阜者幾四十畝，可田，絡一堤，堤內外皆種柳及楓，帶以渠，渠樹之內，始爲田，田之內地較阜，復爲堤，周之堤上復種柳，堤之內，前爲放生池，種白蓮，亭臨之，後漸阜爲台，台之上則柳浪館在焉。爲室三楹，環以梁，台上及渠內皆種柳，凡堤之襲者三，渠之襲者二，樹之襲者六，若𥫩，若蕉，若陣，若城，翠碧醞釀，不知紀極。放生池堤外，右有窪地，不可田，築橫堤，與田隔，中種紅蓮，水中有洲，爲室三楹，以待各僧及過客也。右爲小堤以出，是爲門徑。左爲小堤，達於柳浪館。欲泛舟，則繞台下達於放生池，盤旋亭前，折而右，穿橋至紅蓮池，繞僧舍而西，穿於後渠，後渠西可達斗湖，水最闊。返棹仍從後渠，達於左右。既則前望見台上朱

欄，畫梁隱隱。繞而右，復還後渠後僧舍，從紅蓮池舊路歸焉。可二里許，日午，渠內無曦陽，濃樹遮樾，參差見碎天，水清澈底，此柳浪大略也。暑中中郎與予坐臥其中，晨起携諸僧麈談，倦則泛舟，月夜尤佳。常有一客嘗熱夜來避暑忘携襆，夜中凍欲絕，樹凡萬株，種楓柳者宜水也。楚中柳色止一月黃落，入秋楓葉紅酣如錦，士人云：「後有賞鑒，前有柳浪，」賞鑒為予居，柳浪為中郎別業也。」

柳浪湖記

在這樣優美的環境中，中郎就度他的隱居生涯，常常同詩人名僧相往還，參禪賦詩，成了正經的功課。辛丑四月終，小修送伯修靈櫬返里，中郎乘舟迎接到瓜儀相遇，中郎有：

「而今恰走南中路，不是生遊是死還。」

之句，在未葬伯修之前，伯修給七澤公託夢道：「愼軒（黃平倩）不至，兒不行。」誰知當黃愼軒剛到玉泉，伯修的葬期就恰好快到了，於是中郎就邀他題主，一時公安人都比之范張，也就不能不算是奇事。（見陶石簣與其弟奭齡書）

中郎癸卯初度有詩云：

「拋他銀綬去躬耕，半路鄉村半市城。
竹大許年成老友，梅開是度作同庚。
但憑髭髮稱前輩，轉覺聰明畏後生。
紫鳳檀槽香拍板，聽來都背水泉聲。」

萬歷三二年夏，湖上碧酣樓落成，中郎有詩云：

「聊作棲身地，遂成隱者家，三回修閣子，四度看荷花。
碎影方塘月，蒼烟活水茶，稚川徒自累，白首戀丹沙。」

秋同僧人入德山，臨行有詩云：

「一帆斜月墜澄川，似有人呼鐵笛仙。
老至青山爲眷屬，生來白社有姻緣。
幽探處處書成卷，淨侶年年載滿船。
料得浮踪無定止，止如竿影去時炎。」

到德山住了很長時候，遂著德山暑談一集，其小引中云：

「甲辰秋，余偕僧寒灰雲照冷雲諸生張明教入桃花源，餘暑尙熾，遂憩德山之塔院。院後嶺有古樟樹，婆娑偃蓋，深山青色與山光相盪，蒼翠茂密，驕焰如洗，櫛沐畢，則諸公已先坐其下，既絕糅雜，鬪號呶閙，言冷語皆歸第一。明教因次而編之，既還以示余，余曰『此風痕水紋也，公乃爲之譜也。然公胸中有活水者，不作印板文也。』遂揀其近醇者一卷付之梓。」

這是他德山生活的寫眞，也是德山暑譚這卷書產生的由來。

本年初度詩中第一首云「三十七年恆河眼，試觀那似舊潺湲，」這是帶着如何感慨的意味的話啊，其二三，四三首中如：

「一盞春芽融雪水，坐聽遊衲數青峯。」

「瀟碧堂中雲委地，柳浪湖上雪翻天。」

「要圖麴糵千回醉，且作槍榆數步飛。」

等句都完全是他實生活的反映。家居無事，於是蒐積前代掌故，著公安縣志，歷三年始告成，後爲火所焚。

翌年（乙巳）又携僧入遊青溪紫蓋諸名勝，都有詩紀遊，一年生活，可以從他的初度詩中看到：

「南郭讀書西郭田，一竿秋水一湖烟。
蠻歌社酒時時醉，不學龐家都逃禪。」

其二

「白石青山到處緣，月高梳櫛日高眠。
無聞已是慚夫子，四十于今少二年。」

他的除夕詩又寫他所以久居故鄉的原因道：

「十畝負江田，歸耕已七年，稚松雲委地，雛女髮垂肩。
貝葉翻將綻，荷衣着屢穿。貧鄉何可戀，大抵多林泉。」

秋中郎好友江進之卒。（關進之事跡見師友攷）中郎悲慟幾絕，進之實在是中郎的眞正知音者。他最稱讚中郎的文，但決不是瞎捧，確切有他的見地。在中郎哭江進之詩序中云：

「嗟乎！余與進之交豈復在口舌間哉，進之死，誰復有定中郎文者？已矣！已矣！」

這眞是很痛切的話啊。

萬歷三四年，中郎決計入京，他與李酉卿云：

「三月終將東下，由水道入京，行期稍滯，然四月決可南。」

可見他最初計劃，是打算從水道走，後來遷延遷延，直到秋天才赴都，臨行有余山居六年矣丙午秋復北上臨發偶成一詩詩云：

「又被開驪出冥鴻，那可飛？添多新蒜髮，典盡舊荷衣。
柳密雲侵郭，荷衣水漫磯。鷗鳧爭作語，客子幾年歸？」

又諸衲送至江干自嘲云：

「汕江渡，二十年中五番去。發雲醉石幾經春，畢竟驪上長安路。」

「汕江上，柳如雲，江若有知應移文。隔溪老衲笑且語，塞耳喧呼如不聞。」

從此中郎結束了他的隱居生活，踏上飄泊的旅途，從旱道北上了。

中郎這次入都，是走的旱道，先坐船逆流而上，到襄陽後捨舟登陸，過南陽葉縣等處，當他經過鄭州時，不禁使他追憶起往事來，於是作這樣的一首詩：

「壬辰秋日余與伯修兄俱得請，先後出都門，至鄭相及同宿州署，今相去十五年，伯修厭世已六

年矣，篝火驚心，山川觸目，因書數語兼示小修方平兩弟：

「十五度春秋，漏花轉眼休。含愁上東里，無路避西州。

孤月傷鴻陣，亂雲障馬頭。對床今夜雨，清淚幾行流。」

到京後即補儀曹主事，曹務清閒，蕭然無事。於是仍然繼續他的賞花會友，同著述的生活。

就在這一年的夏天他著觴政，在這部小著的序上，述他所以寫這部東西的動機道：

「余飲不能一蕉葉，每聞罏聲，輒踴躍，遇酒客與留連。不意日不休，非久相狎者，不知余之無酒量也。社中近饒飲徒，而觴容不習，大覺鹵莽。夫提衡糟丘，而酒憲不修，是亦令長之責也。今採古科之簡正者，附以新條，名曰觴政，凡爲飲客者，各收一帙，亦醉鄉之甲令也。」

在這篇的後邊，對於他當時諸友均有品評，也可以見到他心情的安閒了。此外還有可以注意的，就是他所著的公安縣志，也在這一年完成。（見孫錫蕃）序「自甲徂丙，始克告竣。」他的友人雷思霈給他作的序中說道：

「而中郎始有公安縣志，適錢令君屬之。中郎文章言語俱妙天下，是志也，抉奇搜奧，辨物核精，絕無志博士一酸語。」

這部書的內容，從這篇序上也可以想像得到她是如何的博洽精審，而且文詞美妙了，惜乎到現在我們已沒福分看到牠了。

因爲朋友的風流雲散，又因爲兄弟的存亡異路，所以在將近衰年的中郎，雖然留滯京都，而一切都足以令他觸目傷懷。城外的崇國寺，是他在以前常常同伯修與別的友人在那兒飲酒賦詩，歡會的場所。可是現在呢？什麼都完了！因之他就非常的感傷，在他的遊崇國寺一詩序中云：

「往與家伯修潘去華江進之黃平倩劉明自唐本如段徽之諸公，社於崇國寺葡萄方丈。相去七年，存亡出處，遂如隔世。丁未暮春，與龍君超陶孝若丘長儒李元善劉元質重經此地，泣下不能自止。聊述數語，以誌今昔。」

他的心情的淒凉，從此也就足以見到一二了。不幸他在本年秋又賦悼亡，他在潞河舟中和小修別詩次韵中有云：

「昔日饑寒伴，淒凉無一存。去花難返樹，好月不留軒。
龜手衣猶在，齊眉案尚溫。一門新舊鬼，強半北方魂。」

令人不忍卒讀。

秋從東路回衛後抵眞州，至殘冬已盡，尙未抵里，其舟中除夕憶李安人詩裏有

「客裏逢除夕，燈前少故人。」

之句，次年（戊申）正月抵里，在家中又盤桓了兩個多月，春暮又征塵僕僕重行入都了。

中郎抵京後，即授司功副郎，夏末又奉命爲陝西主考官，臨行送行者頗多，中郎有將赴秦中同志諸公於郭外作別得書字一詩：

「郭外園林盡不如，水亭香泛綠芙蕖。
門前且繫新驪馬，囊裏猶存舊蠹魚。
華嶽看雲唯自語，曲江題壁倩誰書。
憑君爲報關門尹，不是當時板屋車。」

這次的旅行，雖然負有王命，然而也算是給他一個機會來償一償他遊逛之債。我們知道吳越山水是以秀媚勝，中郎評之謂：「如少女時花，」可是秦豫的山水呢，眞是以瑰瑋勝，可以說如壯士老松，另有一番剛勁的風致。中郎本來是有山水癖的，可是這一去因官差在肩，雖然經過華山，但沒有遊逛的時間與情緒，所以總有幾分悵然。他的經太華一詩自註云：「以典試道華陰，不及登山，遂有此作。」

此詩之其二云：

「昔聞華山名，今見華山貌，何時陟微茫，遍償宿所好。手搴青芙蕖，玉女隔花笑。數盡仙掌文，喚醒希夷覺，少時耽子墨，頗識徐熙妙。幅絹對青山，臨崖親寫照。不取色態妍，唯求神骨肖。俗黛與凡霞，無非點幽皂。斷崖着孫登，虛空發清嘯。」

長安為漢唐建都之地，名勝古蹟，在在皆是，所以以詩人的中郎，跑到那兒，自然而然的要引他不少的傷今弔古之感。他去逛了逛驪山，而且到華清宮又浴了浴湯泉，長安附近的勝地他也可以說遊歷殆遍了。現在可以把他的秦中雜詠第二首寫在這兒，以見他此時詩歌內容之一班：

「弔古意不盡，披榛倚斷枝，道逢雪鬚叟，笑我眞情痴：爾從京師來，習見漢官儀，未央即宮闕，金馬即銅墀，團營即細柳，綺陌即莊逵。西山千萬髻，終南同崔巍。下有高梁河，即古曲江池，瑤台與金屋，所貯即妖姬。殘棺斷丘壟，即今金紫兒。辟彼晉燭光，前者已灰飛。舊火續新火，燄燄同一輝，若以天眼觀，青草生娥眉。飄風遇輕雲，無非哭荒碑。」

從長安歸來，眞是要過一過山水的癮了。首先要去的，自然是華山啦。據中郎他自己講，他在很小的時候，同小修讀王安道的華山記，當時心中對之就非常的傾慕，想着什麼時侯才可以作三峰之客

呢？後來他的父親同舅父從蒲坂回說：「登華山到青柯坪已經是很險峻了，過了這個地方就是昌黎的投書處。」他於是就同他的老弟（小修）私下的說道：「像近來的李于鱗這些老先生們，都會到那兒，臨過絕頂，難道說他們長的不是凡人的脚趾同膀臂嗎？」從此他心中更是時時迫切的在渴望着。後來他同陶周望逛了天目以後，同他談論到天下山水之勝，周望就說：「三峯最好了，這一輩子怎能夠去一下呢？」從這種情景看來，登華山的心，眞是早就有了。現在既然遊到了這個地方，自然不能夠失之交臂，所以雖以身體瘦弱，年已不惑的中郎，也仍舊要鼓起勇氣，以償素日的宿願。

這次同遊的有朱非二，同樗道人等，登山的時候，中郎怡然自樂，與朱非二談論山中的故事，好像都很不在乎似的，於是一會兒可把那險峻的地方度過了。到了絕頂，於是就同這一些同遊者席地而坐，等待明日的到臨。

因爲是深秋，一到山中，滿林紅葉，在夕陽欲墜，皓月將升的時候，襯着那青黛的峰巒，眞有那非着跡的文字所能描寫的雄壯與優美的景色。夜深了，月色益發皎潔，在貪着自然之美的中郎，自然是不能就枕，所以他就同樗道人在松影參差之下徘徊望月。這時萬籟俱寂，景色蕭索，不覺引起中郎的回憶來，想着伯修已去世十年，舅父惟長亦相繼仙逝，最近又接蘇潛夫信說石簣也物故了，往日遊侶，曾

幾何時，均次第零落，不覺爲之潸然！楞道人看他難過的樣子，知他是追念他的已逝的故人，於是就朗誦金剛六如偈，中郎也就着松樹隨聲附和。

遊了華山接着又遊嵩山，五嶽此次已遊其二，眞也是完了他一筆山債。這回的遊蹤，有華嵩遊草前者爲詩，後者爲記，這兩卷可以說是他這次典試秦中的成績。

從陝西歸來，恰好小修已早來京都，兄弟相會，自然歡喜不自勝，於是剛見面就談起登華山事，說得令他老弟也爲之悚然。同時又談些嵩山同百泉的風光，不過回來後，因爲關於考試還有許多要向朝廷呈報的事，所以也終天的忙碌。

過年的時候，中郎請小修到他那裏，年來兄弟飄泊，遇此佳節，自然要聚在一處。他們兄弟間的友愛，也眞可以說篤摯到極點了。

庚戌春，中郎同小修一行返里，取道河南，過鄭州，葉縣，南陽，後乘舟抵公安。這時地面已非太平景氣，時鬧土匪，中郎不得已移居沙市。中郎平生極愛樓居，於是就居所築捲雪樓，站在樓上遠眺，可以望見大江浩淼，圍繞几硯，遠山峰巒，青翠如畫。樓下挂有秦中石刻對聯一副，其文爲：

「長天放散千山月，遠水晴收萬里雲。」

係杜少陵筆，刻在案中一山中。在這樣的景色下，中郎有終老之意。同時因爲當時社會的局面漸形惡化，所以更使他非常的消極。於是他就打算在青溪紫蓋之間結廬隱居。而且對小修說道：「生死事大，四十年以前作今生事，四十年以後不妨作來生事，」言外大有出世之意。

入秋以後，中郎驟得大病，輾轉病榻，迄未痊愈。小修心中頗不安，後來請一大夫切脈，說沒什麼病，於是使他才稍放一點心。

八月二十二以後，中郎病日甚一日，因爲中郎病體虛弱，醫生命服補藥，但中郎係陽腸，不敢補，同時他又不敢服涼藥，因此簡直是無從下手。小修看中郎病不見輕，心中憂懼，又請了一位陳大夫，誰知還是說沒病，小修心中依然不釋。別人相信醫生的話，反笑小修未免太過於張皇了。過了幾天後，中郎病益發利害了，飲食漸少，大小便都下血，一直到九月初，仍不止，至初六日竟以夜間便血次數太多，遂不能支持而與人世長辭了。臨終，醫生命進人參湯，但中郎氣喘不止，只說「三分生，七分死。」說了又便，便後又說我略睡睡，不料這一睡，竟長眠而永不再起了。

懷着極端的悲哀的小修，只得勉強來料理中郎的喪事，但中郎囊中只剩五十金。清風兩袖，即連小修，也料不到他會一貧至此。

中郎死後，遺下了寡妻弱子，因爲家業的蕭條，都沈於困苦的境地裏。唉！這是所謂文人的下場。不過要按中郎的品性來說，那他最後之所以如此，也是必然的情況吧。



中郎一生中在文壇上的建樹，無須在此詳述。不過我們總觀他的作品，在他的短短四十三年的壽命中，而有此成績，已是足令我們驚服了。就詩文集來說，一共有八部之多。

一，敝篋集（爲諸生孝廉及初登第時作）
二，錦帆集（令吳門時作）
三，解脫集（以病辭吳令遊吳越諸山水時作）
四，廣陵集（去吳客眞州時作）
五，瓶花齋集（在京兆授爲太學博士補儀曹時作）
六，瀟碧堂集（請告歸臥柳浪湖時作）
七，破硯齋集（再補儀曹出使時作）
八，華嵩遊草（官銓部典試秦中往返之作）

除此以外，還有專著四部！

一，廣莊

二，德山暑譚

三，觴政

四，瓶史

此外有狂言一部，係偽作，我們無須置理。就前邊的四部來說，一二兩部全係發揮他的哲學見地的東西，至於後邊的兩部，一係談飲酒時的甲令，一係講究養花的技術的。實在三四這兩部也是很美妙的小品文。總之，以中郎所生的環境，而就其言論著述同行止去觀察之，則實係一代嶄然突起之詩人。他的散文是詩的，他的言論是詩的，而他的行止更是十足的詩的。曾記郁達夫批評曼殊大師有幾句話，就是：

「他的譯詩比他自作的詩好，他的詩比他的畫好，他的畫比他的小說好，他的浪漫氣質，由這一種浪漫氣質而來的行動，風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

我們自然不能把這話整個的轉送給中郎，但我們也可以說中郎的浪漫氣質，由這種浪漫氣質

而來的行動風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

平心而論，中郎的詩在當代總可以說是超越一代的，不過詩到了宋以後，眞已成爲強弩之末了，任是怎樣的天才，也難有超越往代的東西產生出來，所以中郎關於詩的作品自然也難逃出此種運數。不過我覺得中郎可以在明代文學史上屹然獨立的，除詩以外，當爲他的小品文。因爲小品文不但是開了晚明以後的文人從事於寫這種文字的風氣，而且也實有跨過古人而上的標格。目下在幾百年後的我們，來議論平生放蕩不羈，睥睨一世的中郎，眞不禁爲之悚然，假若中郎有知，不曉得他要怎樣笑我們爲多事呢！

——載師大月刊

二　袁中郎的思想（任維焜）

我們想認識一個人，最重要者在認識他的思想。同時我們對於一個作家，也一樣是如此。不過近來關於文學與思想的關係——問題鬧得個不可開交，有人主張拿文學去宣傳思想，有人主張文學同思想乃是二事，決不能拉在一起，現在我們站在這樣問題之前，給他一個很澈底的解決實在是很困難的；可是目下就我個人的鄙見來說，文學同思想是有關係的，不過我們應以文學爲主，而以思想爲僕。我們只能說某種文學裏邊含有某種思想，決不能說某種文學宣傳某種思想（固然也有特以宣傳某種思想而創作的作品，但此種文學決非我所說之文學。）我們既已明瞭了文學與思想的關係，那麽現在我們對於中郎的思想就不妨作一個概括的探討。

一個時代的思潮，同一個人思想的產生，決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們都有着他們所有的淵源，同不得不產生的必然原因。袁中郎思想的淵源，據鄙見所及，覺得異常複雜，但其大致情形則如下述：

A，時代思潮——明代中葉以後，陽明之學滿天下，中郎距陽明不過百年，在那種大氣的薰陶同

包圍之下，自然不能不受若干的影響，在他的答梅客生書中說：

「宋儒有腐學而無腐人，今代有腐人而無腐學。宋時講理學者多腐，而文章事功不腐，今代講文章事功者腐，而理學獨不腐。宋時君子腐小人不腐，今代君子小人多腐，故僕謂當代可掩前古者，惟陽明一派良知學問而已。」

這是中郎對於陽明學說心折的話。我們再看中郎的辯論學問有沒有同陽明的說法相似的地方，陽明在他的答友問中解釋「知行合一」道：

「知之眞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知之時其心不能眞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眞切篤實也。行之時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眞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眞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

我們看看中郎的話：

「來書云，實實有佛，實實有道，實實要學，甚妙甚妙！僕謂官與冶客即佛位也。故曰實實有佛。解作客作官即佛道也，故曰實實有道。然官之理無盡，冶客蕩子之理亦無盡，格套可厭，氣習難除，非眞正英雄不能于此出手，所謂日日新又日新者也。豈鹵莽滅裂之夫，所能承當者哉？故曰實實

要學。如此註釋，不知可當溫陵長水不？」

與梅客生書

中郎一生的言行，可以說完全是相符的，這是無疑的在受着陽明知行合一的影響。

B.佛——佛自唐以後，幾乎沒有一個儒者不受牠的影響，有時儘管是罵儘管是排斥，然而自己骨子裏還不免有佛的影子。到了宋代的儒者，與佛發生關係，不算什麼一回事。到了明代更甚，幾乎士大夫階級沒有不與佛門中人有來往的，中郎呢，與佛的關係，可以從幾點來說：

(一)禪宗——中郎在他的給張幼于書中說：

「他書無論，即如敝篋諸誦，幼于能一一解得不？如何是下三點？如何是扇子跳跨上三十三天？如何是一口吸盡西江水？幼于雖通身是口，到此只恐亡鋒結舌去，然則幼于尚不得謂之解語矣。況其不逮幼于者乎？僕自知詩文一字不通，惟禪宗一事不敢多讓。當今勍敵，惟李宏甫先生一人，其他精鍊衲子，久參禪伯，敗於中郎之手者，往往而是，幼于不學禪，安得攙入其中，與虛幻荒唐之人交鋒比勢哉？」

從這兒足見中郎對於禪宗很能得其三昧，

(二)友人——我們從他的師友中可見到他的禪友有十三人之多，固然有的沒多大關係，但像無念可以說是深交，其餘非僧人而也是他的禪友的如陶石簣丘長孺之流都是。

(三)佛戒——遵守佛戒，曾一度斷葷者凡三年。小修的遊居柿錄中關於此事的記載者頗詳：

「記余曾持五戒三年矣，原非發心持戒，因中郎倡而和之耳。後中郎三年後開肉，余亦隨之食肉。是年余病目，醫者禁食豆腐，齋人除此無可食，止喫白飯，飲食日減，體漸羸瘦，邑中戒肉人如壽亭舅及王官谷皆逝。醫者云『香油生火，脾無肉食不能將養，以至於病。』大人聞之，懼甚，謂余兩人曰『汝兄已亡，倘須汝等取功名以大吾門，若俱趨寂寞，我老何所望？且眼見持齋者俱先後入鬼錄，雖有定命，然以膏粱之人一旦蔬食，脾與之不習，不能滋潤，因而致病，容或有之，俟老人百年後任汝輩為之。』中郎與余泣而後肉。」

中郎亦有詩記載此事，今不具錄。

(四)著作——有宗鏡攝錄德山暑譚等。

O.道——中郎所受道家的影響很顯明的是對於宇宙萬物，都拿着「自然」二字去觀察去解

釋。同時他的疏狂他的放浪，都是受着道家的啟示。他的老師李卓吾可以說是對於道家的哲學很有研究的人。至中郎關於這一方面的著作，則有廣莊七篇現在我把他對於老子的稱讚同對於忘我出世住世的解釋，略述如次：

(一)贊老子——在人間世一篇中道：

「龍能為鯉，為鯨，為蛟，故江淮河瀆諸大水族，龍未常不相噓相沫也。龍之為龍，一神至此哉！是以先聖之演易，首以龍德配大人，周易處人間世之第一書也。仲尼見老子，贊以『猶龍，』老子處人間世之第一人也。」

這是說老子可以作為我們處「人間世」的一個頂好的模範。

(二)忘我與出世住世——在他的人間世中又道：

「天下之患莫大於見長於人而據我於扃。我之為我，其伏甚細，其害甚大。聰明，我之伏於衆根者也，道理，我之伏於見聞者也，知解見覺，我之伏於識種者也。古之聖人能出世者方能住世。『我』見不盡，而欲住世，譬有人自縛其手，欲解彼縛，終不能得。堯無我，故能因四岳，禹無我，故能因江河，太伯無我故能因夷狄，迦文無我故能因人天，三乘菩薩諸根。是故龍逢見戮，比干剖心，伍

胥乘潮，靈均自沈者，事君之我未盡也。……孔畏於匡，伐木於宋，絕糧於陳者，行道之我未盡也。孔子自言六十而耳順，是六十而我見方盡，盡明矣。我見不盡，戮身之患且不保，何況治世。」所以能忘我才能出世，眞能出世，才能住世。世人間的不幸，都是「我」字未忘，所以才處處遭妒忌，處處碰釘子，處處受打擊，若能把我忘掉而視自己爲宇宙間之一生物，這樣自然不致遭禍。這是近於道家的哲學，老子所謂「貴柔」「貴下」「貴雌」「貴黑」這也是忘我後自然而然可以達到的境地。

D.楊朱——「楊朱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一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中郎在某一方面也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他雖然倡老子忘我之說，但忘我而實際乃是眞正的爲我，中郎他一生中的事跡，即可作爲他受楊朱思想影響的明證。

以上說明中郎的思想與明代的理學以及佛道楊朱各派思想的關係，同時所以使他走到這一途的原因，一方面固然這些雜亂的相反的思想的混合是由來已久的了。但另一方面則當時的時代背景確是使他走到這道路上的一個最大原動力。明代到了萬曆年間，國運已經看着有些衰頹的樣子，不是今年鬧水災，就是明年鬧旱災，因之土匪也就漸漸的多了起來。中郎的老家公安，有時也鬧得

一團糟，他們從山東往京去的路上也有土匪，已漸漸趨於民不聊生的境地裏。於是一般明達之士，看出國勢漸危，而自己又不是朝廷中的要人，眼看沒有辦法，所以只有放浪自適逃到佛道的國境內，以清淨閒適避去那些紛紜不安的社會。謂余不信，請看中郎題靈公集諸公以城市山林爲韻的一詩吧：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聽新朝事。
邸紙束作一篋灰，朝衣典與栽花市。
新詩日日千萬言，詩中無一憂民字。
旁人道我眞聵聵，口不能言指山翠。
自從老杜得詩名，憂君憂國成兒戲。
言旣無庸嘿不可，阮家那得不沈醉。」

「眼底濃濃一杯酒，慟於洛陽年少淚。」旣然知道說話是沒有用處的，但又不甘緘默，這些心中的悲愁，只有用酒來澆了。從悲觀而頹廢，這是古來不得志的名士們大致的情況。旁人以爲這些放浪自適者是昏聵之徒，而不知他們的心中比着那些整天嘴裏喊着憂國憂民的人們，還苦痛呢。周豈明

先生說得好；

「而現在中國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樣子，手挈不動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難到藝術世界裏去這原是無足怪的。」

燕知草跋

這也可以作爲我們前邊立論的解說。

中郎的思想雖然雜有儒，佛，道，楊朱，這幾派思想的成分，但是他不僅不受他們的束縛，而且能超出在他們以外而批評之，擇善而從，不善則捨，終於合諸家思想於一爐，而鎔鑄成他自己的中心思想。

他給袁無涯的信中說道；

「僕碌碌凡材耳，嗜楊之髓，而竊佛之膚，噉莊之膚，而鑿儒之目，醜閒居之小人，而併疑今之名高者以爲狗外不情，師並生並育之齊氏，而甘同其事。」

這是很能自見的議論。現在既然曉得他的思想的源淵了，那么不妨看他的宇宙觀同人生觀是什麼樣子。

A，宇宙觀——中郎的宇宙觀我們可以從他廣莊中見到一二，逍遙遊中云；

「聖人知一己之情量決不足以窮天地也，是故於一切物無巨細見，於古今世無延促見，於衆生相無彼我見，殤可壽，巨可細，短可長，我可彼，智可蒙。」

這純然是道家思想，就是天地間的一切都不是人力所能強爲分別的，牠們是都有着自然之理，在支配着呢。他又在齊物論中云：

「故聖人不見天高地下，亦不言天卑地高，波平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故聖人不見萬物非我，亦不言萬物是我，我物本自齊，若有可齊，終非齊物。」

這還是說明宇宙間的一切沒有什麽眞高下，眞是非，眞彼我，換言之就是沒有什麽眞標準。所以萬物都是順着自然之理而生存着，人既然是萬物之一，可以根本不應當去較量彼我同是非，更不應持尊卑高下的定見。所以這完全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哲學。

B. 人生觀——他對於宇宙萬物的見地既然主張一循於自然之法則，那麼他的人生觀自然也就可以推測個差不多了，他在養生主中說道：

「養生之道，與世偕來，不待知而知者也。聖人之於生也，無安排，無去取，無僥幸，任王而行，修身以俟，順生之自然，而不與造化者忤。是故其下無傷生損性之事，而其上不肯爲益生葆命之

行。」

所以順生之自然，而不與造化者忤，這是他處世的眞實態度。他又給他的朋友徐漢明書中云：

「弟觀世間學道有三種人，有出世，有諸世，有適世。出世者達磨馬祖臨濟德山之屬是也，其人一瞻一視，皆具鋒刃，以慈悲之心，而行狠毒之事。苦海舟航，要無出此，非眞正大丈夫不能於此出手，已矣不可復得矣！諸世者河南一派，立定脚跟，講道德仁義者皆是，其學問甚切近人情，但粘滯處多不能迴脫蹊徑之外，所以約世有餘，超乘不足。適世者柳下子犂列禦寇阮籍之徒是也。以爲禪，戒行不足，以爲儒，口不道堯舜周公之學，身不行是非辭讓之事，於業不擅一行，于世不擔一務，最天下不緊要人，雖于世無所忤，然賢人君子，則斥之惟恐不遠矣。弟最喜此一種，以爲自適之極，心竊慕之。除此之外，有種浮泛不切，依憑古人之式樣，取潤聖賢之餘沫，妄自尊大，欺己欺人，弟以爲此乃孔門之優孟，衣冠之盜賊，後世有逃焉，吾弗爲之矣。」

這可以說是他眞正人生觀的解說。我們看他的著作沒有藏傳之心，處世但求己心之所好，遨遊山水，縱談禪理，不完全是一種適世的態度嗎？總之中郎的思想，是儒佛道三家思想的結晶。他的倫理觀念，孝弟忠信，是儒家的，他的恬淡心懷，敝屣榮利，遁世逃名，是佛家的，反抗虛僞之腐儒，及行爲放浪，

惟性之適是從，乃是道家的總合起來說，他是一個極高明的爲我主義者，乃是屬於楊朱的，所以想眞正瞭解中郞，非夷攷其思想之源淵不可，不然是不能瞭解他的。

最後我們還應注意，乃是中郞的思想，對於他的作品的影響。具有上邊思想的中郞，才有反抗王李的中郞，有了反抗王李的中郞，才會有寫出那種自然流露而無絲毫扭揑的詩文的中郞。所以思想對於創作的關係，有時確是不可忽視的。我記得前年我在新晨副刊上發表的一篇我所見的魯迅與豈明兩先生裏邊有這樣的話：

「但我們要知道寫清淡的小品文是得有相當修養的，決非隨隨便便就可以寫到好上的。我們看六朝唐宋明清的小品文的作家，不是帶幾分避世的態度的隱者就是染幾分弁髦禮敎反抗因襲的習氣的名士。倘若不能夠看穿一切，心境上不能恬淡閒適的話，恐怕作文也很難以達到清淡的地步吧。」

現在想到中郞的思想同他的詩文的關係，覺得兩年前的話，還依然有幾分道理。中郞要不抱着返回自然的精神，他決不以逛遊湖山作爲正事，假若他不遨遊湖山，他的心境自然也不會同澄澈得像不波而平的水一樣，而那些美麗飄逸的詩文，恐怕根本不會產生出來。卽令產生得出，恐怕也不會

如此的優美吧。

——載師大月刊

三　袁中郎的詩文觀（劉大杰）

在明代二百幾十年中間，除掉小說戲曲不要說，如果只講一向被人稱爲正統文學的古文詩詞，大半是籠罩在摸擬的復古的空氣裏。明初的文士，如劉基，高啓，宋濂，方孝孺之流，雖不能算什麼大家，然尙能獨自創作，不致於完全依傍古人，在他們的作品裏，多少還保存一點豪放勁健的風格。從永樂至成化的那幾十年間；是明代政治上的黃金時代，在那種國富民安的社會環境裏，自然會產生出一種雍容華貴歌功誦德的文學來。當時稱爲太平詩人的楊士奇，楊榮，楊溥三元老的臺閣體，便是這幾十年的文學的好代表。

這種表面好看內容空洞的作品，繼續了幾十年，凡是稍稍有一點頭腦的文學靑年，自然是不會滿意的。到了弘正年間，對於當日的文壇，持了革命的旗幟的，是李夢陽何景明這般人的復古運動。他們這種革命的思潮是可貴的，但是他們的主義是錯誤的，他們的主義，是摸擬主義，他們的口號，是『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李夢陽說：『今人摹臨古帖，不嫌大似，詩文何獨不然。』這種標語一出來，於是一般文人，都從這一條路上走。產生的作品，都是一些艱深的點不斷句的古文，一些雕琢的堆積的似

某非某的詩。而他們却自鳴得意，號召天下，自以爲他們的作品，遠在元白歐蘇之上了。到了嘉靖年間，李攀龍，王世貞們出來，這種風氣更厲害，作詩作文，完全是摸擬剽竊，『金樽明月，陽春白雪』這類的字眼，到處都是。作者的個性思想和情感，一點也不能表現出來，文章的內容與情韻，一點也不能顧到。於是文壇更銷沉，更墮落，更沒有生氣。這種摸擬的古典主義，在明代的文壇，佔了長期的正統地位。

『盛極必衰，窮極必變，』這是政治運動和文學運動上必然的結果。到了嘉靖末年，李王的擬古文學，雖說是盛極一時，但是一些有頭腦的文人，如王愼中，唐順之，歸有光，徐文長輩，已經在那裏做新文學的工作了。不過，這些人只暗暗地在新文學的創作上努力，沒有正式站出來，同當日的舊文壇宣戰。一方面努力新文學的創作，同時又鼓吹新文學的理論，正式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向摸擬的古典主義，加以激烈的攻擊，創造新的浪漫文學的人，是公安派領袖袁宏道。

袁宏道湖北公安人，字中郎，號石公。他哥哥宗道，弟弟中道，都是那時的文學家。中郎十五六歲的時候，便做得出很好的文章。萬曆二十年，考取了進士，不久，做了蘇州的縣官。他雖是一個風流瀟洒的名士，却又是一個敏斷淸廉的縣官。他在蘇州一年多，將那地方的政治經濟，都弄得有頭有緒，革除了多多少少的積弊。那地方的民衆，都讚美這位名士縣長的功德。

中郎是一個追求精神自由的人，在家庭裏需要男性的自由，不要老婆來束縛他，作詩作文，需要性靈的自由，不要那種規律格套來限制他，在衙門裏需要個人的自由，不要那種法令儀節來拘束他。因此，他在蘇州做了一年多官，精神上感到極大的痛苦。他時時刻刻想辭官不做，想到山林裏去，追求他那種精神自由的理想生活。在他當日寫給上司親戚朋友們的信裏，很深沉地表示他的官吏生活的苦痛。他有一封寄給他舅舅龔惟長先生的信，說得最沉痛，最眞實。

『無官一身輕，斯語誠然。甥自領吳令來，如披千重鐵甲，不知縣官之束縛人，何以如此？不離煩惱，而證解脫，此乃古先生誑語。甥宦味眞覺無十分之一，人生幾日耳，而以沒來由之苦，易吾無窮之樂哉？計欲來歲乞休，割斷藕絲，作世間大自在人。無論知縣不作，即教官亦不願作矣。實境實情，奪人前何敢以套語相誑。眞是煩苦無聊，覺烏紗可厭之甚，不得不從此一途耳。不知尊何以救我？』

後來，他費了無窮的氣力，辭去了縣官，同幾位詩酒朋友，到浙江去遊山玩水去了。『自由自在』是中郎個人生活的理想同時也是他創作生活的理想。他看見當日的文人壓制着自己的情感和個性，遵守古人的法則，摸擬古人的字句，用自己的筆，寫古人的文章，結果是千篇一律，毫無生氣。這樣的

詩文，中郎自然是看不慣，因此，他對於當日的文壇，提出嚴重的抗議了。

『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於秦漢，詩則必欲準於盛唐，剿襲摸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爲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敘小修詩。

他這種論調，在王李壟斷的當日文壇，是極其激烈，極其大膽的。他當日好像是犯了衆怒的樣子，所以古典派的文人們，大罵他們爲『野狐外道』了。然而中郎是不承認的。他寫給張幼于的信裏，對於摸擬的復古派，是更激烈的更憤慨的加以攻擊了。他說：

『世人喜唐，僕則曰唐無詩；世人喜秦漢，僕則曰秦漢無文。世人卑宋黜元，僕則曰詩文在宋元諸大家。昔老子欲死聖人，莊生譏毀孔子，然至今其書不廢。荀卿言性惡，亦得與孟子同傳。何則？見從己出，不曾依傍古人，所以他頂天立地。今人雖譏訕得，却是廢他不得。不然，糞裏嚼查，順口接屁，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見成字眼，亦曰

騷人。計騙杜工部，囤紮李空同。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在而不詩哉？不肖惡之深，所以立言，亦自矯枉之過……」

中郎因為看見當日那般詩人口口聲聲是秦漢，是盛唐，所以他氣憤地過激地說秦漢無文，盛唐無詩了。所謂「糞裏嚼查順口接屁」這八個字，總算把當日那些摸擬派的文章，罵得又是淋漓又是痛快。他一面用激烈的文章攻擊當時的文壇，一面又建設新文學的理論。他主張的新文學，便是與古典派對立的浪漫派文學。他在文學上的主張，有四個要點：

一　反對摸擬

二　不拘格套

三　重性靈

四　重內容

關於反對摸擬的文章，在他的著作裏，真是觸目皆是，上面寫過幾段，現在再看他在雪濤閣集序裏說；

「近代文人，始為復古之説以勝之。夫復古是已，然至以勦襲為復古，句比摸擬，務為牽合，棄目前

之景，摭腐濫之辭。有才者詘於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智者牽於智，而愚者樂其易。一唱億和，優人騶從，共談雅道，吁！詩至此抑可羞哉！

第二便是不拘格套。所謂格套，便是那種古詩文中的繁細的規律和格調。這種規律和格調，是當代復古派文人們所奉爲金科玉律的東西。他們情願犧牲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去牽就那種死板板的規律和格調。中郎受不住這種束縛，他要信口信手地寫文章，要獨抒己見地作詩。他寧願俚俗，寧願詼諧，他不願遵守衆人遵守的格套，來壓害他心靈中那種活潑潑的文學的情感。他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寫什麼，就寫什麼，他在創作生活與個人生活上，都是要求自由自在，都是要求灑脫。他寫給馮琢菴老師的信裏說：

『宏實不才，無能供役作者。獨謬謂古人詩文各出己見，決不肯從人脚跟轉。以故寧今寧俗，不肯拾人一字。』

「寧今寧俗，不肯拾人一字，」這是中郎創作時候的態度，也是中郎詩文高人一等的地方。在敍梅子馬王程稿一文裏有幾句話說得更明顯：

『詩道之穢，未有如今日者。其高者爲格套所縛，如殺翮之鳥，欲飛不得。而其卑者，剽竊影響，若老

嫗之傅粉，其能獨抒己見，信心而言，寄口於腕者，余所見蓋無幾也。」

創作詩文，一為格套所拘束，便如殺翮之鳥，欲飛不得，所謂作者的情感和思想，便不能自由地表現出來了。中郎這一個人，本來就像一匹野馬，一隻老鷹，他是要在海濶天空的環境裏，自由自在地飛翔的。他怎能容許那種死板板的規律，來限制他的天才呢？他對於他朋友江進之的詩推崇備至。他批評說：「進之才高識遠，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與其所不敢言者，」所謂「信腕信口，皆成律度，」便是不拘守古人的成法，而能獨出心裁，自成格調。

第三是重性靈，這一點，可以說是中郎文學的精髓。性靈便是今人所說的情感和情趣，在當日復古派的詩文裏，性靈這東西是掩藏得乾乾淨淨的，文學沒有性靈，文學便是死的，譬如人沒有靈魂，人也是死的一樣。所以中郎對於這一點特別重視，江進之在敝篋集的序文裏，述中郎對於性靈與文學的意見，說得很透徹。

「詩何必唐，又何必初與盛。要以出自性靈者為眞詩耳。夫性靈竅於心，寓於境，境所偶觸，心能攝之，心所欲吐，腕能運之。心能攝境，即螻螘蜂蠆，皆足寄興，不必雎鳩騶虞矣。腕能運心，即諧詞謔語，皆足觀感，不必法言莊什矣。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是之謂眞詩。……蓋新者

見嗜，舊者見厭，物之恆理，唯詩亦然。新則人爭嗜之，舊則人爭厭之。出自性靈者，不期新而新，出自摸擬者，力求脫舊而轉得舊。由是以觀，詩期自性靈出耳，又何必唐，何必初唐，何必初與盛之爲沾沾哉。……』

在尺牘和序文裏，他還發表了許多這種類似的意見，現在也可以不必多抄了。中郎的作品，最充分地表現他這種性靈的特質的，是他的詩，尺牘和遊記。現在先看他的詩：

一　途中口占

『文字讀未倦，心情放去閑。夢回無一事，只有看西山。』

二　丁酉初度

『天涯隨處是生緣，闊帽寬衫似老年。算馬與人三十口，賣奴及宅五千錢。一心槁木寒灰去，幾度抛書抱枕眠。古佛閣前溫坑裏，拽將紅袖夜談禪。』

再看他的尺牘：

與謝在杭

『今春謝胖來，念仁兄不置。胖落寞甚，而酒肉量不減。持數刺謁貴人，皆不納，此時想已南。仁兄近

況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誦，何久不見還也？弟山中差樂，今不得已，亦當出，不知佳晤何時？葡萄社光景，便已八年，歡場數人，如雲逐海風，倏爾天末，亦有化為異物者，可感也。」

再看他的遊記：

百花洲

「百花洲在胥盤二門之間，余一夕從盤門出，道逢江進之，問「百花洲花盛開否？盍往觀之？」余曰「無他物，惟有二三十糞艘，鱗次綺錯，氤氳數里而已矣。」進之大笑而別。」

像這樣的詩文，都是性靈文學最好的代表，在當日復古派的作品中，我們是不會看得見的。清新秀麗，情趣極高，眞有「信手寫來，拈花微笑」之概。

第四，是重內容。當日的文人，只是摸擬剽竊，產生的作品，幾乎全是塗脂抹粉，華而不實的東西。中郎看了這種毛病，知道要補救他，必得要注重文學的內容。他在行素園存稿引裏發揮這樣的意見。他說：

「物之傳者必以質，文之不傳，非曰不工，質不至也。樹之不實，非無花葉也，人之不澤，非無膚髮也，文章亦爾。行世者必眞，悅俗者必媚，眞久必見，媚久必厭，自然之理也。……夫質猶面也，以為不

華而稱之朱粉，妍者必減，媸者必增也。噫，今之文不傳矣。嘉隆以來，所謂名公哲匠者，余皆誦其詩讀其書而未有深好也。古者如贋，才者如莽，奇者如吃，摸擬之所至，亦各自以爲極，而求之質無有也。……」

他這裏所說的質，便是一種眞實的內容。沒有眞實內容的文學，便是不結果子的花木，胸無點墨的小白臉，塗脂抹粉的娼妓，這樣的作品，是沒有價值，沒有永久性的。要使文學有價值有永久性，必得要注重文學的質。

中郎這種新的文學理論，和他的新創作，在當日的文壇，捲起了大大的波浪，顯然地同模擬的古典派，成了對立的形勢。這種文學的思潮，漸漸地開展下去，許多有頭腦的文學青年，都起來響應，還有他的兄弟朋友們，如袁宗道，袁中道，江進之，曾退如，丘長孺，屠長卿，王伯穀，陶石簣這般人，一齊站了起來，你呼我應，聲勢更加浩大起來，於是模擬的古典派，漸漸地失了勢，明代的文學，到此就起了一個大大的變動。當時中郎的詩文，另成了一個體裁，一般青年文士，都受了他的影響，跟着他走這條新路。因爲他是湖北公安人，所以後人稱他爲公安派。後來由鍾伯敬譚元春代表的竟陵派，也是承繼這個潮流的，不過創作的態度上，稍稍有點不同罷了。他們這種勢力，佔有了明代末年的文壇，一直繼續到淸

朝的康熙年代乾隆時候，復古派的道學先生得了勢，把公安竟陵派的文學，看作是洪水猛獸，加以種種的廹害，結果中郎們的作品，都列爲禁書了。

清朝人對於中郎作品的批評，大半是說他俚俗詼諧，說他學問的根底不深。這實在是錯誤的。俚俗詼諧，便是中郎文學的特色，他的詩文平淺易解，並不能說他的學力淺。如果多用些典故，多用些艱難的字句，便能表示一個人的學力深厚，那末表現性靈的文學作品，變成了咬文嚼字的毫無意義的東西了。但是清朝的道學先生，偏歡喜那種咬文嚼字的東西，所以中郎的作品，全遭了列爲禁書的厄運。

不用說，把中郎的作品與文學理論，搬到現在的中國來，自然是舊貨了。貨色雖是舊，但是他那種文學革命的精神，還是新的。他這種精神，埋沒了兩百多年，多多少少作中國文學史的人，都忽略了這個運動。我們覺得在這個把中國古代文學重行估價的今日，應該使他的精神復活，應該使他在文學史上，得一個他應得的地位。

——自時代版袁中郎全集

附：袁中郎的詩（任維焜）

在前面，我們可以很淸處的看到中郎——在明朝晚葉的文壇上所處的環境是個什麼樣子，同時又可以很明白的看到他是對於當時的文壇上的風尙加以如何的排擊，而且他的個人主張又是很瞭然的宣布了出來，那麼現在我們開始談到他的詩的內容同外形，我想閱者一定很容易的可以推測出一個大致的情形吧。

因爲前邊已說的很詳細了，所以在這裏不再嚕囌，乾脆的開門見山來談他的詩吧。——中郎的詩，我們就時間來說，可以把牠分成早年，中年，晚年三個階段，就體裁來說，大致不外樂府同五七言，現在就依次綫述之。

在文學原理上有一個鐵一般的規律，爲所有文人所不能逃避的，就是作品在早年的時候綺麗，壯年的時候奔放，晚年的時候淸淡。——中郎的作品雖然不能十二分的顯明的可以劃出這三個時期，但我們就以這個繩墨來量牠也是差不了多少的。本來是無足怪的，早年的時候多半是沒有歷盡人間的風波，所有的作品可以說是「爲賦新詩強說愁」，反正是偏於幻想，惟其偏於幻想，所以才華要綺麗。

中年的時候漸漸踏進了人生的道上，不過雖然是「不如意事常八九」然而壯心未死，自然作品中表現出不得志而蓄蘊在胸中積鬱不平之氣，那麼在風格上也就不自覺的表現出奔放恣肆的色調。到了晚年，是萬事已矣，前途是絕望了，只有抓着現實，追憶已往，同時理智超越了感覺，或者走入達觀，或者走入頹廢，寫成的作品自然是以瀟洒清淡局外觀物的為多。中郎的生活，在早年是很平直的，不過他的才氣很高，在十五六歲時就創立詩社，與友朋互相倡和，當時他的創作態度，從他的示社友一詩中可以看到：

「所至成三笑，居然似七賢，社開正始後，詩數中興年。一代稱同軌，千秋欣執鞭，古來藏二酉，不必大都傳。」

卽隨與作去，傳與不傳沒有什麼關係。他的早年的詩集傳流到現在的，有敝篋集一部，他的朋友江進之序當時刻這部詩集的動機道：

「君丱角時已能詩，下筆數百言，無不肖唐，君乃自嗤曰：『奈何不自為詩，而唐之為！』故居恒所題詠，輒廢置不錄，及其令吳二年，移病乞歸，友人方子公為檢其圖書付行李，從敝篋中得若詩一編，讀而旨於口曰：『有物若是，而以供蠹魚，其不盡充蠹魚腹也，其猶有物護之歟？』於是稍

稍裒次，付諸梓，題曰敝篋集」

在這一段文章裏邊，値得令我們特別注意的，即『下筆數百言，無不肖唐，』可見中郎早年也是隨着當時的風氣走的，到了以後才是有意的自覺的來反對當時的潮流，而自己獨闢蹊徑，在這個集子裏邊，確是有許多帶唐人氣味的，其綺麗如古荊篇裏邊寫的完全是繁華遊冶的生活，如：

「……東城絲管接西城，相府豪華壓朱邸，俠客飛鷹古道旁，佳人賣笑垂楊裏。垂楊二月隱朱樓，豪家宴喜樓上頭，碁鳥喧闐朝送酒，管絃嘈雜夜藏鉤。繁絃急管夜初闌，惜花少女怨春殘，桃花瀲瀲歌成血，蘭炷漫漫火送寒，曉風楊柳菖蒲浦，秋月梧桐金井欄。秋夜春花無斷絕，門前郁李九迴折，願作陽台雨後雲，誰憐洛水風中雪。」

其餘的如江上青樓曲均屬此類：

江上

「桃花春水滿江頭，獨擁佳人翡翠樓。
誰抱琵琶江口上，聲聲彈出小梁州。

其二

二月山花接郡城，絳桃垂柳獨分明。
請看高塚宮人草，別作青春一段情。」

青樓曲

「懶看梧葉下空堂，秋日秋風淚幾行。
獨夜香塵緘遠字，經年鸞匣綏離妝。
蘭拔別恨瀟湘浦，柳葉愁烟漢水旁。
折盡庭花人不見，枉教蟢子望流黃。」

此外還有寫景如畫的也可以引幾首：

江行

「霞彩收晴色，澄波媚夕暉，饑鷹奔樹冷，沙鳥觸人飛。
塾叟迎兒出，鄉童負犬歸，少年饒酒力，何事怯寒威。」

江上送別

「颯颯征鴻帶雨飛，孤帆無計駐征騑。

西風蘭杜香流水，落日雲霞浣客衣。
野店無人花自發，秋江有路夢先歸。
年來贈別傷同調，郢曲如君和者稀。」

出郭

「稻熟村村酒，魚肥處處家。輕刀粘去水，獨鳥會風斜。
落水流紅浪，長江徙白沙。山僧迎客喜，顛倒着袈裟。」

中郎早年的詩無論如何還脫不了前人的故套，到了他作吳令以後，（二八）才眞正對文壇上大家所捧的偶像王李一流的人物正式宣戰了。（見敍小修詩集）同時他的作品才完全脫去他的魔障，而自樹旗幟，從以往的飄浮而漸趨帖實，從以往的勉強而漸趨自然，從以往的綺麗而漸趨平淡。很明白的走到了作詩如說話的地步。在中郎中年的詩集有錦帆集，解脫集，廣陵集，瓶花齋集，這幾部都是他三十前後的作品，在這裏邊閒居時寫的固然很多，但遊歷時寫的也要占大部分。即如解脫集裏邊的詩，幾盡爲寫景的篇什，現在可以從這兩種裏邊抄出幾首來。

荒園獨步

「寒食春猶爛，東風草自芊。花燃無烟火，柳吐不織綿。
宦博人間累，貧遭妻子憐。微官如可典，乞我買山錢。」

右見錦帆集

紀宦

「薄宦經年許，心情好欲傭。詩書攻俗諱，耳目信塵封。
生女從呼囡，學音漸是儂。介吳何所有，震澤兩高峰。」

偶成

「世事憐貧餌，同郡恠獨翔，攤書時引夢，臨水或思鄉。
兄弟皆年小，山林之日長。行藏細檢點，多半是襄陽。」

二

「羈客胸懷少，天涯侶伴稀，閒須愁獨立，終是念歸飛。
雲來吹水葉，湖去落沙衣。酷意湘江上，梅花伴釣磯。」

右見解脫集

飯王太古館中

「萬事無如靜，浮雲他自飛。身心全白業，行止半緇衣。
山樂和霜薦，園翁帶雪饑。忘名兼去欲，學道古人稀。」

右見廣陵集

即事和韻

「柳下何曾耐小官，青氈綠箭且偷安。
空窗淨閣銷塵眼，時草新花養病肝。
廟市客來尋古字，糧船僧至餉吳酸。
淄函怪牒閒搜取，鈔得仙方寄所歡。」

右見瓶花齋集

至紀遊的作品，眞是美不勝收，因爲他性愛山水，一生的時光幾乎全在泉石上消磨過去了。最初在吳縣作縣令，不久就辭職了，從此遨遊四海，於是詩文全從這遊覽的期限中產生了出來。篇篇烟霞，句句澗泉，眞是滿目琳瑯，現在聊引一二以見一班：

嘉興道中

「彌野桑成市，排溪柳作衙。菜香齊吐甲，樹暖欲蒸花。
天色滑如卵，江容潤似沙，酒帘青帶日，三五聚郵家。」

踏堤曲

二

「畫閣層層出曉波，東風湖面軟於羅。
佳人穠李山花髻，蕩子垂楊水調歌。
蝴蝶意閒隨夢去，鴛鴦情熱奈春何。
蘇公雅亦稱相識，浪比西施媿已多。」

五

「亭亭如月婉如春，堤上樓邊總麗人。
柳枝染將袍色嫩，梨花吹落粉痕新。
石橋碧草千回坐，霧靨風紋幾簇塵。」

宋玉也知空作賦，越姬十倍勝東鄰。」

湖上

「流鶯舌倦語初歇，畫櫓徵點梨花雪。
茶葉白抽四五旗，竹孫斑裹兩三節。
芳草如綿陷歸輪，霧骨雲魂冷蒼蔑。
落紅雨過更愁人，六橋十里猩猩血。」

靈隱路上

「柳光吹綠焰，溪雨作紅煙。花氣蒸雲熟，石紋帶乳鮮。
聞香知草性，隨例與茶錢。淡冶應無比，幽奇亦可憐。」

攝山紀遊遊者爲無念潘髯丘大袁大蘊璞袁三潘四及兩吳歇

「黃葉旋空下，清泉作雨飛。苔毛青佛面，石色老天衣。
僧靜廚蔬少，山寒野雀稀。自然消萬慮，不是學忘機。」

其二

「山色重重怪高譚事事新。荒松吹老鬣，古石長斑鱗。入室尋僧夢，談經悟客塵。禪兄兼酒弟，傲殺世間人。」

右見廣陵集

月夜登良鄉塔岡與子公諸友作別

「秋山瀲瀲滴青霧，城外人家城裏樹。白埃一道衝紅塵，正是馬蹄離別處。荒垣殘葉幾家邨，千匡洗盡月波痕。鄉關十路九貂虎，未知托鉢向何門。鷁禽一羽分煙去，雲樹沈沈安可論。」

右見瓶花齋集

在這個期內還有作的樂府多首較諸早年的已大異其趣了。

橫塘渡

「横塘渡，臨水步，郎西來，妾東去，妾非倡家人，紅樓大姓婦，吹花誤唾郎，感郎千金顧。妾家住虹橋，朱門十里路，認取辛夷花，莫過楊柳樹。」

已盡纏綿温婉之極致了。

最後談到中郎的後期作品了，可惜的是中郎沒享高壽，年僅四十三，就長辭人世了。按一般的情形說，他四十歲前後的作品也可以列到中年期，不過因爲他死得太早，那麼我們不得不把他的三十歲以後的列爲晚年的作品了。

中郎自從萬曆庚子年（三三）返里後，即臥居柳浪者凡六載，在這個時期，他的作品統統都收在瀟碧堂集中，後來又到京師補儀曹出使陝西，有破硯齋集之作，現在就他這兩部集中的詩來論牠一下。

中郎的詩到晚年眞是漸趨成熟，一篇篇，一句句，都是脫口而出，無絲毫矯揉造作的痕跡。本來中郎很早就學逃禪，立意忘懷功名，打算把身心都付於自然陶醉上面，從都中歸來，滯留故鄉，住在那煙雨迷離，柳綠染波的柳浪湖上，朝夕與野客山僧相晤談，沒事的時候去逛逛外邊的山川，胸中眞是毫無纖塵，所以作品出來自然是恬淡輕清，完全是性靈的流露。有看梅二首可以作他此時期心情的寫

眞。

「莫將香色論梅花，毛女而今已出家。

老幹瘦枝蒼几許，總無花萼也輸他。」

二

「自剝青苔自掃塵，儼經洗耬對幽人。

不須更畫摩詰，恰有梅花爲傳神。」

中郎以隱者自居，嘗企慕陶潛與林逋。在他這晚年的作品中，可以說大半是田園風景同他自己恬淡生活的描寫，那種自然的風韵，眞不亞於徵士同處士。現在姑且依類舉出幾首作爲此時期的代表吧。

（一）田園景色的描繪

柳浪館

「偏將藍瀋浸春顏，風柳鬖鬖九尺鬟。

鶴過幾迴沈影去，僧來時復帶雲還。

開疏滯葉通鄰水，擬典荒居作小山。
欲住維摩容得否，湖亭纔得兩三間。

二

「一春博得幾開顏，欲買湖居先買閒。
鶴有累心猶被斥，梅無高韵也遭刪。
鑿窗每欲當流水，詠物長如畫遠山。
客霧屯煙青簡裏，不知僧在那溪灣。」

柳浪館雜咏

「柳匝層層水，花紛曲曲堤。古籐隨意屈，熟鳥任情啼。
寄客詩題獄，招僧語隔溪。菱蒲分外長，漸與竹欄齊。」

二

「偶然修竹裏，新鳥一回聞。鶴下翻盆石，僧歸語嶠雲，
縱風生水態，任月織波紋。莫遣鷗鳧去，頻來只有君。」

三

「饒水饒煙地，照花照柳居。經營成淨社，穿鑿架僧廬。小作番唐像，閑堆農圃書。主人葷血斷，鶴亦念溪魚。」

初入村居

「割愛聯斐竹，薙荒暫作橋。雲嵐披舊址，花鳥歷前朝。澗伏多年雪，山深太古條。南華志怪者，不達小逍遙。」

（二）山居生活的自述：

雨中坐方平弟旃檀館即事

「柏屏籐格徑森疎，闌外蔬畦十畝餘。坐客始聞烹水法，高人時有乞花書。瓶中蘂結香尤老，雨後山茶韵不如。本欲死心無可死，爛紅堆裏詰清虛。」

王開然館中看梅余家塾也

「乞得馬家雙玉鬟，清姿濯濯權難聞。
幽香偶逐寒風去，帶却書聲過別山。」

二

「竹外斜侵十步強，千枝萬朶亞鄰墻，
東風若過黃梅節，吹得先生醋甕香。」

柳浪館月中泛舟

「煙樹濕蕺蕺，殘缸細隱紅。池谷通國水，柳散一城風。
僧靜能消月，庭方好貯空。幽窗漁梵冷，童子印香終。

新置得畫舫將以爲菴因作舟居詩

五

「峰巒曲折水灣環，時與遊僧作往還，
暫爲書碑來禹廟，纔因買橘上包山。
心關網密聊成歎，夢被雲牽偶不閒。

慎勿誇張竿水過，惹他桑孔算魚蠻。

和散木韻

三

「只合臥雲休，閑騾款段遊。愁來鷗失渚，夢往鹿尋丘。碧水青煙市，紅柑白果秋，斗湖新月裏，蕩個小漁舟。」

過藕花莊

「深院竹編墻，叢梢若箇長。入門溪雨溅，滿路麥風香。好風因凉得，閒愁到水忘。因循二十載，未到藕花莊。」

（三）遠遊時的速寫：

龍君超邀余過新置山莊莊在翠微山中甚幽僻

「掃石移尊去，披雲曳杖行。岡巒頻轉換，邪郭偶生成。溪盡田家出，山迴仄路平。遠峰覊壘起，蒼翠撲軒楹。」

二

「閒卽攀蘿上，倦來枕石眠，田廬陰翠壁，鷄犬入層煙。
竹院通茶戶，山鄉近水廛。主人心但了，勝作苦形仙。」

夜入桃源縣月中

「深村杞菊香，壁影拂船涼。和月和烟市，全山全水鄉。
高雲排鶴路，怒沫響魚梁。若個垂綸客，溪頭舊姓黃」

鄴城道

「何處魏離宮，荒烟斷葦中。獵蹄晴捲雪，高隼怒盤風」
苑古梧桐禿，墻崩枸杞紅。空台與流水，想像舊簾櫳。」

過華清宮浴湯泉有述

「鏡澈古苔光，溪風滿碧香。花猶知世代，水不解興亡。
紛黛山川俗，烟泉歲月長。而今正好景，石骨照蒼涼。」

（以上見瓶花齋與破硯齋二集）

總觀前邊所引的，可以很明白的看到中郎的作品是隨着他的年歲而變遷的。晚年的篇什眞大

有隨手拈來，便成珠璣之概。後之作文史者，多引其湖上詩作，爲譏談的笑柄，可以說是不懂中郎的詩，再不然是根本沒有把中郎的作品全盤讀過，只不過是跟人脚步「信口雌黃」罷了。此等作者不惟爲中郎之罪人，亦該是讀者之罪人也。至中郎詩在諸體中，我最愛他的五言，這也許是因爲五言適於平淡的描寫。自來之田園詩人如陶元亮王維儲光羲之流沒有一個不是擅長於五言的作者，中郎當「而立」之年，即隱居湖山，與朝市隔離，其心情恬靜得同不波而平的湖面似的，雲影天光同山色，都清清處處的映照在上面所以他時時有着忘我之感，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他想把他的周遭完全的表現出來，自然不能不常用這種適合於表現靜的情感的五言體。惟其是如此，所以他的五言之作，是遠在七言與樂府之上。我想閱者倘能將中郎作品全部瀏覽一過，許會相信我這話不是胡說的吧。

復次就是說到中郎詩的特點了，現在簡單的把牠歸納起來，不外乎在形式方面：第一，不拘守死格律，第二是不避俗語，在內容方面：第一是清新活潑，第二是俏俐詼諧。惟其能不拘格律，不避俗語，所以才達到「作詩如說話」的地步，惟其能俏俐詼諧，所以才令讀者有數讀不厭之感。這確是中郎的長處。至少是在王李之學滿天下，詩篇走入艱澀古奧模擬剽竊的魔道的時候，而突有中郎此等作品出現，眞不啻在爛醉如泥的時候，而飲一杯醒酒湯似的痛快。雖然中郎的作品亦有未盡美未盡善之

處，但我們還能夠去故意的苛責他嗎？

末了為我們所不能輕意放過的，則對於他的詩的淵源，同他的詩之對於後世之影響，不能不作一個檢討。中郎平生最佩服的是宋代的蘇東坡，同與他同時而不曾見過面的徐文長，那麼他的詩自然要受他倆的影響啦。同時他還不時的和陶靖節的詩，中唐的元白也是他念念不忘的大作家。想這一些人的作品，我們可以說都曾給中郎以很大的啟示。但是我們要去讀中郎的詩，真正像文長東坡元白同靖節嗎？不可以說與他們裏邊那一個都不完全相似。他的詩只是形他自己，換言之，就是「石公之詩，石公之詩也。」不是宋詩，不是唐詩，更不是漢魏六朝之詩，乃是明詩。這是為什麼呢？就是中郎法元白陶蘇並不是同王李一流的作家似的，高興老杜就比葫蘆畫瓢的來模擬人家，有時連模倣的本領都沒有，或者為嫌模倣太麻煩的關係，就乾脆把古人句子拿過來，略略的改改頭，換換面，就算成自己的了。中郎呢？他只是學他們創作的原則，從作詩的根本方法上着眼，結果自然是不能和他們盡同啦。至於他對於後世影響說來，就不免太為中郎抱不平了，因為除了當時受他的推動的幾個作家而外，以後受他的影響的幾乎很少，這個全是由於一些瞎了眼睛懷着意氣抱着偏見的批評家們，不問青紅皂白，肆口譏彈，任意詆毀的緣故。結果到了清代的他的「吾家子才」抄了他的話反不說是

從他學得的，可憐以一當百，自負不凡，氣傲一世的袁中郎，竟而在身後消聲匿跡，不爲一般人所注意了。從明到清末二百餘年，沒有能認識中郎而爲他表彰者，直至現代才算有位周豈明先生替他申白，爲他少洩一絲不平之氣。現在我們要談他的詩的對於後世影響問題，你說該從何處談起呢？

載師大月刊

四　袁中郎的佛學思想（張汝釗）

講到整個的佛教，須分三大系：

一、巴利文系的佛教；

二、西藏文系的佛教；

三、中國文系的佛教。

巴利文系的佛教，盛行於英屬錫蘭緬甸等處，論者都說是原始佛教，爲釋迦牟尼佛親口所宣說的文。西藏系的佛教，發達於中國所屬的西藏蒙古各地，其所承傳者，多爲密宗，現復推行於國內腹地，大有蒸蒸日上之勢。中國文系的佛教，雖亦由印度分化而來，經過了許多高僧大德的發揚光大，蔚爲平行的大乘八宗：一禪宗，二天台宗，三賢首宗，四密宗，五淨土宗，六律宗，七唯識宗，八三論宗。

中國佛教大乘八宗的隆替，雖也隨着時代輪齒的碾動而異其起伏，但到了明萬歷年間，各宗派多呈不景氣現狀，只有禪淨二宗，尙有中興的趨勢。因爲那個時候，正値雲棲蓮池大師宏揚淨土於江浙，李卓吾居士同時提倡禪宗於麻黃間，而龍溪王氏，近溪羅氏，天臺耿氏，石陽鄧氏等，亦以禪學而闡

儒宗。袁中郎生當其時，自然耳濡目染，受到莫大的影響了！所以，如果要追溯中郎袁宏道先生的主要佛學思想，亦當從禪淨二方面去看。

中郎抱着英俊特達的奇才，在科舉制度裏，亦曾登過科第，做過縣令，然終不屑與一般俗吏過那勢利生活，不久即捨去官位，與其兄伯修閱讀內典，並參究向上一著，他用了數年的功夫，不能明瞭禪宗的底蘊。有一天聽到張子韶講演致知格物的道理，始得豁然大悟，把牠來證明古人的微言大義，無不妙契諦理；並且能洞明前輩機用，乃一一提倡拈弄，彙集成帙，名曰金屑。後來他知道龍湖有個李卓吾居士，冥會外教別傳之旨，特地到西陵去拜訪他。果然李老與他一見如故，符同水乳，就爲他寫了一篇金屑集的序文，刊印問世。（作者尚未見到該集甚憾）並有贈中郎的詩曰：『誦君金屑句，執鞭亦欣慕，』復留中郎在他的地方住了三月有餘，十分殷勤的送至武昌而別。隔了數年，中郎復與其兄走訪龍湖，卓吾愛之愈甚，以爲『伯也穩實，仲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然至於入微一路，則諄諄望之，公蓋因其識力膽力，皆迥絕於世，眞英靈男子，可以擔荷此一事耳。』

中郎既得到卓吾的印證，欲於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乃就城外的低窪地方，買地三百畝，中間造了幾條長堤，四週又栽了萬株垂柳，微風披拂，宛如碧玻璃中涌起萬疊翠濤，因之署曰柳浪，以肖其狀。他

由此朝夕潛心參究不問世事。每值禪定之餘，信手揮寫，片言隻字，無不新奇絕倫，蓋其一片英靈，皆從他的宿慧中流出，所以能不着一字，盡得風流，嬉笑怒罵悉成妙諦也。這裏且來看他對於禪宗的思想態度。

中郎之於禪宗，非僅能升堂入室，又能燭照當時宗門空疏之病，和儒佛渾濫之弊，在答陶石簣書中有云：

『妙喜與李參政書，初入門人不可不讀，不觀書中云。「往往士大夫悟得容易，便不肯修行，久久為魔所攝。」此是士大夫一道保命符子，經論中可證者甚多，姑言其近者：四卷楞伽，達磨印宗之書也；龍樹智度論，馬鳴起信論，二祖續佛慧燈之書也；萬善同歸六卷，永明和尚救宗門極弊之書也，兄試看此書，與近時毛道所談之禪，同耶否耶？近代之禪所以有此流弊者，始則陽明以儒濫禪，既則豁渠諸人以禪濫儒。禪者見諸儒汩沒世情之中，以為不礙，而禪遂為撥無因果之禪；儒者借禪家一切圓融之見，以為發前賢所未發，而儒遂為無忌憚之儒。不惟禪不成禪，而儒亦不成儒矣。』

至於中郎論禪定的見解，亦超於尋常禪和子萬倍，實在不是一般依稀光景，掉弄知解者，所能夢

見。他說：

『定果有效，其益無量。但不知所守者，中黃耶？艮背耶？抑數息耶？夫定亦難，有出有入，非定也。故曰：「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卽出入亦定也。故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然定有大小，小定却疾，中定却老，大定則卽疾是定，卽老亦定，豔舞嬌歌，無處非定！』（與徐冏卿書）

『得丞札，知二兄在家參禪。世豈有參得明白的禪？若禪可參得明白，則現今目視耳聽，髮豎眉橫，皆可參得明白矣。須知髮不以不參而不豎，眉不以不參而不橫，則禪不以不參而不明明矣。』（答陶石簣編修）

『兄旣知此事不從問答來，便是好消息也。弟近日始悟從前入處，多是淨妙境界，一入淨妙，便是惡知惡解。彼以「本來無一物」與「時時勤拂拭」，分類漸優劣者，此下劣凡夫之見耳，尚未得謂之開眼，況可謂之入道與。』（答陶石簣）

「夫定亦難，有出有入，非定也。」「世豈有參得明白的禪」「此事不從問答來，便是好消息也。」

這幾句話是多麼透徹呀！因爲中郎當年看見一般以骨頭做工夫的坐香者流，終日渾渾噩噩參句亳無意義的話頭，說些什麼出定入定的光影，講些似是而非的機鋒轉語，來驚駭庸夫愚婦，實在皆非宗

門法器。中郎所說的話，眞是一針見血。

中郎他自己所修習禪定的境界，他也很自能明白：「近日始知從前入處多是淨妙境界，一入淨妙，便是惡知惡解。」這是他已經到了色陰銷除受陰明白時候的一種輕安靜妙境界。若長此貪戀，即走錯道途了。幸而他能知道這個消息，便不會着魔，而工夫自然能更進一層了。

「彼以本來無一物與時時勤拂拭，分頓漸優劣者，此下劣凡夫之見耳。」這樣的說法，也是中郎思想的獨到處。蓋神秀的勤拂拭偈子，不過爲中下根人指示其時時刻刻要提撕本性，切勿令其被塵俗所染汚之意。慧能之本來無一物的偈子，亦僅僅說穿那在妙明眞性裏本來無無一法可得，不過爲根性稍利的人們掃除知解而已，故皆未臻大機大用的究竟。而後來好事的人們，妄把牠分成頓漸二宗，各立門庭，斷斷不休，眞是錯中之錯了！因爲自性本來具足功德，事理兩無妨礙。見解雖有頓漸之不同，而法本是一宗，毫無差別之相可得，倘死要執着一端，自以爲是，那樣的人怎可與談禪理呢！

從上面幾封談禪的信札看來，可以知道中郎之於禪宗，是見義明白，說理透切的親證三昧的禪伯，絕非呵佛罵祖的一般狂妄禪客所可比擬的。茲再錄其暑譚中更爲近理的問答數條於下：

『問：「何謂時中？」答：「時即春夏秋亥子丑之時也，頃刻不停之謂時，前後不相到之謂中。金剛

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亦此義也。問：「何謂不相到？」答：「如駛水流，前水非後水，故曰不相到。」問：「何謂心生？」答：「如長江大河本無腐敗，故曰心生。」』

問：「何謂如是我聞？」答：「心境合一曰如，超於是非兩端曰是，不落眼耳鼻舌身意曰我，不從言語文字入曰聞。」』

問：「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立知。」問：「如何是知見無見？」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此知見無見。」』

問：『妙喜語錄云「將八識一刀兩斷，八識如何斷得？」答：「杲公以種種文字記憶爲第八識也，記憶乃第六識，八識乃持種，非記憶也。八識如斷，則目前山河大地一時俱毀矣。」』

問：「一面應事，一面於功夫上有默默放下處，恐多了心，分了功？」答：「如人打你頭，曉得痛，幷打你足亦曉得痛，通身打通身痛，如何不見多了心分了功！」』

禪話是最不容易講的，落了這邊既不是，落了那邊也不是，住着中間更不是，簡直是開口不得！但你雖不開口，若被明眼人看見了，自然會知道你是在彈那無弦琴，參那無字經，默識心通，悠然神會，不期然而然的心心相印了。可是普通的人們怎樣能猜得出在你的悶葫蘆裏所賣的是什麼藥呢？雖聰

明像子貢，尙云「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一段疑問。而中郎的悲心是這麽廣大，有人來問他，就很眞實的來回答他們。故雖寥寥數語，眞同吉光片羽，珍貴絕倫。蓋他實在已能把自己本身的物質生活，泯合於精神生活。換句話說，即所謂「山川木石，全露法王之身，鱗甲羽毛，俱彰禪那之體。虎嘯龍吟，獅行象步，咳唾掉臂，皆大人之相好，嘻笑怒罵，亦丈夫之調御」的景象了！

中郎的襟懷既這樣瀟洒，信解能這樣通利，才辯又這樣縱橫，一時固無出其右者。後來因深深覺悟到他所證到的工夫尙未澈底，若不加行修持，恐落「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的道路上去，所以他就絕口不說機鋒轉語，一意回向淨土了。

此後，他欲圓融性相不二之門，乃博采經論作西方合論。他的長兄伯修爲之序曰：

「……石頭居士（即中郎）少志參禪，根性猛利，十年之內，洞有所入，機鋒迅利，語言圓轉，自謂了悟，無所事事。雖世情減少，不入塵勞。然嘲風弄月，登山玩水，流連文酒之塲，沉酣騷雅之業，懶慢疏狂，未免縱意。如前之病，未能全脫。所幸生死心切，不長陷溺，痛念見境生心，觸途成滯，浮解實情，未能相勝，悟不修行，必墮魔境。始約其偏空之見，涉入普賢之海。又思行門端的莫如念佛，而

權引中下之疑，末之盡破。乃後博觀經論。始知此門原攝一乘，悟與未悟，皆宜修習。於是采金口之所宣揚，菩薩之所闡明，諸大善知識之所發揮，附以己意，千波競起，萬派橫流，詰其匯歸，皆同一源。其論以不思議第一義爲宗。以悟爲道。以十二時中持佛名號，一心不亂，念念相續爲行持。以六度萬行爲助因。以深信因果爲入門。……』（居士傳第四十六）

在這段文字裏，就可以找到中郎對於淨土宗的思想了。現在就把他學佛的思想程序歸納爲四要點：

一、以第一義諦爲指歸；

二、以執持名號爲行持；

三、以六度萬行爲助因；

四、以深信因果爲入門。

一者，以第一義諦爲指歸。換句話說，就是深信淨土宗爲佛法之最高峰，所謂『信彌陀的不動智，根本智，與己無異。彌陀在那由他劫，難行難忍，種種修習之事，我亦能行。彌陀的無量智慧，無量神通，及成就無量願方等事，我亦當得。信彌陀的不去不來，我亦不去不來。信彌陀的修行歷劫，直至證果，不移

剎那，我亦不移剎那，位齊諸佛。』

二者，以執持名號為行持。就是專念一佛名號，以攝受己心。其理如楞嚴經勢至念佛章云：『……譬如有人，一專為憶，一人專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二人相憶，二憶念深，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十方如來憐念眾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為？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染香人，身有香氣。……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

三者，以六度萬行為助因。什麼叫做六度呢？就是：一佈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六智慧。但在中郎的思想上則另有更進一層的見解，以為修淨土者，不必超越一種行動，就能具此六義。若念念離，即行於施；若念念淨，即行於戒；若念念寂，即行於忍；若念念續，即行於進；若念念一，即行於定；若念念佛，即行於智。總而言之，即起信論所云『菩薩深解現前所修離相』的一語。

四者，以深信因果為入門。就目前淺而易見的情形言，如易經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古德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果能宅心正直，毋必毋固，毋意毋我，嚴持戒律，即是入道之門。在中郎上李龍湖書中有曰：『所以裴柏曰：「其知彌高，其行彌下。」始知古德教人修行持戒，

即是向上事，彼言性言心言玄言妙者，皆虛見惑人，所謂驢橛馬椿也。』

對於中郎的淨土宗作品西方合論，蕅益大師曾有很公平的評話：

『唯大徹大悟人始可與談念佛三昧，否則，百姓之與知與能，猶遠勝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達磨西來，事出非常，有大利，必有大害。嗚呼！先輩幸得大利，今徒有大害而已。誰能以悟道爲先鋒，念佛爲後塵，穩趨無上覺路者耶！袁中郎少年穎悟，坐斷一時禪宿舌頭，不知者以爲慧業文人也。後復深入法界，歸心樂國，述爲西方合論十卷，字字從眞實悟門中流出，故絕無一字蹈襲，又無一字杜撰。雖台宗堂奧，尚未詣極，而透徹禪機，融貫方山淸涼教理，無餘矣。或疑佛祖宗教，名衲老僧，未易徧通，何少年科第，五欲未除，乃克臻此？不知多生薰習，非偶然也！傳聞三袁是宋三蘇後身，噫！中郎果是東坡，佛法乃大進矣！予每謂明朝功業士，遠不及漢唐宋，理學則大過之，陽明一人直續孔顏心脈，佛門居士，唐梁肅，宋陳瓘，明袁宏道，蓋未可軒輊也。』

又有汪大紳的評語，也很切貼：

『夫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袁中郎其庶矣乎！覺心悲心，怎地廣大悲切。又與允初書曰，「承勸看西方合論，當檢出來看，檢不出，當借閱也。」袁氏禪未敢遽斷爲口頭得法

於龍湖，龍湖不無狂魔入膈肺之證。至袁氏一轉而爲輕清魔，墜在輕安快活裏作窠臼，日流在光滑滑處，生知生見，無個銀山鐵壁時節。後來知無所得，歸心淨土，眞是奇特。然不可以是之故，於宗門淨土妄生高下也。須知宗門中事，釋迦佛所說是這個，彌陀佛所說是這個，無二無分別也。若然，則大家在這裏過活儘彀了，爲甚麼要生西方，要生兜率？曰：生人而有人欲，生天亦有天欲，生西方則人天之欲淨矣，人天欲淨，正好了當這個，所以盡十方願輪之大，莫大於生西方也。乘此願者，切不可隨語生解，便起一分計較心。這計較心是六道輪迴之根，非往生淨土之因也。欲生兜率者，請從布袋和尚詩入；欲生西方者，請從豐干詩入，此正因也。布袋是彌勒化身，豐干是彌陀化身。』（居士傳）

讀了蕅益大師和汪大紳居士的中郎評語，可以知道他已是受了當時禪淨二宗的洗禮了。若照佛法中習語說，就是「禪淨雙修，定慧俱足」的出格豪傑。所以他的襟懷自然有一種不能用言語來詮表的霽月和風狀態，與「一團活潑潑地的精神，可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的了。況且他生來就是一個聰明絕頂膽識超羣的人物，他自己曾說過，「有聰明而無膽氣，則承當不得；有膽氣而無聰明，則透悟不得。膽勝者，只五分識，可作十分用。」又說：「大丈夫當獨往獨來，自舒其逸耳，豈可逐世啼

笑，聽人穿鼻絡首？」故他的一種超越的識見，剛方的行爲，實遠與其師李卓吾之豁達狂禪。又能洞明儒佛的界限毫無當時王龍溪羅近溪等諸耆老儒佛渾濫之病，其志行之高潔，思想之純正，眞不愧爲有明一代士大夫學佛之代表者。

或者有人問：「中郎在佛學上的造詣，既有這樣的淵深，爲什麼沒有人知道他？」這，這因爲當時士夫夫的風尚，多以學佛爲可恥，而在暗地裏又要摭拾竊取佛教的思想，以雄其筆札，而恣其口談。同時在外面呢，則又要擺起道學先生的架子，效昌黎之闢佛甚至用政治手腕來攻擊佛教。所以中郎的佛學思想，多被他們湮沒而不傳。我想在中郎集裏，一定已有許多關於佛學的文字，被人淘汰了。譬如最重要的名著金屑集，就沒有收入全集之內。像那樣有價值的西方合論，在中郎的傳紀裏，連一個書目也沒有提起。所以作者只好從他的全集裏——我所見到的全集又不是完全無缺的——祇找些零星的材料和被人擯斥的佛學著述上，拉雜引來佐證，以備研究中郎佛學思想者之一助。

尤可笑的，是淸初一般頭巾氣——自命爲主持風騷的儒臣，硬把「主性靈，尙妙悟」的六字罪案，來打倒公安派的文章，其實何嘗能損及對方毫末，適足以反射出攻擊派中剽竊摹擬，堆砌塞磚的醜態！因爲文章爲思想的代表，思想是從性靈中流出，若無性靈，卽無思想，無思想卽無文章。況「文不

厭巧，」若無一點性靈上的妙悟，怎樣寫得出玲瓏剔透的文章呢？倘一味的方正呆板，只可算是一本賬簿，或一張表格，那裏還有文學上的價值呢？所以「主性靈，尚妙悟」的六個字，正是公安派的好標語，宛如薄雲之烘托皓月，渲染成趣，使明月的光芒更加燦爛而皎潔，亘萬古而常新了。

末了，來介紹嚴滄浪幾句論詩的話：

『論詩如論禪，禪道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詩之極致曰入神，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性情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

如果能把嚴滄浪幾句的評詩話頭，當做讀中郎全集時的「量才玉尺」則可以闖破中郎禪即文字，文字即禪的關捩子，而中郎一生特出思想的鼻子，也被讀者牽着走了。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寫於武昌菩提精舍。

——自時代本袁中郎全集

五　袁中郎與政治（阿英）

世人競說袁中郎，世人競學袁中郎，可是所說的中郎，究竟能有幾分像，所學的中郎，究竟還是姓袁不？愚小子曰。除掉很少數的而外，大都是捕着了中郎的皮肉耳，與中郎的肺腑骨骼何干？這樣的恭維中郎，正是殺害了中郎。就是那罵中郎的又何曾在中郎身上用過一點工夫問一問青紅皂白，祇是糊裏糊塗，亂舞刀槍，迎頭瞎打，把一個死後之身，弄得遍體青腫，這種不白之冤，中郎死而有知，眞不知要向何處伸訴！

中郎的這一頓冤枉，主要的是吃現在世的一班借他作掩護的人身上。他們沒有正而黑暗的勇氣，沒有反抗暴力的精神，於是拖出一個死中郎來作自己的盾牌，說中郎生在黑暗的時代，也是離開亂動的社會，走向隱逸的山林，以表示自己的逃避，正是袁中郎一流人物，是高尚的詩人風度，是亂世保身之道。其實袁中郎屍骨雖寒，遺集宛在，他一生之中，何曾像這一班人把「時事」忘却來。

「屈指悲時事，停杯憶遠人」（敝篋集登高有懷）中郎的一生，是什麼時候都不會和時事隔

開的。在他的許多遺集中，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實況，不斷的說明了自己對「時事」的感想，甚至於提出了對時局的主張。他對政治的態度，在種種的壓迫下，雖有時不免表現了灰冷，但從大處說來，他的態度是愈趨愈激烈，愈往後愈顯明。

作爲「諸生」的時代，他主張「藏巧不如嘿，」（敝篋集雀勞利歌。）在離開吳令任後，也還說着，「謙嘿箴可謂警切生犯此病久矣，當佩之以爲弦韋」（解脫集與管東溟。）可是，一個有熱情的人，對社會有責任心的人，事實上是做不到「嘿」的，所以，當他看到閹之力的加強，就有「言旣無庸嘿不可」（瓶花齋集題靈宮集之二）的轉變。而鄉居六年，重行出山以後，態度是更加積極起來，說是：「如此世界，雖無甚決裂，然悶鬱已久，必須大當擔者出來整頓一番。陶石簣近學道，其官情灰冷，弟曰，吾儒說立達，禪宗說度一切，皆賴些子煖氣流行宇宙間，若直恁冷將去，恐釋氏亦無此公案。蘇玉局白香山，非彼法中人乎？今讀二公集，其一副憂世心腸，何等緊切，以冷爲學，非所聞也。」（袁中郎遺稿致劉雲嶠祭酒）

中郎對「時事」的態度的轉變如此，到後來是正和他自己所說的一樣，「問二氏之學，淸淨無爲，出世可矣，似不可治世？答，治世出世，豈是兩事，如今做官的，奚必不打人，不罰人，纔叫無爲？謂百姓有

犯者來則治之，不犯者聽其自然，勿生事擾民，此即是淸靜無爲，豈不能致太平？」（珊瑚林）他始終不是一個「遺世」的人。

中郎的時代，正是「吏情物態，日巧一日，文網機穽，日深一日，波光電影，日幻一日」（錦帆集與何湘潭）的時代。也正是「貓竹爲情杉作城，白日赤丸盜公行，官軍防禦無計策，逐戶挑門呼士兵。衛尉呵持急如虎，老弱十家充一伍。」（解脫集巷門歌）「內庫馬價止垂盡，民固無力官奈何」（逋賦徭，）譬之爲「竹開花，磧生土」（逋賦徭）的時代。更且是「倭奴逼朝鮮，虛費百億萬竭盡中國膏，不聞鏃隻箭東虜近乘勝，虛聲震京甸，我兵折大將，腹背兩受戰」（瓶花齋集送劉都諫）的時代。到後來，竟是「黃蒿野望千家哭，白髮心傷一路危。王業艱辛二百載，漫將九鼎綴輕絲」（瀟碧堂集感賦）的危局時期。「正論難伸，陰機猶伏」（遺集與孫立亭）「每見邸報，必令人憤發裂眥」（遺集與黃平倩）的千鈞一髮的受難日。在這樣嚴重危難的關頭，若果中郎和今之「市隱」的文士們一樣耳如不聞，目如不見，自命淸高，我眞不知中郎何以爲中郎，而博得世人之稱頌至此！

瓶花齋一集，表現了中郎對時局最複雜的苦悶，也說明了他自己內心衝突最激烈的過程。此集作時，他正在京師，小人當道，正義難伸，倭議紛紛，時局嚴重。他的偶成就是象徵的說明這時代，所謂：

入秋寒已來，將夏春未至，煖氣與寒官，相值如相避。

麥田無寸青，山容添老顇，古梅不敢開，何況桃李媚？

京師重拜客，酬答有成例，強起出西街，天風吼濤勢。

飛沙澀齒牙，霧眼揮酸淚，未必諸高官，不省塵霾氣！

他目擊種種的失敗，憤慨達于極點，甚至寫出「恥納無意儒，寧結有心賊」（長安有狹斜行，此和小修）「寧取眞正的奸雄，不取掩覆的道學，」可以互參）的詩句，殺機到處潛伏，他感到說話不是，不說話也不是的苦惱。

他拚命的壓抑自己憤怒的感情，想發展他的「嘿」之哲學，把自己對「時事」的注意力，牽拉到許多瑣碎的事情上，如「懷壁塗僧像，高窗見鳥窩」（入燕初遇伯兄述近事偶題）「灰心盡日疏莊子，彈石淸晨誦准提」（庚戌初度）之類，而以「物忌太顯明，能保不風雨」（夜深同伯修月下觀梨花）「聊將古道酬賓客，免把閒思累腎肝」（和放翁自規）但他一面自規，一面還是忍不

住的要寫猛虎行一類的詩來誌憤，寫閒居一類的詩來記悲感：

空齋獨坐撥殘薪，筆有枯芒硯有鱗，夢裏風窗聽似雨，山中烟樹念如人。

兒童也解談東事，簫鼓何因動北隣，竟日飛霾無却處，一層吹了一層塵！

「兒童也解談東事，」這簡直是當時的「一二八，」連童子們也知道憤慨，然而並非童子以至於小民，甘心作奴的，從這裏看來，也自然大有人在。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當時的士大夫階級，一部分見事無可爲，遂爲潔身計，紛紛逃避，惟恐不速，每一天都有出京的人。故閒居之六有云：「身分無多難了事，酸儒那得濟時機，長安未有膠粘却，日日開門放客歸。」

中郎看到這些現象，眞是忍不住的義憤塡膺，再想到朝庭綱紀的不振，更覺得百不可爲，顧升伯太史回家，中郎便借這個機會把心中的積憤，作爲對唐宋人發牢騷，一古腦兒的寫了出來，其間最重要的話有：

「天下之患莫大於使豪傑不樂爲用，而蔽賢爲小。夫豪傑所以不樂爲用者，非眞世不我容，一時執政諸大臣，有杞檜之奸，林甫嵩之之娟嫉也。……其勢不至於僞士滿朝，腐儒誤國不已！……

時事至此，尚安忍復言？……「升伯豪傑而用世者，今其言若爾，無必不用之迹，有不用之心矣。今世之爲可用耶？爲不可用耶？他日復以問升伯，升伯不對。」

中郎對於當時政治的不滿，到了怎樣的程度，在這篇文章裏是可以概見了。這形勢發展的結果，雖沒有使他「離之欲浼」，但他感到了前途的黯淡，一腔的熱望，歸於灰冷了。他寫看月一詩，記他失望的經過道：

良月下空窗，秋水浸湘簟。寒氣逼衣來，垂帷禦風入。
驅風月亦驅，轉若塵舊識。端坐不可忍，強起下簷立。
苦酒呼一杯，聊以寬風力。不惜待陽和，三春光景失。
永夜伴清暉，寒士寒亦得。

終竟失望，但決不與之同汚，此中郎之態度的自己表白也。經過了這一階段，中郎纔眞的有些灰心了；可是他對「時事」的關切，還是無時能以忘懷，這有他的題靈官集一詩之第二節可以作證：

野花遮眼酒沾涕，塞耳愁聽新朝事。邸報束作一篋灰，朝衣典與栽花市。
新詩日日千餘言，詩中無一憂民字。旁人道我眞聵聵，口不能答指山翠。

自從老杜得詩名，憂君愛國成兒戲言既無庸嘿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

眼底濃濃一杯春，慟於洛陽少年淚，

所以然使他陷於這樣狀態的原因，答黃無淨祠部書是更說得明白：「往在郎署諧伯修曰：今世作官，遭橫口橫事者甚多，安知獨不到我等也。以是無會不極口勸伯修歸，及警策身心事益深。」在這種種的條件之下，中郎動搖了，雖然他還勸王繼津出仕說：「當今國事紛紛，無所取裁，世道人事，不言可知。問之謝孫，骨力方健，蒼生切東山之出，四夷懷司馬之望，恐不得安枕貼席於田野間也。」他歌詠着，「烟光逐日改，那得不歸休。」（偶題）回到自己的故鄉去。然而，袁中郎就這樣到底的沉沒下去麼？……

甲辰。袁中郎三十七歲初度日，他寫了兩句詩，說是「勸我爲官知未穩，便令遺世亦難從，」（瀟碧堂集甲辰初度。）「遺世難從，」這是實在的話。中郎雖在京師起了歸志但回去以後，却很實際的體驗到要「遺世」是辦不到的了。因爲像中郎這樣一個並不希望自己趨向於絕滅的人要他毫不回顧的沉沒下去，是不可能的事，他終竟是免不了「憂時心耿耿，學道鬢蒼蒼。」（瀟碧堂集滄州逢

瞿太虛運使）「感時多長語，虛竅偶然鳴」（偶作）的。他回鄉以後，積極性是又被喚起了，在幾篇贈序裏，使又憤憤的對政治加以攻擊，並提出對時局的主張，且自己也在各方面的督促之下出仕了。袁中郎在山居以後，又逐漸恢復了他往日的精神。

那一些條件，使中郎有如此的轉變呢？第一，是由於他更深的接觸到民間的痛苦。他回鄉以後，看到了「部署使者，檄下如雨，計畝而誅，計丁而夫。耕者哭於田，驛者哭於郵。」（瀟碧堂集送江陵薛侯入覲序）「今天下之利孔，百耗於唐宋，而其規利之法，百苛於間架手實。」（瀟碧堂集送葉使君還朝序）又看到「不數年中，居民耗損，市肆寂寥，居者轉而南畝，商者化為遊客，醫房典僕之家十室而九，而當事者時欲取羨於額外，屢盈屢溢，若之何不病且亟也？」（瓶花齋集答沈伯函）這些，是無往而不使有社會責任心的人感到痛苦的，中郎豈能獨為例外？

第二，是由於中郎了解到國事不可為，山林一樣的非安樂窩，人間並無桃源。瀟碧堂集裏有他的一首聞省城急報，其中有云「二百年來好綱紀，辰裂星紛委平地，天長閶永叫不聞，健馬那堪持朽轡？書生痛哭依蒿萊，有錢難買青山翠。」而遺集中與黃平倩一書，更澈底的說到「時事如此，將何底止，因念山中殊樂，不見此光景也。然世有陶唐，方有巢許，萬一世界擾擾，山中人豈得高枕？」國亡之後，山

林並不能獨立的存在，不受都會事變的影響。中郎有見於此，而翻然悔悟，在事實上也是必然。

由於這基點的覺悟，袁中郎不僅再度出仕，恢復了過往的精神，且是更進一步的親身與惡劣的政治現象作戰了。讀遺集裏摘發巨奸疏等重要的政治論文，在三百年後的今日，猶能令我們想見當時中郎作戰的精神，作戰的勇敢，這一點精神，是袁中郎一切事業的成功之源，在文學上是如此，在政治上也是如此。

中郎所以昭示後人者在此，就是在他文學事業上所反映的，也並沒有二樣。不幸的，是世人竟忽略了這主要的一點，衹在他的文字的摹擬上用功夫，沒有創造的精神，何來中郎的文體，即使能字摹句擬，學得十分像，也祇學得中郎的一副間架而已。不取其神，祇採其形，去其精華，取其糟粕，中郎固冤，即學者說者又將從何處認取自己的存在耶？

中郎是可學的，在政治上，應該學他大無畏的反抗黑暗，反抗暴力，反對官僚主義的精神。在文學上，應該學他反對因襲，反對模擬，主張創造的力量，以及基於這力量而生產的新的文體。要批判的學習中郎，要發展的去學習中郎，不能無條件的接受中郎，因為中郎的一生，有他的優點，也有他的缺陷，

而且我們所處的社會，和中郎所處的又自不同。不知今之學中郎，說中郎者，亦能有悟於愚小子之言乎？

——自夜航集

六　袁中郎遺事錄（劉大杰）

袁石公遺事錄，是一部研究袁中郎最重要的材料。這書是中郎的後人袁照輯錄的，刊於同治八年。書前有袁照的一篇長序，把中郎的文學思想說得很詳細。他爲什麼要輯這本書呢？看他在最後一段裏說：

『石公足跡半天下。知交徧海內，其詩文一出，而百年之風氣遂變。知我罪我，無所動心。則其胸襟之空闊，眞足以凌轢古今。令後世聞其一言一行，悉可以想見其爲人，其流風餘韻，尤多有足述者。照每讀前賢書見其持論平允，足以發明公之苦心，有當於知人論世之旨者，輒節錄成帙，名爲石公遺事錄。內分著作，學術，高行，宦績，遊踪，異蹟，雜記，凡七類，約三百餘條，藏之篋笥已久。久欲付梓，未果。今春重取梨雲館全集讎校一過，爰先摘刊百餘條，附諸集末，以誌數典不忘之意云。』

很可惜的，現在刊行的只一百多條，不及他輯錄的一半。在那未刊的一半裏，一定還有不少的重要的史料，就這麼散失了。他所輯的，大半是中郎同時人的著作，這些著作到現在是極不容易得到的。

旁人的不要說，就是伯修小修的集子，已經是不易見的了。

袁照除這本遺事錄以外，並校刊袁中郎集二十四卷本。在我所看過的許多中郎集子裏，這部同治本要算校刊最精了。我們看了他那篇校刊後記，就只道他校刊那部書的時候，是費了多少刻苦的工夫。他說：

『本朝隆嘉年間主持騷壇者，專以提倡盛唐爲宗旨，一時文人翕然從之，於是公集漸晦。訖道光時，先伯父蓀圃公，追念前人手澤，恐其久而失傳也，爰取先祖南金公手授梨雲館舊本，重梓於鄂。惜爾時未見譚友夏袁無涯周九眞諸刻本，訛舛概未勘正。照自幼習舉子業時，即喜竊讀此書，往往病焉。輒欲訪求舊刻，重加校訂。顧力有未暇，迨咸豐甲寅，避亂澧陽山中，始有事於公之遺書。偶於同邑姜茂才處，見袁無涯刻本，繼復於族弟日韋處，見譚友夏刻本。至同治乙丑入都，於琉璃廠書肆，見一坊刻別本，皆緣人事倥偬，不獲細校。乙丑冬，宦遊至吳，於蘇城求得小修公珂雪齋初刻詩集一部，而於公之全書未獲一見。迨丁卯春，奉札至甯，始於金陵書坊中，購得周刻十集，較之何刻稍精，然視全集所收詩文，才及十之二三。間復從麻城劉氏帝京景物略，振卿何氏名山勝概記，秀水朱氏明詩綜，並坊刻諸書，見其所錄公之詩文，足正梨雲館之誤者，十才

一二。他如趙告士寄園寄所寄，易公中名賢齒譜，伍涵芬讀書談詩本趣，李敏達公西湖志諸書，所節錄足資參考者，亦不過寥寥數條，究不足藉以通校全書。至戊辰冬，豳巡使者龐相三先生示以所藏梨雲館一部，而予弟小圃又以家藏舊板見寄，今春乃借觀察藏本通校一過，並重檢舊閱諸書，互相讎勘，計所改正詩千餘字，一一補刊完竣。此外尚有可疑數十字，苦無別本參校，不無餘憾，然較之明刻梨雲館舊刊本已稍覺完善矣……」

在這段話裏，我們可以知道許多關於袁集版本的事實，同時也可以知道袁照對於中郎著作的整理，是一個盡力最多的人。他是同治八年三月校刊全集，是同治八年秋天刊行遺事錄的。遺事錄的好處，是把一些文人對於中郎的意見，不分褒貶地兼收並蓄，後人研究時可以作一種有益的參考，這是他最有見解的地方。

重刊袁中郎全集序一

周作人

林語堂先生創議重刊袁中郎全集，劉大杰先生擔任編訂，我覺得這是很有意義的事。公安派在明季是一種新文學運動，反抗當時復古贋古的文學潮流，這是確實無疑的事實，我們只須看後來古文家對於這派如何的深惡痛絕，歷明清兩朝至於民國現在還是咒罵不止，可以知道他們加於正統派文學的打擊是如何的深而且大了。但是他們的文字不但觸怒了文人而且還得罪了皇帝，三袁文集於是都被列入禁書，一概沒收銷燬了事，結果是想看的固然沒得看，就是咒罵的人也無從得見，只好閉了眼睛學嘴學舌的胡亂說一番而已。我們舉一個例，直介堂叢刻中有蕓楚齋隨筆正續各十卷，盧江劉聲木十枝撰，有己巳五月序，即民國十八年也，隨筆卷三第十六則云：

「明末詩文派別至公安竟陵可謂妖妄變幻極矣，亡國之音固宜如此，時當末造，非人力所能挽回，世多不知其名氏撰述，爰記之於下，以昭後世之炯戒。公安三袁，一庶子宗道，即士瑜，撰海蠡編二卷，一吏部郎中中道，撰述無傳，一吏部郎中宏道，獨宏道撰述甚富，撰有觴政一卷，瓶花齋雜錄一卷，袁中郎集四十卷，明文雋八卷，竟陵為鍾惺譚友夏，俱天門人。」又續筆卷四第十一則云：

「瑞安陳懷孟冲父（案此處原文如是）撰有獨見曉齋叢書，其第一種爲李白論文一卷，共九篇，其篇目有云文性文情文才文學文識文德文時等目，只須見其目即知其深中明季文人之習，墜入竟陵公安一派，實爲亡國之音。」此書作者是桐城派，其反對公安本不足異，唯高談濶論而伯修之白蘇齋類集與小修之珂雪齋集選似均未見，又於中郎集外別列觴政，可知其亦未曾見過此集也。其實珂雪齋雖是難得，白蘇齋與梨雲館本中郎集在道光年均有翻刻，而或因被駡太久之故也竟流傳不廣，以致連駡者亦未能看見，眞眞一大奇事。這回把中郎集印了出來，使得大家可以看看，功德無量，無論意見如何，總之看了再說，即使要駡也有點兒根據。

中郎是明季的新文學運動的領袖，然而他的著作不見得樣樣都好，篇篇都好，翻過來說，擬古的舊派文人也不見得沒有一篇可取，因爲他們到底未必整天整夜的裝調作勢，一不小心也會寫下一小篇即興的文章來，如專門模仿經典的楊子雲做有酒箴，即是一例。中郎的詩，據我這詩的門外漢看來，只是有消極的價值，即在他的反對七子的假古董處，雖然標舉白樂天蘇東坡，即使不重模仿，與瓣香李杜也只百步之差，且那種五七言的玩意兒在那時候也已經做不出什麼花樣來了。中郎於此不能大有作爲原是當然，他所能做的只是阻止更舊的保持較新的而已。在散文方面，中郎的成績要好

得多，我想他的遊記最有新意，傳序次之，瓶史與觴政二篇大約是頂被人罵為山林惡習之作，我却以為這很有中郎特色，最足以看出他的性情風趣。尺牘雖多妙語，但視蘇黃終有間，比孫仲益自然要強，不知怎的尺牘與題跋後來的人總寫不過蘇黃，只有李卓吾特別點，他信裏那種鬥爭氣分也是前人所無，後人雖有而外強中乾，却很要不得了。中郎反抗正統的「賦得」文學自是功在人間，我們懷念他的功績，再看看他的著作，成就如何，正如我們讀左拉的小說，看他與自然主義的理論離合如何，可以明瞭文學運動的理想與現實，可以知人論世，比單憑文學史而議論得失，或不看作品而信口雌黃，總要較為可靠了。

中郎喜談禪，又談淨土，著有西方合論十卷，這一部分我所不大喜歡，東坡之喜談修煉也正是同樣的一種癖。伯修與小修，陶石簣石梁，李卓吾屠長卿，也都談佛教，這大要是明末文壇的普通現象，正統派照例是儒教徒，而非正統派便自然多逃儒歸佛，佛教在那時雖不是新思想，却總是一個自由天地，容得他們託足，至於是否夠說信仰，那我就不好代為回答了。反對這些新文學潮流的人罵他們妖妄變幻，或者即側重此點，我看蓑楚齋隨筆中屢次說到明朝之亡，由於李屠諸人之信佛教毀倫常，舉以參證，不過李屠以及二陶三袁固然與佛有關，竟陵的鍾譚似並不這樣，然則此文所云又是疑問了。

正統派罵公安竟陵爲亡國之音，我疑心這句話自從甲申以後一直用到如今了罷，因爲明朝亡了是千眞萬確的事實，究竟明朝亡於何人何事，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且更是死無對證，我想暫不討論，但是什麼是亡國之音，這件事似乎還可以來探討一下，有人說亡國之音便是公安竟陵那樣的文章。這樣的乾脆決斷，彷彿事情就完了，更無話可說，然而不然。所謂亡國之音這是有出典的，而且還出在經書裏。查禮記樂記第十九云「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孔穎達疏云。「亡國謂將欲滅亡之國，樂音悲哀而愁思。亡國之時民心哀思，故樂音亦哀思，由其人困苦故也。」後又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鄭玄注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在同一篇中有兩樣說法，迥不相同，一說樂音哀思，一說靡靡之樂，令人無所適從，鄭玄雖然也是大儒，所說又有韓非做根據，但是我們總還不如信託經文，采取哀思之說，而桑間濮上應即承上文而言，至於其音是否哀以思，是否與上文不矛盾，則書缺有間，姑且存疑。中郎的文章，說是有悲哀愁思的地方原無不可，或者這就可以說亡國之音？詩經國風云：

「有兔爰爰，雉離於羅。

我生之初，尙無爲。
我生之後，逢此百罹。
尙寐無吪」
這種感情在明季的人心裏大抵是很普通罷。有些閒適的表示，實際上也是一種憤激，即尙寐無吪的意思。外國的隱逸多是宗教的，在大漠或深山裏積極的修他的勝業，中國的隱逸却是政治的，他們在山林或在城市一樣的消極的度世，長沮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便說出本意來。不過這種情形我想還應用樂記裏別一句話來包括纔對，即是「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孔穎達解亡國爲將欲滅亡之國，這也不對，亡國便干脆是亡了的國，明末那些文學或可稱之曰亂世之音，顧亭林傅青主陳老蓮等人纔是亡國之音。如吳梅村臨終的詞亦是好例。閑話休提，說亂世也好，說亡國也好，反正這都是說明某種現象的原因，樂記云「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其情之所以動，則或由世亂政乖，或由國亡民困，故其聲亦或怨怒或哀思，並不是無緣無故的會忽發或怨怒或哀思之音，更不是有人忽發怨怒之音而不亂之世就亂，或忽發哀思之音而不亡之國會亡也。中郎的文章如其是怨以怒的，那便是亂世之音，因他那時的明朝正是亂世，如其是哀以思的，那就可以算

是亡國之音，因爲明季正是亡國之際，「時當末造，非人力所能挽回，」所以說的如此而已，有什麼可以「昭後世之烱戒」的地方呢？使後世無復亂世，則自無復亂世之音，使後世無復亡國，則自無復亡國之音，正如有飯吃飽便不面黃肌瘦，而不生楊梅瘡也就不會鼻子爛落也，然而正統派多以爲國亡由於亡國之音，一個人之沒有飯吃也正由於他的先面黃肌瘦，或生楊梅瘡乃由於他的先沒有鼻子。嗚呼！熟讀經典者乃不通禮記之文，一奇也，中郎死將三百年，事隔二朝，民國的文人乃尙欲聲討其亡國之罪，二奇也，關於此等問題不佞殆只得今天天氣哈哈哈矣。

說到這裏，或者有人要問，足下莫非是公安派或竟陵派乎？莫非寫亡國之音者乎？這個疑問也問得當然，但是我慚愧不能給他一個肯定的答話。第一，我不是非宗教者，但實是一個無宗教者，我的新舊教育都不完全，我所有的除國文和三四種外國文的粗淺知識以外，只有一點兒生活的知識，其程度只是丘淺治郎的生活學講話，一點兒歷史的知識，其程度只是綱鑑易知錄而已。此外則從藹理斯得來的一絲的性的生理，從弗來則得來的一毫的社會人類學，這些雞零狗碎的東西別無用處，却儘夠妨碍我做某一家的忠實的信徒。對於一切東西，凡是我所能懂的，無論何種主義理想信仰以至迷信，我都想也大抵能領取其若干部分，但難以全部接受，因爲總有其一部分與我的私見相左。公安派

也是如此，明季的亂世有許多情形與現代相似，這很使我們對於明季人有親近之感，公安派反抗正統派的復古運動，自然更引起我們的同感，但關係也至此為止，三百年間遲遲的思想變遷也就不會使我們再去企圖復興舊廟的香火了。我佩服公安派在明季的新文學運動上的見識與魄力，想蒐集湮沒的三袁著作來看看，我與公安派的情分便是如此。第二，我不是文學家，沒有創作，也說不上什麼音不音。假如要說無論說話寫字都算是音，不單是創作，原來樂記的所謂音也是指音樂，那麼我也無從抵賴。是的，我有時也說話也寫字，更進一步說，即不說話不寫字亦未始不可說是音，沉默本來也是一種態度，是或怨怒或哀思的表示。中國現在尚未亡國，但總是亂世罷，在這個時候，一個人如不歸依天國，心不旁騖，或應曾試作「賦得文治日光華」詩，手不停揮，但不免要思前想後，一言一動無不露出消極不辭之氣味來，何則？時非治世，在理固不能有好音；此查照經傳可得而斷言者也。國家之治亂與亡，自當責有攸歸，茲不具論，若音之為亂世或亡國，則固由亂世或亡國的背景造成之，其或怨怒或哀思的被動的發音者應無庸議，今之人之不能不面黃肌瘦者真是時也命也。不佞豈能獨免哉？不佞非公安派而不能逃亡國之音之譏者，亦是時也命也。吾於是深有感於東北四省之同胞！四省之人民豈願亡國哉，亦併何嘗豫為亡國之音？然而一旦竟亡，亦是時也命也。我說時與命者，言此與人民之意

志無關，與文學之音亦無關也。音之不祥由於亡國，而亡國則由於別事，至少決不由於音之祥不祥耳。人苟少少深思，正當互相歎惋，何必多嘵嘵也。

閑話說得太多了，而實於中郎無甚關係，似乎可以止住了。重刊中郎集，鄙意以爲最好用小修所編訂本而以別本校其異同，增加附錄，似比另行編輯爲適宜。標點古書是大難事，錯悞殆亦難免。此在重刊本體例上似有可商者。附識於此，以示得隴望蜀或求全責備之意云爾。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識於北平。

——自大公報文藝副刊

重印袁中郎全集序二

郁達夫

大抵文學流派的起伏變更，總先有不得不變之勢隱存着了，然後霹靂一聲，天下響應，於是文學革命，乃得成功。這革命的偉業，決非一二人之力所消得成，亦決非一二人之力所止得住。照新的說法，文學亦同政治和社會一樣，是逃不出環境與時代的支配的；窮則變，變則通，通而又窮，自然不妨再變。

統觀盛明崛起，先有了劉文成高青邱兩大詩人，樹立於前；一則鬱伊善感，萬象包羅，一則清華朗秀，詞壇獨步。蓋創業初期，文氣自然豪麗也。承平日久，館閣諸公，競以雍臯典麗爲指歸，孔步亦步，孔趨亦趨，於是乎滔滔者天下皆是優孟衣冠了。明代前後七子模仿盛唐的流弊，就在乎此。

公安袁氏，兄弟三人，（袁宏道字中郎，兄宗道字伯修，弟中道字小修，）獨能於萬曆詩文疲頹之餘，自樹一幟，洗盡當時王李的大言壯語，矯揉造作；以振衰起絕而論，他們的功業，也儘可以與韓文公比比了，然而袁中郎的集不見流傳者，（乾隆中被禁毁，）當然又是淸初館閣諸公的袍巾頭巾在那裏作梗。

現在先摘幾節袁中郎論詩文的要旨在下面，然後再來說一說他的全集，當然在現代也有翻印

出來的必要。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夫復古是已，然至以勦襲爲復古，句比字擬，務爲牽合，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有才者，詘於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才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於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倡億和，優人騶子，皆談雅道，吁，詩至此，抑可羞哉！……』（雪濤閣集序）

『……弟才雖綿薄，至於掃時詩之陋習，爲末季之先驅，辨歐韓之極冤，搗鈍賊之巢穴，自我而前，未見有先發者，亦弟得意事也。……』（答李元善）

『……宏近日始讀李唐及趙宋諸大家詩文，如元白歐蘇，與李杜班馬，眞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謬謂前無作者，而學語之士，乃以詩不唐，文不漢，病之，何異責南威以脂粉，而唾西施之不能效顰乎？……』（與馮琢師）

『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眞新奇也……』（答李元善）

略抄數條，大約明史（二百八十八卷）列傳裏所說的宏道「詩文主妙悟，」「清新輕俊」諸點，總

已能想見一班了罷？

由來詩文到了末路，每次革命的人，總以抒發性靈，歸返自然，爲標語；唐之李杜，元白，宋之歐蘇黃陸，明之公安竟陵兩派，淸之袁蔣趙龔各人，都係沿這一派下來的。世風儘可以改易，好尙也可以移變，然而人的性靈，却始終是不能泯滅的；袁中郎的詩文，雖在現代，還有翻印的價値者，理由就在這裏，更何况全書遭禁燬之後，流行不廣，貧門寒士，要想一賞袁中郎的奇文，非受盡書賈的惡勢不可的今日呢！

至於公安一派在文學上的革命功績和歷史，已有周作人先生提倡在先，我在此地可以不必再說；然而矯枉過正，中郎時時也不免有過火之處，如他的西湖紀遊裏關於吳山的一條記事：

『余最怕入城，吳山在城內，以是不得徧觀，僅匆匆一過紫陽宮耳。紫陽宮石，玲瓏窈窕，變態橫出，湖石不足方比，梅花道人一幅活水墨也，奈何辱之郡郭之內，使山林僻懶之人，親近不得，可嘆哉！』

這豈不是太如明史列傳作者之所說『以風雅自命』了麽？

較袁中郎略後，繼公安派而起的所謂竟陵鍾伯敬譚元春之流，因公安派詩文的淸眞近俚，欲矯

其弊而變爲幽深孤峭，那又是一時的風尚，本來與袁中郎無關；但後世的論詩文者，每以三袁的佻仄，與鍾譚的幽詭並提，斥爲僞體俳體，將鍾譚三袁，尤其是宏道的奇文妙句，一概抹煞，這可眞使人不得不爲袁中郎叫屈了。

記得十數年前，在武昌曾買得一部袁中郎全集的家刻舊本；當時熟讀數過，覺得通行本瓶花齋集裏所收集的詩文，只有全集的十之三四。後來貧病交迫，這全集以五元錢被上海一家書賈買去，如今回想起來，總隱隱還覺得心痛。現在林劉兩氏，翻印袁中郎全集的計劃成功，我不但感到是替我報了一班市儈書賈的仇，幷且更有重遇故人的快樂機會了，這快樂我想和中國各地的貧文士，大家來同嘗一下。

——自人間世

袁中郎尺牘序

阿英

昔張宗子跋寓山注，說：「古今記山水手，太上酈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時則袁中郎。」中郎遊記固佳妙，然其尺牘較之遊記，則又勝之。若說太上尺牘手是蘇東坡，我想其次就應該是袁中郎。

最能了解中郎文學主張的，是進之江盈科，最稱許中郎尺牘的，也是進之江盈科。中郎所序的雪濤閣集的作者。他論中郎尺牘，說是：「若夫尺牘，一言一字，皆心所欲言，信筆直書，種種入妙。」又說是：「中郎諸牘，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總之自眞情實境流出。就中有往復交駁之牘，機鋒迅疾，議論朗徹，排擊當世能言之士，即號爲辨博者，一當其鋒，無不披靡。」寥寥數語，把中郎尺牘的主要精神，主要特點，說得可謂闢透之至。

朱錦文序短扎字字珠，以書啟爲長矛，尺牘爲短兵。他說：在平原曠野上作戰，應該利用長矛。要

是巉險阻隘處，是莫如短兵便，用各有所宜也。這和陳繼儒所說：「文亦何大何小，有一段眞精神透映紙上，便是慧業」理論上正有相似和聯繫之處。中郎諸牘，其惟一的特色，就是這「眞精神透映紙上，」而把尺牘當作了自己作戰的武器。此進之所謂：「往復交駁之牘，機鋒迅疾，議論朗徹」也。

今之論中郎尺牘者，大都強調其尺牘筆調，欣賞讚歎其形式。此點我殊不能同意。中郎尺牘的形式何自來？爲內容所決定，殆無疑意。此公提起筆來，本就沒有打算寫什麼文章，更不會意想到要用什麼筆調，祗是達意而已。故到處顯出有話即說的神氣，不自覺的用進了許多當時的口語。嫵媚天然，並非有意做作。若是提筆之先，早就打定主意，要創造一種什麼語錄體文學，則袁中郎早不成其爲袁中郎矣，這待三百年後之今日。

三百年前之舊物，現在仍來標點翻印者，其目的不在提倡復古，或希望大家起來摹仿，證以前言可知。然則，所企圖者何？從文化的歷史意義上，會心者當能得之，不須贅辭。若有人不能如此理解，派作與復古傾向有關，則我請以中郎詩答之曰：「莫把古人來比我，同床各夢不相干，」我對中郎的努力，

止於客觀的研究中郎。

讀袁中郎集

周木齋

魚在水裏不知道在水裏，人也是這樣的。提醒一句：現在是中華民國了。更奇怪的，還是近年的事。有人嘴說不是復古，竟說現在眞够像明代的樣子，這原是把自己除外了算的，却不料又在自己們的中間發現了像明代人的人，像明代文的文，自滿自足。

畢竟怎麽一回事呢？不懂。想來可以說，明代是不能一律看的。不一律，又想來就有好有壞了。是的，好的明代好到比中華民國還好。單就文學一項說罷，民國的新文學運動，據說就是淵源於明末的新文學運動，湊巧的是，又是暗合，而那時對於中國文學變遷的看法，提出來的主張，比現在或者還要清楚，中肯。

領導明末新文學運動的是公安派，而公安派中最傑出的是袁中郎，上面的話，正是指他。他還了得，便被捧了出來，「滿城聽說蔡中郎，」現在應該變姓了。

幸而不幸的事，姓倒沒有變，却變了相了。這阿法先生說得好：頌揚，標點，印刷，「色借，日月借，燭借，靑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鐘鼓借，枯竹竅借……」借得他一場胡塗，正如在中郎臉上，畫上花臉，却指給

大家看，嘖嘖讚歎道：「看哪，這多麼『性靈』呀！」——就從此被捧殺。

不經曹聚仁先生揩去這花臉，非但變了相，幷且變了性，

因是種稀，袁中郎集是值得一讀的。

原來在中郎的以前，弘治年間，有一位李東陽，做詩學唐代的杜甫；接着李夢陽何景明起來倡導復古，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一時邊貢，康海，徐禎卿，王九思，王庭相唱和呼應，聲勢很大，所以這幾個人合稱七子。到了嘉靖年間李攀龍，王世貞更推動這潮流，益發厲害，又加入了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合稱爲後七子。後七子中李攀龍是頭腦，也換湯不換藥地提出了「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的口號，對當代的人物只推舉李夢陽。李攀龍王世貞寫作詩的方法，平時，當然是讀盛唐人的集子，而搜羅裏面華麗的字面錄下積蓄起來；到寫作的時候，在先又一定要讀和自己所寫題目相類似的古人的作品，打了一個底子，於是從積蓄字面的錄本裏面找尋挑選，綴連起來，便算完成一篇作品。做文章也這樣，不過對象換了，要讀秦漢的文章，要從這裏面搜羅字面，要模仿，要塡嵌，赫赫有名的大家還這樣，再模仿他們的，更不必說。

這樣的寫作已經很苦了，但是還不止此。頭腦的李攀龍，眞的在「攀龍」了，更特意築了一座白

雲樓，表面像是可以專心思索，其實是怕旁人看見他的醜態，每次當寫作的時候，一個人到樓上，把梯子抽升了，這樣與世隔絕，好叫人家不能上去，讓自己定心在那裏獨個兒玩把戲。但是結果並不很壞，有人曾經批評過他的文章說：「斑駁陸離，如秦漢間人，」也和現在的有人像明人，文像明文一樣。

但現在所像的明人明文，不是這些明人明文而是反抗這些明人明文的明人明文，眞實這些明人明文，已經不是單就文說，是秦漢人秦漢文了。

反抗這些明人明文的是公安派，而最傑出的是袁中郎。

不過在嘉靖時，對於李夢陽何景明的復古，已經有人反抗了，如起初也學秦漢的王愼中，後來便師法宋代的歐陽修曾子固，和他齊名的唐荆川，也響應他，致遭遇李攀龍王世貞的攻擊。後來當王世貞氣燄萬丈的時候，又有歸有光出來抗爭，就是有光死時，世貞也在祭文中讚他說：「千載分光，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

所不足的，王唐歸還執着唐宋，他們和秦漢派的鬥爭，不免有「以五十步笑百步」的嫌疑。到袁中郎，這才不依仗古人，抓住了時代。雖然如此，但中郎的反抗復古，總受些影響的。他在敍姜陸二公同適稿一文中，就推重歸唐，如說：

有爲王李所擯斥，而識見議論，卓有可觀，一時文人望之不見其崖際者，武進唐荊川是也。文詞雖不甚奧古，然自闢戶牖，亦能言所欲言者，崑山歸震川是也。

但中郎更深進了，對於復古他揭了「時」的旗幟。雪濤閣集序說：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

復古是不可能的，是冒充。

敍小修詩說：

……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卽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余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尙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以爲未能盡脫近代文人習氣故也。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於秦漢，詩則必欲準於盛唐，剿襲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爲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惟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

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眞人所作，故多眞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尙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首先捧出中郎的周作人先生說「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是公安派的主張。但這是針對前後七子的「剿襲模擬影響步趨」秦漢盛唐而發，就是要「從自己胸臆流出」並沒有絲毫神祕的色彩。江進之替他做的敝篋集序，裏面引他的話，把「性靈」和「模擬」對襯，可以為證：

……蓋中郎嘗與余方舟泛舟蠡澤，適案上有唐詩一帙，指謂余曰「唐人之詩，無論工不工，第取而讀之，其色鮮妍，如旦晚脫筆研者。今人之詩，即工乎，然句句字字，拾人飣餖，才離筆研，已以舊詩矣。夫唐人千歲而新，今人脫手而舊，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模擬者所從來異乎？……流自性靈者，不期新而新，出自模擬者，力求脫舊而轉得舊。由斯以觀，詩期於自性靈出耳，又何必唐，何必初與盛之為沾沾哉？」

又他推重閭閻婦人孺子所唱的眞聲，在陶孝若枕中囈引中另有一種解釋：

夫迫而呼者不擇聲。非不擇聲也，鬱與口相觸，卒然而聲，有加於擇者也。古之爲風者，多出於勞人思婦。夫非勞人思婦爲藻於學士大夫，鬱不至而文勝焉，故吐之者不誠，聽之者不躍也。

這是空虛和質地的對照。所以行素園存稿引又說：

物之傳者必以質。文之不傳，非曰不工，質不至也。……故今之所刻畫求肖者，古人皆厭離而思去之。

怎樣能有質呢？他接着說：

古之爲文者，舍華而求質，倣精神而學之，惟恐質之不極也。

這是蓄積質地。還是不夠，又接着說：

博學而詳說，吾已大其蓄矣，然猶未能會諸心也。久而胸中渙然，若有所釋焉，如醉之忽醒，而漲水之忽決也。

這是了解質地。還是不夠，又接着說：

雖然，誌諸手猶若掣也，一變而去辭，再變而去理，三變而吾爲文之意忽盡，如水之極於淡，而芭蕉之極於空，機境偶觸，文忽生焉。風高響弘，月動影隨，天下翕然而文之，而古之人不自以爲文

也，曰：是質之至焉者矣。

這是運用質地，克服質地，而又是最高的質地。不「一變而去辭，」那是堆砌；不「再變而去理，」那是剿襲；不「三變而吾爲文之意忽盡，」那是無病呻吟，浪費。怎麼好呢？關鍵全在「機境偶觸。」江進之又在敝篋集序引他的話說：

世之稱詩者必曰唐，稱唐詩者必曰初曰盛。惟中郎不然；曰「詩何必唐，又何必初與盛？要以出自性靈者爲眞詩耳。夫性靈竅於心，寓於境。境所偶觸，心能攝之；心所欲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是之謂眞詩，而何必唐，又何必初與盛之爲沾沾？」

這是「機境偶觸」的很好的解釋和發揮。心能攝境，就是境的反映；腕能運心，就是心的表出。「性靈，竅於心，寓於境，」是兼及兩方面的，從這可知不是玄虛的，如捧中郎的人所設想。

關於後者，就是「以腕運心」，中郎在替江進之的雪濤閣集做的序文裏說：

……信腕信口，皆成律度。

而在同上的陶季若枕中囈引接着上文也說：

……病中信口腕，率成律度。

捧中郎的，都當他是言志派的大師，照上面的說法，粗看是像，而其實是不像的。且看他在行素園存稿引末後最露骨的話：

……夫質者，道之幹也，載於言，則為文。

然則中郎的質是什麼呢？是儒釋道三家思想的綜合。他在給徐漢明的信中說：

……弟觀世間學道，有四種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諧世，有適世。玩世者，子桑伯子，原壤，莊周，列禦寇，阮籍之徒是也。上下幾千載，數人而已。已矣！不可復得矣！出世者，達摩，馬祖，臨濟，德山之屬皆是。其人一瞻一視，皆具鋒刃，以狠毒之心而行慈悲之事，行雖孤寂，志亦可取。諧世者，司寇（案指孔子，曾做過魯司寇）以後，一派措大，立定腳跟，講道德仁義者是也。學問亦切近人情，但粘滯處多，不能迴脫蹊徑之外，所以用乘有餘，超乘不足。獨有適世一種，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為禪也，戒行不足；以為儒，口不道堯舜周孔之學，身不行羞惡辭讓之事，於業不擅一能，於世不堪一務，最天下不要緊人。雖於世無所忤違，而賢人君子，則斥之惟恐不遠矣。弟最喜此一種人，以為自適之極，心竊慕之。除此之外，有種浮泛不切，依憑古人之式樣，取潤聖賢之餘沫，妄自尊大，欺己欺人，弟以為此乃孔門之優孟，衣冠之盜賊。後世有述焉，吾勿為之矣。

玩世是道家，出世是釋家，諧世是儒家。這裏他最推重道家，儒釋二家，褒貶參半，最痛恨僞道學，即此一種，而自居於適世。適世即儒即釋，但是非儒非釋；雖然裏面不曾提到道家，但是他最推重，而且他的思想，包括道家的思想，是很濃厚的，具體的例，就是解釋莊子內七篇的廣莊，也就是被後人「借得一場胡塗」的地方。

公安縣儒學梁公生祠記表示了這一點：

天之大也，無所不有，而非挾其有以角也。聖人亦然，……聖人之大，以受不以勝。天下之爲道者歧矣，其道皆竊吾近似者也。吾僕役之，則吾用；而角之，必且外吾而求張。故以宣尼之聖而識小，師老聃問道，不以是貶大。暨於後儒，挾吾之所有以求勝，而吾之道一變而儒始名，再變而儒遂退居九流之列，三變而儒乃有爲異道用者，是則角之而張者也。且夫諸子百家，固未有能出吾範者也。莽而爲名法，比而爲楊墨，遁而爲老釋。惟其竊吾似而甚焉，則指之曰異學，而實不出吾所有，夫聽所言，觀所行，譽所試，是聖人未嘗不名家也。春秋之斧鉞，雖隱必誅，是聖人未嘗不法家也。吾蔬食而愉快，其樂我；席不溫，轍不解，其愛兼，是聖人未嘗廢楊墨也。寢有經，食有戒，是聖人未嘗廢攝生也。幾研於未發，道竟於無聲臭，是聖人未嘗廢虛無也。惟其無師不有，而出之以

平淡故，其大至於不可名。……孟氏善衞道者，其言不過曰「歸斯受，」曰「反經而已矣。」

……故今之欲廓吾道，莫如遵孔孟之家法，而明其書，暢其旨。

這不能說傾向儒家，而正見得是藉以說明其思想的綜合。則使要說傾向儒家，那只是原始的儒家，未始名儒「無所不有」但也還是思想的綜合。且作爲「無所不有」的儒家的根據，也是截取枝節，牽合成共通點，「有見於齊，未見於畸，」顯然不合事實。不過把這當做他個人的思想，却仍舊可以的。

這思想是一種自由解放，而回過來看他的文學，也是一種自由解放。這自由解放是受時代的影響。明自中葉以後，思想界已在自由解放了，這就是王陽明領導的反朱學運動，在李夢陽何景明復古的時候，陽明起初也跟他們唱和往來，後來斷然棄去，當時同人還很替他可惜。雖然他後來致力的是思想一方面，但是他的詩文也跟着走到平淡的一路。中郎則是偏重文學，同時却很推重陽明。如爲褒灰書冊寄鄖陽陳玄朗說：

……有宋諸賢，……未盡暢「朝聞夕死」之旨也。至近代王文成羅盱江輩出，始而抉古聖精髓，入孔氏室，揭唐虞竿，擊文武鐸，以號叫一時之聾瞶，而世之儒者，信疑相參，其疑者固無足言，所

謂信者，亦只信其皮貌，以自文其陋而已。

公安縣志傳中郎：「海內知己，謂其識如王文成，」當非偶然的了。

關於中郎的相貌，我只能畫一個輪廓，風采儀態，在這裏是賞鑑不到的，我只想有意賞鑑的不賞鑑到歪裏去，到歪裏去賞鑑。

——自文學

公安小品文之一席話

劉燮

據云外國文學派頭頗多，隨口開合卽舉出古典派浪漫派種種，眞不亞雜貨攤。外國文學如此，中國文學亦當如此。譬如說道德經應歸之古典派中，則當今之毛毛雨曲卽該屬之於浪漫文學了。這雖然不啻講笑話，然中國之新文藝批評家，亦非絕無此論調也。苦雨齋老人云：中國文學獨非俗子，偏不如斯，僅有『言志』『載道』兩潮流而已。二說都有理，聽之如夢如囈，莫知從此歟，抑從彼歟？莊周解。難云：『姑妄聽之』則嘉，菁談文藝不亞癡人說夢，講文藝的人原也講的渺茫話，而聽的人卽猶之乎夢中聽夢話了。然文人與批評家絕不能逃此夢界，而爲文豪而爲批評家。批評家不曾涉足此夢中，弗能領略文藝，文人未行脚此夢中，弗能爲好文學。似是參禪，參法我雖不知，大半亦很幽默，處子參之卽如睡夢，然一經陶冶有素，自然悟其妙處。文藝原覆有一層神秘性，偶遭此境卽睡去，似醒非醒，斷非文藝理論家所能道破之爾。

燮曾言，老學究講學半生，猶不敵妙齡姑娘之一顰一笑。蓋文學境界莫貴自己領悟，參透此禪，則心慧眼亦慧。

人間詞話謂詩詞之境界在乎不隔，詩之神秘則謂詩帶有朦朧性。朦朧性云者，隔也。不隔云者，離此朦朧性也。文學之妙，在乎隔與不隔之間；蓋不隔則味澹，然逸麗，蓋隔則味濃，然晦澀。儻能參差運用，則風味沈鬱，而辭藻亦復俊逸矣。

三袁之文，大都不隔，然亦有隔處。中郎評小修文云：「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中郎愛其疵處，在乎去前人粉飾蹈襲之恨，余亦愛其疵處，然在乎其隔也。此隔則所謂帶有朦朧色彩處，亦即文學之游離境界。此游離性，乃文學之最好丰神，望之頗感躊躇云云。余嘗云，好詩文有離人參透性心會則許，道出則不許，儻能道出則下矣。

既稱文豪，務把作品弄的飄飄蕩蕩，莫令讀者摸索箇清清楚楚，有頭復有腦也。然亦不可作到極幽晦處，最好令人一見風度楚楚，載歌載舞，如燈下影，江中月，嚐之外澹而內濃，甘而復辛，尊使讀者相思而成病，雖窺二年，亦徒懷有莫能到手之慨。然往往情動於中而形諸言，伸紙執筆，即若大江東瀉，滔滔不能自已，此皆緣於任情發揮，弗能制愛之故，縱使文質彬彬，而實不免受斯累爾。故錢牧齋評小修文云：「小修有才多之患。」而小修亦復自云：「發揮有餘，陶鍊不足。」小修知病犯病，可謂「好文章我自爲之」矣。雖云受累，然非累也。

袁中郎論詩文謂：「大都獨舒性情，不拘格套。」復謂「信腕信口都成格律。」大概三袁之文，真能作到此處，可謂言實其言。

寫詩文總是委曲婉轉而寫，無拘復無束，題目雖書咏物，而却是感懷之作，雖寫山水，而著筆於作者動靜之情似此作風，真詞家之辛稼軒也。余曾云寫詩文，非如斯寫，則不易趨於文學遊離之境界，中國載道之文絕不能造詣斯境，蓋其拘於繩墨，難逃規規矩矩之羅網。能達斯境者，厥爲大雅君子不道之雕蟲小技。雖云載道之文，間有嘉作，然亦隔搔之品云。是以宣誓不道載道之文，不誦貫道之品，獨好豆棚瓜架話也，亦知偏激，然已成狂癖，莫可奈何。斯狂癖無以名之，姑亦美其名曰：『好文章我自爲之』罷。

偶讀西青散記中載一段論詩云：『詩以無爲有，以虛爲實，以假爲真，每出常理之外，極世間擬絕之事，未妨形之於言，衆輒同遵者擯落，孳心不際者探擬，勾新取極，不嫌殊創，聲到界破，方信情來，詩之秘也。』不禁大歡樂，以爲我之夢囈偶合彼之囈囈云爾。真也寫文如此方有文鬼寫詩如此方有詩仙，其境界亦隨之而飄逸。

三袁論詩文，雖以冲澹取勝，然冲澹務先濃厚，不然，則易流於俚俗，言有盡而意有窮矣。故小修曾

悔其少作云『……然其病多傷率易，全無含蓄，詞意一時俱盡，雖工不貴也。近且始細讀盛唐人詩，稍味古人蘊味，膠青之妙，然求之一二語合者，終無有也。』謝康樂詩「池塘生春草」語冲澹，豈非三袁所謂發於眞者歟？然謝詩似此者少，晦澀處居多，太似竟陵之文，非細心咀嚼，弗能悟其美也。陶靖節詩大半冲澹，而亦復蘊藉，不知乃三袁之所謂眞也不？陶與王摩詰均寫田園詩，而王不及陶。蓋陶身是農夫，故寫之眞，王身處縉紳，寫之雖肖而假也。其唯北窗下臥，偶而開窗，瞧了一眼農夫荷鋤之梗概而已。公安之文章眞，竟陵之文章亦眞，不過於公安之眞中，復加以孤冷之氣云云。蓋公安之末流，落於澹薄，所謂水清不含鹽質，著色不塗膠青者也。竟陵以幽深孤峭變之，下桀不壞。小修云：『凡學之者害之者也，變之者功之者也。』亦早看破此弊。

豈明氏曾云胡適之徐志摩之文似公安，平伯廢名之文似竟陵。復云平伯廢名雖似公安，然却不曾讀竟陵派書籍。意即非似竟陵也，二公自似也。柳子厚山水小記之文，頗似水經註與洛陽伽藍記風格，然其道爲文之經驗，則云出於六經，而不道水經註洛陽伽藍記兩書，大概文人受何書影響最深，則往往不道也。豈明之評平伯廢名，亦猶柳之自評歟？不得而知之。

自人間世

公安竟陵與小品文

陳子展

我們不會痛罵公安竟陵是「詩中惡魔，」像五行志裏的所謂「詩妖，」把明朝亡國的責任，輕輕地推在他們這幾個文人的身上。可是我們也不會「杜撰」一部中國文學史，以為中國歷代文學的變遷，只是什麼載道派言志派兩大潮流的起伏，結論歸到言志派是文學正宗，公安竟陵是言志派，「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運動乃是繼承公安竟陵的文學運動而來的；因而以為這次新文學運動的成功，只是小品文的成功，公安竟陵的東西和現代小品文的發展，真有什麼聯繫，說是某也像公安派某也像竟陵派，自吹自捧的互相標榜。

倘若「杜撰」後一說的，不是講演「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的大教授，當年參與新文學運動的一員，同時又是小品文的名作家，公安竟陵的愛好者，我們絕不會推論到他好像是有「方巾氣」的「傖夫俗子」出來爭道統，想在現代文壇上建立一個什麼言志派的文統。

說到爭文統，我又記起關於公安派袁中郎的一個笑話了，記得這是出在曹蓋之舌華錄裏面的，袁中郎和他的朋友郝公琰都是自命不凡的，高自位置。有一天，郝公琰做了一首詩，因有妙句，歡

喜得跳起來，對袁中郎道：「據書上說，從文王武王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五百年而有孟軻，這是道統。詩道也是這樣，曹植劉楨五百年而有李杜，從李杜五百年而出世的不是我郝某麼？」袁中郎只好笑道：「我不是李老君，能夠自己退避，讓給孔子獨自出名哩！」

如今的袁中郎想爭文學上的正統，那是可有的事。我於這個人未嘗沒有相當的推重，但關於他論到公安竟陵一點，我說他是在爭文統，我有這麼一種推測，並不算怎樣過分的。我們只要看到在文學上久已無人提起的袁中郎，近來從他一個人捧出，大家都捧袁中郎，也就是捧他，就可以曉得此中消息了。

爲了這個，當然也還有別的刺激，我曾做過道統之夢文統之夢兩篇短文登在申報自由談上，還有一篇京派的起源，其中也提到了這個文統。此外，還有好幾篇關於明朝文學，或者附帶論到明朝文學的短文。如小說評點家李卓吾談鍾伯敬，都列在自由談。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當，登在新語林。晉人小帖，載在太白。嗚呼才子，談古文與八股之關係，發表在人間世。最近看到阿英先生在自由談上發表吃茶文學論，明末的反山人文學，清談誤國與道學誤國三篇文章，從明末文學論到目前標榜明末文學的文學。看他從發生這種文學的社會背景，個人生活，指出這種文學的所以存在，雖然在短篇中還

不會十分暢論，可是今人論到明末文學的，就我所見的而說，不能不算是只有他最能搔着癢處，接觸歷史的眞實了。

老實說，我於明末文學公安竟陵兩派，從來沒有什麽研究。明天啟間刻本鍾伯敬隱秀軒集三十三卷，崇禎間刻本袁中郎集四十卷，譚友夏合集二十三卷，雖然翻過一番，也只是如瀏覽其他許多僻書一樣，並不曾十分注意。這裏我要談到公安竟陵，還是從兩年前替北新書局寫的中國文學史講話下卷原藁裏摘下來的。好在我不在這個文統之內，說話外行，也不打緊，讓我放膽的說罷。

所謂公安竟陵，原是因詩得名，不是因爲散文成派的。今人標榜公安竟陵，卻是從散文或所謂小品文上立論。我們要論公安竟陵的散文，還得起先對於有明一代的散文作一個鳥瞰，然後纔可以窺見公安竟陵的眞面目，眞精神，他們是在怎樣的情況之下產生出來，而且在文學史上盡了怎樣的一種任務。

說也奇怪，其實並不奇怪，唐宋兩代的古文最盛，到了金元時代，文化落後的游牧民族統治中國，連中國的文化也一時陷於停滯衰落的狀態中；古文也奄奄沒有生氣了。元好問姚燧吳澄虞集雖然號爲大家，他們的成就卻是有限。後來柳貫黃溍吳萊取法南宋陳亮之文，還算古文中的別派，也談不

到有若何值得注意的成就。到了明太祖開國，被稱爲「天下文章第一」的宋濂，他是先從吳萊學，後遊黃溍柳貫之門，雖說學有淵源，又因緣時會，列在開國功臣，閱見廣而情志濶，成就還是有限。唐宋派的古文既然衰微，於是取而代之的是假古董似的秦漢派，要算元明之際被人目爲「文妖」的楊維楨做了先驅。因爲劉基宋濂之後，沒有相當的替人，又因爲臺閣派楊士奇李東陽一流的膚廓平衍之文，久而生厭，號爲復古的秦漢派何李王李四大家先後出來了。直到反復古的王愼中唐順之歸有光先後出來，纔算他們克服了僞古典的秦漢派，繼承了唐宋古文家的文統。尤以歸有光比較最有名，他曾痛罵王世貞爲「妄庸巨子」，獨抱唐宋諸家遺集，與二三弟子講習於荒江老屋之間，毅然排擊王李，可算他是當時唐宋派古文家的健將。王世貞原是和他爭論不合的，可是他死了，王世貞做的歸太僕遺像贊道：「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趣？久而自傷！」這簡直是秦漢派一位大將的投降書，投給已死的唐宋派一位大將了。何況據說這位秦漢派的大將臨死的時候，他的手裏還拿着一部蘇東坡集在讀呢！

不過這個時候，秦漢派還是保有相當的勢力，直到公安三袁，竟陵鍾譚出來，纔眞可以說是「王李之風漸息」了。

三袁之中，袁宏道最有名。

袁宏道（一五六八——一六一〇）字中郎，公安人，與兄宗道，弟中道，並有才名，人稱三袁。宗道（一五五九——一六〇〇）字伯修，號石浦，萬曆十四年（一五八六）會試第一，授庶吉士，進編修，卒官右庶子。中道字小修，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宏道舉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進士，歸家下帷讀書，詩文主妙悟。歷仕吳縣知縣，順天教授，國子助教，禮部主事，稽勳郎中等官。先是王李之學盛行，袁氏兄弟獨心非之。宗道在館中與同館黃輝力排其說，於唐好白樂天，於宋好蘇軾，因名其齋曰白蘇。至宏道益矯以清新輕俊，學者多舍王李而從之，目爲公安體，然戲謔嘲笑，間雜俚語，空疏者便之。據明史說，公安派的主張及其特點如此，太抽象了。現在我們來看看三袁的文學論罷。袁伯修論文上說：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轉隔礙，雖寫得暢顯，已恐不如口舌矣，況能如心之所存乎？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達不達，文不文之辨也。唐虞三代之文無不達者。今人讀古書不卽通曉，輒謂古文奇奧，今人下筆不宜平易。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詫謂奇字奧句，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

袁中郎雪濤閣集序裏也說：

『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

又，他的小修詩敘裏說：

『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於秦漢，詩則必欲準於盛唐，勦襲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

這是公安派的「文學進化論」他們的根本理論在此，也就是他們所以異於復古派的地方。他們以為「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推而論之，文學亦有古今。他們雖然不曾明白主張文章要全用口語，他們的作品每每雜用口語，却已實踐了他們自己的一點主張。再看袁伯修的論文下裏說：

『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類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曾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曾具一絲意見。……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圖人稱揚。

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鉅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溺，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編，抹去古語陳句，幾不免於曳白矣，其可愧如此。……然其病源則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苞塞於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兔起鶻落，猶恐或逸，況有閒力暇晷，引用古人詞句耶？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

這是公安派的「作家修養論，」也可以說是他們的「文章孕育論，」「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從學生理，從理生文。」他這些話都相當的精到。他罵當日復古派的文章沒有見識理解，沒有充實的內容，徒然堆切古語陳句，在形式上用工夫，就更深刻了。還有袁中郎說：

『信腕信口，皆成律度。』（雪濤閣集序）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小修詩序）

又袁小修中郎先生全集序裏說：

『嗟呼！自宋元以來，詩文蕪爛，鄙俚雜沓，本朝諸君子出而矯之，文準秦漢，詩則盛唐，人始知有古法。及其後也，剽竊雷同，如贋鼎僞觚，徒取形似，無關神骨。先生出而振之，甫乃以意役法，不以法

役意，一洗應酬格套之習，而詩文之精光始出。……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眞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

這是公安派的「創作方法論」——他們不守「古法」不拘「格套」不肯「剿竊雷同」，不肯造出像「贗鼎僞觚」一樣的假古董，他們下筆所重在「意」所重在「神骨」換句如今的話說，他們所重不在形式外廓，而在實質內容。他們主張「信腕信口」「獨抒性靈」「有一段眞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至於說是「心靈無涯，搜之愈出」他們已經理解到性靈無涯，創作的源泉也就無涯了。他們是「文學解放論者，」和當日的「文章軌範論者」無論秦漢派唐宋派，都是不相容的。不過他們也僅僅止於建立了性靈派的一種理論，他們的作品並不能和他們自己的理論相適合。就算袁中郎的小品散文較好，究竟他的成就還是有限。他所作關於山水的記敘小品，可以勉強算是他的「獨抒性靈」之作了。張岱說「古人記山水手，太上酈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時則袁中郎。」張氏還以爲酈文遒勁蒼老，柳文深遠冶淡，袁文靈動俊快，恭維袁中郎已夠。他似乎不知道有徐宏祖的霞客遊記，所以他於近人中僅止稱許袁中郎。中郎的全集中雜文一卷，收的都是紀遊之文。雖說題目是紀遊，他卻不一定寫當前的景物，每每只寫遊興，寫感想，寫聯想到的議論。便是描寫景物吧，每樣景物都是從牠的

特殊之點，移入自己的情感，加以生發，可以勉強稱爲他的「獨抒性靈」就在這裏。今人歡喜說到公安派的小品文，歡喜說到袁中郎，也就應該爲了這點。自然袁中郎的文學理論較之同時那些號爲復古的僞古典派，也有值得重視的地方。而且中郎那種遊記文章，每每「戲謔嘲笑，間雜俚語」雖不免故意作態，有時也稍有風趣。用「語錄體」寫幽默小品，可以算他作個開端，這也就是如今文壇上有人特別捧出袁中郎的一個緣故了吧。

不待說，公安派是復古派引起來的反響。在公安派之前，徐文長所作詩文，不問古人法度爲何物，論者以爲「公安一派之先驅。」還有和王愼中唐順之同在嘉靖八才子之列的李開先歸田以後，所作閒居集，自序說是「年四十，罷歸田里，既無用世之心，又無名後之志，作不必工，信口直寫。」這似乎也可以說是「公安一派之先驅。」

至於竟陵派正和公安派同時，而稍後起來。他們不甚注意於散文，所以在散文方面的成就也有限。然而鍾惺譚元春常常是和三袁相提並論的。

談到鍾伯敬，也已經在申報自由談上談過的，這裏不搬老話。

鍾惺（一五七二——一六二四），字伯敬，竟陵人，萬歷三十八年（一六一〇）進士，官至福建

提學僉事，與同里譚元春友善，元春字友夏，名聲後於鍾惺。因為他們兩人共同選輯了唐詩歸古詩歸兩書，所以鍾譚齊名並稱。他們文學上的主張，在「務求古人精神所在」。鍾惺的隱秀軒集自序裏說：

『予少於詩文本無所窺，……庚戌以後，乃始平氣精心，虛懷獨往，外不敢用先人之言，而內自廢其中拒之私，務求古人精神所在。雖不能得古人一二，然舉其所得之一二以示人，其為人耳目所不經見，及經見而略不屑意者，十固已八九矣。間取己作以覆古人，向所信以為古人確然在是者，覺去古反滋遠，有所創獲，晚出，使人愕然以為悖於古者，古人竟先有之，始悟近時所反之古，及笑人所泥之古，皆與古人原不相蒙，而古人精神別自有在也。』

復古派所求的在像古人面目，竟陵派所求的在得「古人精神」。又鍾氏在詩歸序裏說是「第求古人真詩所在，真詩者精神所為也。」他以為古人真詩就是古人真精神，可見他著重在一個「真」字。這和袁中郎所說「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大致是相彷彿的。再譚元春的詩歸序裏也說：

『夫真有性靈之言，常浮出紙上，決不與衆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專其力，壹其思，以達於古人，覺古人亦有炯炯雙眸從紙上還矚人，想亦非苟然而已。』

他說的「眞有性靈之言，」當是鍾惺所說的「精神所在」罷。我們藉此知道竟陵派和公安派可以通稱「性靈派。」性靈可以說就是「自我，」作品可以說是自我之表現，也可以說是性靈之表現。倘若我們論文學只知著重個人的因素，著重自我的精神性靈說自是較有可取的一說。性靈說者以爲自我表現在一「眞，」字，即是說在求自我的「眞」不怕露出眞面目來。公安竟陵兩派都主張一個「眞」字這是他們的共通之點。又因爲想要擺出眞面目，不免故意矯揉造作，自附風雅，結果傖俗這也是他們的一個共通之點。不過他們也有不同的地方，據明史文苑傳說自袁宏道矯王李之弊倡以情眞，鍾惺復矯其弊變而爲幽深孤峭。原來公安派的好處在清新輕俊，壞處在淺薄空疏；竟陵派想以幽深孤峭救淺薄空疏，却又不免於怪僻苦澀。到了明清之際，張岱李漁諸人的作品出來，算是融合了公安竟陵兩派的一點長處。李漁是一個頂重要的劇曲批評家，同時又是一個劇曲作家。他的一家言中，散文部分有不少「獨抒性靈」之處，可是他的不朽之業究竟在他的曲話。至於張岱，在他的瑯環文集陶菴夢憶西湖夢尋裏，我們可以找出一點合格的小品文，他是自公安派竟陵派以來一個比較成功的性靈派作家。他稱袁中郎的山水記「靈動俊快」可以上配酈道元柳子厚，其實這無寧說他自己的山水記較來得近似些。倘若說「筆調就是性靈，」那末張宗子的文章算是稍能發抒性靈的

了。張宗子後來居上，還不過爾爾，袁中郎又怎值得誇張呢？

總而言之，簡而言之，公安竟陵兩派在那個時代的反復古的潮流裏，算是演了很重要的劇目。可是他們係從個人的觀點出發，只看見性靈是文學上一個重要的因素，而且他們的實踐趕不上他們的理論。就反復古一點而論，我們也不一定否認牠多少有點和「五四」運動的精神相似。但就後面一點而論，二者恰恰相反，公安竟陵是著重個人的性靈的言志派，「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運動者似是著重社會的文化的載道派，（暫時不妨承認有所謂言志派載道派）所以新文學運動，有時被人從廣義的說稱為新文化運動。因此我們論到「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倘非別有會心，就不必故意杜撰故實，歪曲歷史，說是現代的新文學運動是繼承公安竟陵的文學運動而來，這是我個人的一得之見，不會勉強任何高明之家同意。至於現代的散文作家，誰自認是公安派，誰自認是竟陵派，或者欽定誰像公安派，誰像竟陵派，只要你願意，那倒悉聽尊便。不過我們不便相信小品文，或者說是新文學，只由掛着公安竟陵幌子的一家獨賣，一家分出，就是了。

記發見中郎墨蹟之經過

樊縯

十月二十日午後，因職務須赴距百泉七里許之卓水鄉一行，妻象可與弟籍如亦欲乘機往觀白沙泉；人既衆，爲節省計，遂徒步而往。吾邑城市中人，往返十餘里，及歸至百泉鄉口，心纔定而氣已餒。旣過遊廊橋，更形疲憊，余脚且隱隱作痛，乃指白露園後壁上殘碑斷碣紿彼等曰「此中有吾蜀人所作詩文，盍一觀之？」殆欲借此方便休息一刻也。時殘照猶暉，樹影婆娑，石上「司功郎袁宏道中郎題」諸字隱隱約約出現於光罅矣。知中郎正走紅運，卽囑弟明日往抄之，健步而歸。

次晨從劉勉之同學借得人間世見林語堂先生正有啟事徵求中郎墨蹟，卽往商諸圖書館主任張稚鳴先生，請爲覓人搨之。誰知彼曾拓有此間碑碣數十種；取而查之，適有是碑，更加檢視，復得清李及秀和中郎韻詩二首與和小修韻詩二首拓片一張，及無名氏和中郎韻詩一首拓片一張，尤覺有出於望外之樂。遂先將中郎者寄出，而漫遊於蘇門山上，尋彼和韻詩碑之所在，周流未遍，卽於周程祠右牆得其後者，又發見其下有中郎年友吳用先詩二首碑一方，此更爲始料所不及者也。

是夜檢證於借得之兩部輝縣志（一乾隆二十二年重修，一道光十五年重修。）知中郎登蘇門

山放舟百泉之三首，前者僅著錄其一，李及秀和韻詩全在，只無名氏和詩與吳用先者未見。而另有中郎詠嘯臺七絕一首，及沈荃和中郎韻詩一首——其韻與李和小修之前一首相同。又兩志均載有中郎春日遊百泉二首，韻則與李和小修者正同。於是墮入疑陣，莫知所可矣。蓋以時代言，沈較先而李稍後，當謂沈是而李爲非；然李明明係分和中郎弟兄者，按情度理，沈實非而李是。已又按中郎來此，乃在冬季，以此春日者屬之，志亦誤矣。轉念此疑非讀全集后不能決，妄以臆度，徒費精神耳，遂置之不管，飲茶一盅，吸煙一枝，上牀睡去。

二十二日課後入圖書館翻明史，中國人名大辭典，尋吳沈李等事跡，邂逅史芊僧先生，芊僧本縣人也，世代書香，熟知掌故，因舉以告。又示我曰：「去秋爲邵元沖修葺安樂窩時，於瓦礫蓁莽中曾獲中郎碑一方，現在牆中，可往覓之。」次晨因約稚鳴同往，果得之於東垣，其前一首即志所載登嘯臺之絕詩，且有注語，後一七絕，則係詠安樂窩者，此又一意外之收獲也。所惜者小修詩終未之見耳。

午後復去圖書館，閱書數種，乃於前日之疑，豁然悟會。知沈李均無是非，錯在重修縣志之編者也。據河南通志，沈荃以順治十三年任大梁道，李及秀以十四年任河南巡按。今李碑末所綴年月爲丁酉八月，正是其時，而志所載沈荃和中郎詩意，亦在詠嘆秋景，必係二人同來而同作之者。李詩既爲四首

分和袁氏昆仲，則沈必亦有四首以分和袁氏昆仲。縣志編者采其一而又不細察，致將其和小修者當作和中郎，故鑄成大錯也。又按嘉慶一統志稱沈荃「書法尤有名」而無名氏碑字實足以當之，審其詩意，亦係詠歎秋景，更詳碑石，其後乃有斷痕，是殆沈荃之碑也，其斷失者其上當爲和中郎韻之第二首，及和小修之兩首；李碑卽作是體也。乾隆志所載沈和中郎韻詩，韻旣與李和小修者同，當卽係斷失中和小修者兩首之一。於是以知沈和袁昆仲之詩四首實存其二也。且沈李和詩旣無復可疑，則乾隆道光兩志所載中郎春日遊百泉亦實爲小修之作；縣志又誤矣。

總計四日之間於無意中得中郎墨蹟二件，正輝縣志兩誤，復得沈荃一詩，其經過並饒「柳暗花明又一邨」之態，寧非快事！方今中郎全集出版之際，好之者其亦將樂此以爲談助乎爰書以誌之。

續獲石公嘯台留題墨跡記

余旣於是間偶得石公墨蹟二事矣。十月二十八日復得其嘯臺留題三十七字，亦出於無意間，可怪已！

是日午後率弟赴鄉村醫院療治挫傷，邂逅梁女士，以久未上山，約躋其巔看太行落日，登至嘯臺

女士以聞有某黨人所題斷句全文爲問，是蓋書於「晉孫公和長嘯處」碑陰者，乃十九年所留，今已迷漫不辨矣。惟余昔年曾見之，因指其痕爲之誦曰：「昔以淸流蒙黨禍，恥於亡國作詩人。」然不意竟於裂爲坼兆之石上，隱見有「楚人袁某」字樣，撫拭審辨良久，知其全文占碑之四一，居東北角。其文曰：

『余自秦中來登華嶽嵩過百泉，爲二日留，止于嘯臺偕遊者固始孝廉（當係廉子渤，編者）汪君子增也。』

楚人袁宏道

因令人搨之。越日，而安樂窩者亦成。各爲二張，一以自存，一與語堂也。

袁中郎與王百穀

沈思

關於袁中郎，已經有很多人說過了，我這里不想再來畫蛇添足。近讀周櫟園的因樹屋書影，里邊有稱引中郎的一段話，在本誌所刊的幾篇關於論述袁中郎的文章里，好像都沒有提到過，許是幾位先生都沒曾留心到吧？我且來鈔錄在下面，或可為讀者一助。（劉大杰先生袁中郎的詩文觀里曾見稱引，惟截去首尾，只留中間一段，少為減色。）

「袁石公曰：『蘇郡人物，甲於一時。至弘正間，才藝代出，斌斌稱極盛。厥後昌穀少變吳歈，元美繼作，高自標舉，大聲壯語，吳中綺靡之習，因之一變；而剽竊成風，萬口一響，詩道寖弱。至於今市賈傭兒，爭為謳吟，遞相臨摹，見有一語出格，或句法事實非所習見者，則極詆之為野路詩。其實一字不觀，雙眼如漆，眼前幾則爛熟故實，雷同反覆，頗可厭穢。故余往在吳，濟南一派，極其訶斥，而所賞識，皆吳中前輩詩篇，後生不甚推重者，大抵慶曆以前，吳中作詩者人各為詩，人各為詩，故其病止於靡弱，而不害其為可傳。慶曆以後，吳中作詩者共為一詩；共為一詩，此詩家奴僕也。』石公此論，未為不是。惜乎矯枉過當，遂開後人口實。然當時無石公黃金白雪，流毒今日，更不知如何矣。」

右所述中郎『人各為詩』與『共為一詩』二語，實即為創造與模仿的區別。即此二語，可以說明當時文壇的情形和中郎文學革命的主旨了。所以周櫟園雖然嫌中郎矯枉過當（其實當時一般人都以此語評中郎，）也不能不說出一句良心話來『未為不是。』至於『然當時無石公黃金白雪，流毒今日，更不知如何矣。』一語，則大有為中郎捧場之意了。

至於王百穀，在中郎集中致百穀的尺牘有九通，關於百穀的詩亦有二首，他和中郎的交誼概可想見。他的謀野集，阿英先生曾介紹過。在阿英先生的文章里有一段頗有趣味的話是：在百穀晚年生子後，中郎還寫信開他玩笑道：『聞先生益健飯，猶能與青娥生子，老勇可想。不肖未四十已衰，聞此甚羨，恐足下自有秘戲術，不則誑我也。』晚年所生的兒子，當然是少子了。我們且來調查調查看，這位百穀晚年所生的少子當初生時，袁中郎會那麼向王百穀調笑過的，他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物?

在阿英先生的文章里說謀野集里還有百穀給他二個兒子的一封家書。家書非常眞率坦白，從對他二個兒子的殷殷期望和一些未經人道的教育方法看來，（家書原文見阿英文中，）可見百穀是教子有方的。在理他這二位令郎應當克承父業，尤其是那位少子，應當不違孝思了。然而不然！據周櫟園的因樹屋書影說來，他那位少子（叫阿留）簡直是個該殺的人，（上海大衆語叫作殺坯。）這

不要使讀者們吃驚嗎？

是怎樣的一回事呢？且慢心急，讓我把書影里關於這一節文字再抄錄在這兒。這雖無關於王百穀詩文的本身與袁中郎的調笑尺牘也不相牽連，然而即此下面一節文字，我們是不難從里邊窺出明季文壇的門戶之見與派別之分，互相仇視的情形。這是治明代文學史者的絕好的資料，所以不憚麻煩全錄在這里，希望不要輕輕看過。

『王百穀以詩文名海內者三十年。至其哭袁相國之甍，白王仲子之寃，行誼有足多者。有父如此，亦無愧於其子矣。乃其少子留，字亦房者，略有才情，走入魔道，附予鄉馬仲良諸君，竊名於世。余在閩中見其詩刻種種，無一語及其父。同時諸名彥爲留詩序者，亦未敢一字及其父，若百穀生前負大辱於世，留不屑爲其子，故推而遠之者。詩文即不同調，何致自昧於人倫如是？吾故曰：爲歷中以門戶分別忍於推遠其父者某，以詩文分別而忍於推遠其父者王留也。以法論，留當皆誅。留有句曰：「竹爲槐羽翼，衣作扇仇讎。」又曰：「暑令天不韻，酒作夜常規。」又曰：「樹將風太曬，烟與有何仇。」又曰「溫退蟲多曰，涼多鳥子身，」是底語，正恐百穀不願有此孝子耳。』

爲了兒子所刻的詩集上不曾提到爺老子的名字，就蒙「營訣」的罪名，櫟園老人的筆伐，也忒太過份了些。要眞要那樣，現在一般新作家印出的作品上幾曾見有提到他老子是怎樣怎樣的？倘都像櫟園老人那樣要一個一個加以該殺之罪，那不太「那個」了嗎？可話又得說回來，古今的印書出集子意義大不相同，現在，乾脆點講，印書是爲了賣錢，世間那里有掮着老子的招牌出賣的道理？古時可不然，出集子多半是爲的揚名，爲的傳世；兒子有了傳世揚名的機會，爲了表示孝道起見，你怎得不把老子的名字高高的寫上？那怕那個死老頭兒是個目不識丁或是個土豪劣紳之流，你也得把他寫成先考甚麼甚麼怎樣怎樣，方不忝爲子之道。所以王留在印出的詩中不把他老子王百穀的名字寫上，這事的是非我們姑不必論列，至少，這舉動在當時是反常的，他和他老子對於詩文的意見的不同調，我們是顯然可以看出的，他們中間的裂痕或者很深吧？倘百穀死後有知，或許會戲答中郎道：『正恨別無秘戲術，方生此不肖耳。』

因對於詩文的意見不同，至於子不稱父，可見他們的不同，是眞有點不同的。不像今人筆底下儘管不同，換一個筆名卻不妨湊和在一起同同又何妨。至於爲了詩文意見的不同，竟以老拳相向，則又爲今所絕無而爲古之所獨有了。再來鈔一則書影在下面，作爲本篇的結束。雖是關於竟陵鍾惺的事，

但竟陵不是常被和公安一起稱述的嗎？則因瞎談袁中郎和王百穀而牽連到鍾惺身上，也不爲離題太遠吧？

書影上這樣說：——

『彭堯諭，余鄉夏邑人，工爲詩，有西園公子集。少多讀書，有氣調，常遊京師；過竟陵鍾惺，與談不合，奮拳毆之。……』

這是一件頗爲幽默的事。但一個與時論有著不同意見的人，（一個文學革命者亦然）往往會遭遇到別人的拳打棍擊，這雖是不平凡，而實是非常非常平凡的事。





書名　袁中郎

編輯者　今知社編輯部

發行者　今知社出版部
上海貝勒路禮和里四號

總代發行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中市

每册實價大洋三角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版　1-2000